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雨历程

反“右派”亲历记

我和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片断

取消人民公社的前前后后

新时期党的重要文献出版述略

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67

总第六十七辑

1998年9月出版

0100943

D239

6:67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十七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201009434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年·北京

主 编：李海文

副 主 编：杨公之
陈 夕

文献编辑：罗一恒

责任编辑：王林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67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9

ISBN 7-80136-188-1

I. 中… II. ①中…②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IV. D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4810 号

中 共 党 史 资 料(67 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 央 档 案 馆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北门)

电话:(010)62881570 传真:(010)628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通县京通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6.375 印张 150 千字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ISBN 7-80136-188-1/K · 163

定 价:8.00 元

DH84/3318

目 录

文献资料

中共中央关于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发展

- 生产致东北局电 (1)
《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大纲 刘少奇(3)

回忆录

-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雨历程(下) 罗章龙(7)
反“右派”亲历记 李 新(34)
我和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
生活片断 刘 英(44)

专题资料

- 取消人民公社的前前后后 黄道霞(56)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社队企业发展
的历史考察 王建梅(83)
中国共产党与新疆三区革命 祁若雄(101)

人物介绍

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 记冀朝鼎 廖训振(114)
韩练成小传 韩 兢(120)。

会议介绍

- 华北财经会议始末 罗一恒(132)

大事记

- 建国后毛泽东 45 次回湖南纪要 夏远生(140)

信息窗

- 新时期党的重要文献出版述略 沈学明 李新芝(162)
新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 彭咏梅(184)

档案译介

关于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

- 俄国档案文献 沈志华(198)
新书选介 (221)

中共中央关于正确处理 劳资关系发展生产致东北局电*

(1949年5月31日)

东北局：

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至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现特将邹大鹏来信电告你们，望东北局召集会议，要洛甫同志参加并发表意见。然后将东北局讨论的结果电告中央。

最近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视，发现我们在天津的负责同志完全不理资本家，有些干部则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场方面统制，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亦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在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去克服。在报

* 刘少奇手稿，刘少奇代中央起草。

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什么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和必须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因为我们顾虑到在党内存在的上述偏向，故我们尚未批准印发《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提纲》这个文件，我们认为在这个文件上必须加上批驳上述偏向的一段文字之后，才好印发。

中 央
辰 世

《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大纲^{*}

(1939年)

刘少奇

共产党员的修养

一、修养的基本条件

1、党员最基本的责任——是实现共产主义，把世界改造成为共产主义世界，解放全人类。他是国际主义者。

2、党员要了解这种责任，确定这种理论，就要研究马列主义，掌握马列主义，具有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它是发展的科学。

根据马列主义的分析，共产主义世界一定到来。

共产主义世界是最美丽幸福的世界，伟大的理想。

3、要掌握今天中国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任务。不是事务人员，不小气。自己站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从事共产主义运动，他是革命民族主义者。根据今天中国政治、经济、思想、习惯的特别情况，来决定自己的工作

* 根据刘少奇手稿刊印，标题为编者所加。

方式。

到处随时要求分析时局,实际的客观环境,实际的革命家(不是学究与空谈家)。

4、遵守纪律与平等民主的工作精神。这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必要的条件,共产主义是平等的,为了平等而须严格的纪律。

5、艰苦奋斗与虚心学习的作风。因共产主义是艰苦事业,事情天天变动。

二、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空前艰苦的事业

1、共产主义是最美满的世界——无阶级、无压迫剥削,无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互助互爱,大公无私,有高度技术。

2、不是一国一部分人的解放,而是全人类的解放,能够而且必然实现。是人类历史的开始入正轨,过去历史序幕,如大海与一滴水之比。

3、但共产主义社会只能从今天世界的实现开始前进,不能幻想。中国从民族独立民主说[始]^①。

4、今天的世界是丑恶的(现实丑恶理想美丽),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互相残杀,互不信任,黑暗愚蠢,野蛮。

中国人在干抗日进步事业(这是到共产主义必经之路),但中国人大多数自私自利。

5、困难在于(一)在压迫之下准备力量,战胜世界的先进集团获取——党、军队、文化;(二)镇压阶级后退者

① 方括号内的字为编者所加,下同。

的反抗；(三)发展经济,改造小生产；(四)改变人类的思想习惯——使自私自利者,变为有高度觉悟的大公无私的共社成员。

困难也是空前的,所以伟大。百年大业,一代不能完。

6、正因为这困难,还有人不相信,怀疑共义,认为它不能实现,可好,但不能实现。

三、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

1、自高自大的人——个人主义的英雄,好当领袖,小成功即自以为了不起,个人地位,这是旧社会的遗毒,不了解伟大。最高到皇帝,自大的人是最小气的人,小气。上台下台。

2、自己发展妨害别人的发展为代价。压落别人,以抬高自己,共要提高人类,资要破坏别人。

3、腐化堕落,旧社会的引诱。

4、遇挫折即灰心,失望,脱离,不了解困难。

5、党内的自私、自高自大现象之存在,这是由于社会原因,应有的。

6、见此现象即奇怪、灰心者,不知现实与困难,大困难与小困难。

7、反对一切不好现象,使之减少,进步,但一时做不到。自己的作用,坚持正确的思想,不同化。

四、总结

1、理想最高,工作最实际(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2、坚定的政治立场,灵活的战略策[略]与工作方法。

3、伟大的自尊心,而不是自高自大,个人英雄(空前

伟大英雄),逊谦,和气,民主,平等。

4、最高的人类道德(大同,四海皆兄弟,互助互爱,无虚假,一切为人类,不自私,公平,忠恕),但对阻碍进步的疾恶。

5、深入社会(丑恶的),改造社会,不同流合污被同化。

6、严格的团体生活,团结(纪律,规律性),但是活泼的自觉的,不因此而丧失个性,自动性。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雨历程(下)

罗章龙

湘鄂军阀武汉叛乱

郑州会议与徐州会议是重大的政治危机,紧接着便是蒋介石策动的夏斗寅反水与川军东下,其次是湖南唐生智部队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在这几次直接威胁武汉的军事行动后,武汉政治与经济危机更加深入了。

1)鄂西兵变:武汉政府出师河南时,蒋介石见武汉后方空虚,乃自4月25日起一面令安徽军队向西移动,威胁武汉;一面以重金收买鄂西驻军刘佐龙及第十五军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反水,袭击武汉。夏受命于5月17日动员西下,连占沙市、岳州,急行军直扑武昌。夏军前锋已达距武昌40里之纸坊时,叶挺奉命率第二十四师奋勇阻击,战斗激烈,将夏师击溃,俘敌千人,追至新堤始回,二十四师亦伤亡1200人,夏军残部向江西方面退却。是役武汉市内全军出堵,后方秩序由工人纠察队维持。中共湖北省委发起组织前线慰劳,士气益振。夏斗寅攻武汉到纸坊时,中央军校学生组成中央独立师赴援,在金口乘轮覆

舟失事，死 60 多人。夏师既溃，蒋介石又收买四川杨森军东下窜扰，杨军于 5 月 24 日开拔，28 日到达潜江、天门附近地区，距武汉 100 公里。武汉政府调回前线二十军并十一军共五师兵力迎击，杨森军败退。

2) 长沙马日事变：长沙马日事变是地主与工农斗争过程中的产物。当时湖南为新军阀唐生智所统治，农民协会蚕食一部乡村政权，二者相激相荡，到无法调和时便发生武装冲突。而酿成武装冲突的主要导火线厥为试行工农专政的各项打击地主阶级的措施。如 1927 年 1 月 4 日在工会、农协会与长沙工农学商会联合组织湖南省特别法庭，根据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捕杀李右文（赵恒惕的军务司长）、俞敦华、叶德辉、李石卿（铜官恶霸）等人，同时各县先后处决豪绅数十人，如宁乡刘昭、杨致泽，湘潭晏容秋等。叶德辉被杀，在当时官绅界发生重大震动。

先是马日事变前，湖南各地已先后发生武装冲突，如 1927 年 5 月 11 日陶柳军队捕去长沙工会纠察队队员 30 余名。15 日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李柱中被杀。18 日常德近郊农协委员长被杀。19 日益阳县工会及农协被军队占领，农民自卫军与农民纠察队被解散。同日晚长沙三十五军留守处向工人纠察队寻衅，解除纠察队武装。此外在湘南、湘西、湘东各县工农与地主武装冲突均在不断发生，1927 年 5 月 17 日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与第三十六军、第十五军、第八军军长在武昌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宁汉合作及分共问题。何键报告唐生智、汪精卫同意镇压农民运动。在武昌会议后约 4 日，长沙驻军许克祥的三十三团于

5月21日夜发动地方政变(王东原三十五团亦驻城外),5月21日晚许团围攻工会、农会、省党部,5月22日省工会死4人,省农会死10余人,工运讲习所死伤6人,党校死2人。当晚,在略作抵抗后,工会农会纠察队武装被缴去,监囚被释放。又在马日事变中干部被逮杀者有:学生会负责人田波扬及其妻陈爱云,贾荣吉,省党部秘书贾云伯,省民会议代表李异云,贺国英等均被害。

马日事变系试探性进攻性质,主其事者为湖南军阀及国民党反共分子仇鳌,肖翼琨、彭国钧等(外间传蒋介石曾汇10万元与仇等送许克祥5万元,仇自得5万元)。唐生智于事后电许,嘉奖其行动。但当时武汉政府尚未决定全面反共,所以佯作不知,于5月26日派陈公博到湖南查办,并暗令许克祥率部向湖南南部广东边境移防,许遵令开出长沙。

湘区省委在马日事变前疏于防范,临变不组织力量施行反击,仓皇失措,纷纷离职外逃。书记当晚出走武汉,亦有人赴安源避难,省委无主,一时陷于瘫痪。事变后组织残破,谎报情报,蒙蔽群众,希图卸责,均属错误行动。

中共中央与湖南省委间关于应变问题的争议

自中共五大以后,武汉革命危机纷至沓来,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曾经多次讨论应付当前局势有关诸问题。这些问题中主要包括政治斗争总的行动策略、军事部署与组织部署(巩固和发展)等方案。省委与中央曾为此引起

重大争议，兹分别简述如次：

1、中共湖北省委紧急倡议与武装行动方案：1927年四五月间武汉革命危机四伏，反动势力日益披猖，武汉革命感受威胁，形势岌岌可危。当时全党同志鉴于敌情严重，寝馈不安。起初还有人盼望上级改弦更张，以挽危局，但中央徘徊犹豫，未能当机立断，而有所作为。当时湖北省委在中央肘腋之下，实际担任武汉全局工作，地位非常重要，关系全局安危，鉴于事机日迫，不容一误再误，所以省委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向中央及时提出建议，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捍卫革命政权，并寻求最妥善的解决方案。

这次扩大会议是从下而上（从支部到省委）发动起来的，同时也是由省委成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共同作出的决定。最先是省委负责同志分别出席所属各支部会议，了解到基层同志对于当前政治、经济、军事危机纷纷表示意见，认为省委应当提出扭转目前局势的有效办法。与此同时，省委成员并分别向留驻在武汉的外省党组织负责同志及代表、革命群众组织等周咨博访，征询意见。所以这次扩大会议体现广大革命群众意志，研讨大家共同关心的重大政治问题。参加扩大会议者有本省市及各县代表、各工农兵组织党团书记，及留驻武汉的出席五大各省代表均被邀请参加出席。所以这是一次人数众多的会议。5月中旬后在中共湖北省委胭脂山举行。

在扩大会议上首由文虎将召集会议意义与议程扼要作了报告，主要任务是集中时间讨论武装行动方案及与此有关的革命群众斗争等问题。并由省委就工会、农会、

工农武装等问题分别作了专题报告。在长达3昼夜的开会时间中，出席会议的代表集中力量讨论省委报告。由于报告中所提示的问题论旨明确，而且又经过多日充分酝酿，所以经过一般性辩论后一致同意省委报告，认为当前革命形势有如千钧一发，十分严重，应该组织一切力量积极向敌反攻，才能冲破反革命势力的重重包围，消除革命危机，奠定大局，引导全国革命继续前进。

在省委扩大会上来自各方面的中共党组织的代表们，纷纷就本人工作岗位和本人观察所得谈论到省委报告与建议的重要性。大家共同认识到目前武汉是革命首都，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这是革命的心腹之患，对反革命必须施行开刀截除的大手术。会议上还有种种具体的分析言论与意见，如云：“自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劳动人民日夜盼望武汉政府实行东征，推翻蒋介石政府。但东征胜利应以巩固武汉革命政权为前提，否则后方牵制，难以成功。因此，当前迫切任务是肃清武汉反革命的工作。”又有人说：“广东为革命老根据地，目前在桂系军阀统治下，全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工农生活万分困难，亟盼武汉方面在大局安定后回师广东以解倒悬。如武汉革命政权瓦解，则南方革命将倒退十数年。”北方区委代表说：“冯玉祥新占河南，尽力扩军，横征暴敛，农民反对纷起，现今豫省遍地有红枪会存在，铁路矿山工人革命组织更可以发挥革命作用。又张兆丰同志陈师豫鄂边境，随时可以策应武汉行动。”湘省委代表说：“湖南境内唐生智军队实力空虚，湘赣边境防守单薄，我军随时可以进入湖南。

江浙方面局势动荡，蒋介石还未完全取得控制权，也可以乘虚而入。”九江党委负责人谈：“江西境内党与工农会组织力量势不可侮，朱培德军力有限，而且战斗力薄弱，亟盼武汉方面奠定大局，派军东下，驻留江西，整党经武，然后西可以进湖南，东可以进浙江，南可以入广东。只有在武汉革命政权巩固之后，才能采取主动推进全国革命高潮。”又安徽军阀残部陈调元地位介于鄂东赣北与武穴邻处，不能自保，我军可以偏师袭取安庆，如此屏蔽江西，进战退守，创造割据江东局面。

以上诸代表意见，总的精神是主张进攻，创立新局面。就目前局势说汪唐内部矛盾重重，敌方立足未稳，是可以取胜的。更就当前武汉军事力量观察，武汉全部武装共有军队 12 万人，其中坚决反共的有唐生智所部 3 万余人。中共正规军约二三万人，第四军、第二军约 3 万人，但论战斗力以叶挺所部第十军为最强，加上湖北工农会组织力量的强大优势，是足以抗击敌军的。观于历史上不少重大战役大部是利用敌方矛盾，以少击众获得胜利。如中国古代巨鹿之战，项羽以少击众；赤壁之战曹兵 80 万，吴兵 4 万；淝水之战符坚军 60 万，晋兵 8 万。在西方历史如普法之战，苏俄十月革命均利用地利与人和以少击众。因此，武汉方面如坚决采取主动，有把握控制全局。

会议取得一致意见：通过省委建议并就具体方案、执行内容作了广泛的补充。当时出席代表一致表示武汉为当前革命策源地，应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代价保卫革命首都武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挽救革命危机。扩大会议

讨论结果,通过省委建议与下列紧急行动纲领:(1)以湖北武汉工农组织为中心,夺取汉阳兵工厂,储存武器及生产武器,武装工人20万、农民50万。(2)在武汉、南昌、长沙三地同时暴动,各县工会农民协会一齐动手,组织地方乡村政权。(3)各省互相采取联络,一致行动,使各省军阀自顾不暇,不能采取联合行动。(4)逐渐扩张暴动区域到长江、珠江流域及其他省份。(5)在各地暴动中推翻国民党政府,逮捕汪、唐,成立工农兵学商联合政权,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资本家势力。(6)联合各地反军阀势力,扩大暴动区域。(7)作长期战争准备,肃清南方内部,再举北伐。

根据上面的纲领,经扩大会议讨论采纳方案中计有以下各条:军事方面:(1)在武装动员方面:下令叶、贺主力军队迅速集中武汉三镇从事战斗准备(约15个团)。(2)中央军校员生全部扩编为1个师,准备作战。(3)中共控制之下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准备参加作战。(4)武汉市警察武装一律改编加强作战准备。(5)武汉工人纠察队、农民协会武装进行扩大编制,准备参加作战。(6)责成汉阳党委迅即取出兵工厂库存枪支、弹药,武装工农及党团员,编成独立师团。(7)派专人到河南,令张兆丰师向武汉移动策应暴动。(8)电令湖南、江西省委协同一致行动。在加强革命群众组织方面:(1)组织武汉三镇工人的联合行动,以实力进行反击汪唐反动政权。(2)发动全省各县农民协会协同一致行动,扩大农民自卫武装,消灭地主武装。(3)下令各群众组织、青年学生、妇女等团体,采取有

效行动。(4)通知湖南、江西省委采取联合行动,就地夺取当地省、市、县各级权利,扩大武装。省委一致通过上述方案,公推文虎、荷波、史文彬、苏兆征等出席中央会议时向中央及国际代表提出。

省委紧急议案送达中央后,次日中央举行会议提出讨论,在中央会议上首由文虎即席说明提案理由与内容,并重申省委会议全体成员的决心,请中央迅速作出相应的决定,成立行动机构,统筹一切,立即付诸实施。文虎强调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稍纵即逝!全党应万众一心,破釜沉舟,力战克敌!

在中央会议上多数中委纷纷发言附议省委方案,均认为目前舍此以外别无良策。在诸人热烈发言中,国际代表独排众议,表示异见。罗易与鲍罗廷先后发言,他们说话词句语气轻重各有不同,但总的立论却是一致,就是说:省委建议与国际历来政策精神不相符合。目前任务是加强团结左派,千万不能闹分裂。他们多次发言,均围绕团结左派问题翻来覆去,语不离宗,主张培养新左派(指邓演达等),别的都谈不到。最后仲甫发言,他认为省委行动方案危险性大,弄得不好,会招致一败涂地。引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全会决议案决议说:“新军阀屠杀工农(指蒋、冯),但他们仍反对北方军阀。”言外之意是:“革命危机听其发展,以图他日卷土重来。”因他坚信敌人阵营决不会稳定,中共只要保有相当政治、军事、组织力量,就可以举足轻重,选择作战机会,乘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此时会场上双方展开激烈辩论,互不相让。正在争论

难解的时候，最后国际代表说，此案关系重大，今天难作决定。于是宣布会议暂停，以后当慎重考虑，从长计议。按照中共中央会议以往惯例，国际代表实际上都拥有否决权。遇到纷争难决的时候，往往他们片言可以息争。所以在这次会上省委的建议未经表决就被搁下来了。

按当时就暴动时机上说，事后判断第二次北伐是最好行动时机。当时唐生智军队全部开赴郑州，张发奎部亦在河南，唐部留在湖南只4个团，武汉全为叶、贺及工农武装所控制，所以最初鄂省委提议立即行动，意思是应争取在6月初旬即郑州会议瞬息时间发动。6月初旬大致是指6月5日武汉政府宣告解除鲍罗廷、加伦顾问合同与6月10日郑州会议时间。但是在郑州会议以后，如果对策适合机宜，没有罗易泄密问题发生，在争取友军等方面仍然可以采取反击行动。但错过此时以后，再强调进攻，敌方已告稳定也就不及时了。

国 共 分 离

1、武汉经济危机：自东征流产，北伐失败，夏斗寅反水于宜昌，许克祥作乱于长沙，军事应付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同时武汉内部经济危机亦日不暇给，迎面逼来。首先是政府方面的财政赤字，其次是社会经济危机的产生。就政府财政方面说：自1926年7月出师北伐，至1927年7月15日，前后1年间均处于军事动荡时期，政府开支绝大部分用之于军费。广东政府有6个军、2个独

立师,4个独立旅,官兵共9万人。北伐后第一次扩军,1926年6月间李宗仁为第七军,唐生智为第八军,滇黔军朱培德为第九、十军。北伐军攻下武昌实行第二次扩军,唐生智第八军扩为3个军,张发奎第四军扩为2个军,其他独立军、师部队各有扩充,共约20个军,共有官兵25万人。武汉方面有正式军队12万人,每月耗军饷数百万元,占收入90%。此项军饷大都由各地驻军就地筹集,武汉政府只靠少量税收维持政费,省政府则靠地方税维持且税源日少,税率反而日增。因军事时期生产萎缩,交通阻梗,经济调节失宜,地主资本家乘机破坏,于是生产降低,失业增加,物价增高,通货膨胀等现象相应发生,工农实际工资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日下,这样形成经济危机,财政奇窘。当时武汉政府主要筹款方式是采取发行库券,向工商银行界筹募捐款,没收敌产,集中现金的办法,以济急需。经常税收以江海关厘税为主。如第一次向武汉银行借款150万元,4月14日发行国库券900万元,4月17日集中现金得400万元,又一次向宜昌商会筹借500万元。当时武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进口、出口贸易停顿,银行、企业、洋行、工厂关闭,现金逃亡,以致许多工业原料供应不足,煤油、食盐等脱销。同时北方军阀与冯玉祥截断京汉铁路,李济深封锁粤汉交通,蒋介石封锁长江下游航道,四川军阀封锁长江上游航道,造成武汉经济的瘫痪。当时武汉三镇共有失业工人及贫民25万人,依赖政府救济。给政府带来很多困难。人民生活窘困,谣言横生,更酿成社会秩

序不宁。这一切汪唐等左派人物为推卸责任起见，一律说成是工农政策所造成，应由中共单独负责。

2、工人纠察队解散：在湖北夏斗寅反水及湖南许克祥作乱两次事变后，中共中央处境益臻危殆，当时党内感到未来事变来临，将更有加无已，这是洞若观火的事。为了预防局势更加恶化起见，中共负责人考虑到各种应变方案，并且自然而然地考虑加强武装自卫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时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扩大工农纠察队伍，二是加强中共所掌握的各军队的数量与质量。话虽如此，但是就当时形势看来，仍属缓不济急，因为敌视中共的国民党军阀武装力量自北伐以后是以倍数增加，但是中共自行武装问题却不易实现。在北伐军到武汉后，武装工农问题几乎成为中央与省委经常注意的问题。当时武装工农的方式有二，一方面是成立武装纠察队直接建立清一色的工会、农会军队。其次是充实改变中共控制下的旧式军队，输入工农出身士兵，派遣党员干部加强训练。自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后，即开始组织纠察队 1000 人，湖北省委由文虎出面于 2 月至 3 月间设法向汉阳兵工厂取得枪支一批，计 300 支。时邓演达任兵工厂厂长，该厂每月可制造步枪 250 支，加班生产可达 300 支。当时邓思想左倾，对省委要求尽量满足。5 月间省委又先后向兵工厂交涉，购买步枪 1000 余支（每支官价 35 元），同时并为湖南总工会、湖北农民协会购得枪支、子弹等装备，但未全部到手。总工会纠察队在收回英租界斗争中，在夏斗寅事变之役，在市内担任维持革命秩序，发挥作用颇大。因此，军阀

唐生智等多方设法攻击纠察队，流言蜚语，杂以挑衅，视纠察队为心腹之患。1927年6月间，革命危机日益发展，鲍罗廷既去职，纠察队遂成为反动军阀攻击的目标。汪精卫、徐谦等屡次在国共联席会议上掀拾传闻，提出纠察队不法问题，仲甫虽经多次加以解释毫无效果，攻势不惟未见和缓，反而变本加厉，外间传说李品仙将冲入友益街实行武力解决。直到6月中旬，仲甫在中央及省委会议上乃正式提出纠察队存在问题。仲甫说：纠察队问题如箭在弦上，如不解决，对方势不罢休，可能成为爆发国共双方武装冲突的导火线。

鄂省委对于解散武装纠察队的抗议：在讨论纠察队问题时，省委及总工会一致不同意自动解散，认为这样将助长敌人气焰。文虎、周逸群在省委会上力言纠察队不能自动解散，万一国民党不能谅解，我们建议可以移防调到别处训练。这样会议上意见不能一致，讨论很久没有作出决定。随后国民党方面催促再三，仲甫再召集省委及湖北省总工会负责人开会，讨论放弃纠察队武装问题。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也即是对国民党是否决裂的问题，因此也是决定进攻与退守的问题。当时鲍已离开武汉，罗易代表国际竭力反对与国民党决裂（罗易尝云：无产阶级并非革命的唯一指导者 Leadership，不过他在革命斗争中执行领导权 Hegemony 罢了）。仲甫对国际训谨服从，为顾全大局起见，就不惜步步退让以求苟全。此时他无可奈何说道：“纠察队几百条枪实在不能起多大作用，为大局着想只有忍痛放弃。”总工会上层分子刘、李等随声附和，

主张息事宁人，议遂定。总工会乃于6月28日宣布解散纠察队并将所有枪支子弹一律缴还政府（事实上还留下些枪支子弹并未全缴），该项枪支交武汉卫戍司令部收，同时致公函于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说明原委。6月28日李品仙军队占领湖北工会，引起武汉工人极大愤怒，但欲抗不能，工人们对于国际、中央俱表示不满。纠察队被迫解散是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事件，中共湖北省半年以来一方面武装工农成立新型军队，另一方面改造原有部队，上述两种方式双管齐下，逐渐取得3万军队，但是就革命形势不断进展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当时所以不能大刀阔斧进行迅速建立党的正式军队，主要是由于国民党的歧视。其次，国民党右派在大量扩军，以倍数计算增加兵员，汉阳兵工厂武器生产力不大，所以供不应求，争夺甚烈，而自国外大批输入又受政治经济条件的种种限制。自5月以后，国共双方关系日趋紧张，根据国际来信指示，只有对国民党忍辱负重，将心相从，以固团结，于是节节后退。即原有武装亦难自保，遑论扩军？自此以后敌势日张，革命政权失御，失败遂成定局。而且1927年南昌暴动失败以后，中共既失去数万武器，遂不得不采用牺牲数倍或十数倍生命，凭赤手空拳去从敌人手中把苏联及美国先后送给蒋介石的大量武器夺取过来的办法，来进行反击国民党，其代价可谓浩大。

3、国际忽传来武装2万党军指示：与纠察队自动解散差不多同时，中共忽然奉到第三国际6月间来信，指示中共武装2万共产党员，该信是罗易在中央会议正式提

出讨论的，指示要点如下：(1)实行土地改革，自下而上没收与分配土地。(2)罢免动摇将领，武装2万共产党员，并从两湖选出工农分子5万人组织新军。(3)改组国民党，使它成为群众的组织。该信在中央会议上传阅时，罗易随时加以说明，颇感兴奋。仲甫听后默不作声，似有难色，轻声说道：“人是现成的，随时都可编队，只是枪从何来？”说罢，把国际指示信件提交会议讨论。大家在讨论这个指示时，中委多认为争取工农武装，在5月以前早就应该提出，那时汪唐对中共尚表恭顺，但目前形势已非，汪唐态度大非昔比，此时要通过国共联席会议的和平方式来武装工农是行不通的，用和平方式改组国民党，由汪精卫来一个左的清党现在更是空想。所以国际指示无异临渴掘井，也可以说指示来得不及时，缺少现实性。至于采用非和平方式去取得武装，那就是一个组织内战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要从新军阀手中夺取武器，但是国际来信显然不主张这样做，来信指示要紧紧靠拢国民党左派政府，中共不应自树旗帜，所以对信件讨论一时竟无结果。而更出人意外的是，罗易旋将国际指示信出示汪精卫，汪遂以此为藉口，大做文章，说陈独秀图谋不轨，危害党国，并以此为理由，宣布分共。罗易执行国际命令，本意向汪开诚布公，团结新左派政府，结果是与虎谋皮，打草惊蛇，汪竟以恶声相报，于是外间后来喧传罗易向汪精卫泄漏秘密。关于罗易向汪暗中输情有二说：一说罗易奉国际命令行事，非个人行动，究竟罗所奉令内容如何，他人不得而知。另一说罗易素有稚气，对汪深信不疑，接指令后，估计此事不

可能秘密进行,体会国际意图不如明告汪为宜。就以上推论,罗易所为,似非暗中输情可知。

国共危机恶化过程与最后决裂

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关系以郑州会议后鲍罗廷停止出席联席会议,左派操纵会议迫使中共节节退让,国际接连不断命令中共对国民党左派容忍,并投身到国民党中去,使国民党成为劳动人民的党。但自6月中旬以后两党关系日益恶化,至7月15日乃至完全决裂。

1、国际11月决议:自1926年以来,国际一贯主张中国革命事业应由中国国民党担负,并根据此种观点,发出一系列的指示,如1926年11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有云:“中共应该使国民党成为真正平民的党。”因此,当时外间有人推断国际扶植国民党,逻辑上的结论必然会解散共产党。

2、4月国际代表宣言:1927年4月22日汉口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其口号是“打倒蒋介石主义,打倒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国民政府万岁,国民党万岁。”宣言中竟不提及共产党。1927年5月18日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强调说:“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国民党是中国固有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合作的党。”又云:“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左派,就其阶级成分说,不仅代表工农及手工业者,亦代表一部分中产阶级……他

已经走向工农专政的道路。”从国际指示中可以看出当时国际主要意旨：命令中共拥护国民党到底，中国革命宁可无共产党，但不可无国民党，第三国际领导把中国革命大业主观片面寄托在不断蜕化的国民党左派身上。

自5月份起汪精卫开始发动攻势，如5月8日汪下令禁止工人集会与游行，14日下令禁止工人纠察队行使职权，19日令对劳资纠纷实行强迫仲裁，23日下令保护绅耆，这一系列措施，使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6月1日武汉政府下令宣布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鲍黯然受命，苏联政府默无表示，汪唐等喜形于色。6月5日，江西朱培德遣送苏联顾问出境后即仓皇离汉。6月19日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议，冯玉祥素以“亲俄派”著名，所得苏联武器、物资独多，至是倒戈，联蒋反共，苏联仍无表示，冯、蒋声势益张。武汉方面受冯、蒋鼓舞反共益烈。汪、唐趾高气扬，目无中共，着着进攻，湖北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遂于6月28日被迫解除武装。6月28日李品仙派军进占湖北总工会，限制工会活动，工会开始转入秘密活动，向忠发卷逃。8月5日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式封闭总工会及其所属各工会。汪唐为准备实行反共在政变前先作好军事布置，7月6日第四集团军唐生智就任总指挥职，张发奎就任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唐、张准备以武力逐共，但张代汪发言仍强调国共合作到底。

3、中共中央决议11条：中共中央于1927年6月30日在国际代表监临下，召开中央扩大会议，集中研究讨论国共关系问题，感到进退维谷，并无有效方略。当时多数

中委见大局岌岌可危，纷纷请求到各省去做群众工作以挽危局，最后中央扩大会议秉承国际指示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 11 条，其主要有 6 项：(1)承认国民党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党及其对革命的领导地位。(2)两党联席会议不是国共会议公开执行形式，并非联合政权。(3)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部领导监督。(4)工人纠察队可减员或编入军队，纠察队不得捕人审讯。(5)限制店员工会拘捕店东及过高经济要求。(6)禁止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但国民党左派认为中共软弱可欺，即迫使中共党员退出政府。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深信左派忠于革命，按照国际意图于 1927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国民党的危险及其出路》一文中说道：“属望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团结起来，巩固正统的国民党，实现工农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这次呼吁无效，直到分共前一星期，即 7 月 8 日，仲甫在《向导》第 200 期上仍寄希望于汪精卫“来一个从左边的清党运动”。

4、国际训令不得退出国民党。7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7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布退出政府宣言，同时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1927 年 7 月 13 日，中共中央通过对时局宣言：主要是谴责武汉国民党领袖与封建地主及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同情反革命，并列举以下事实为证：即 4 月间拒绝公布土地委员会关于土地制度改良的决议案，阻挠劳动法的制定与公布，并发出许多训令限制工农运动，帮助反动派进攻农民协会，对许克祥屠杀工农采取放任态度等等。宣言严正声明：“中共将

继续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进行斗争，为工人利益及解放农民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永久认为革命利益与民众利益高于一切——较之保存某种政治联盟的领袖结合高出十倍。中国共产党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军人以及犹豫骑墙的政治家，冒充国民党员假借孙中山的旗号以自文饰”（宣言刊在《向导》周报 201 期）。与 7 月 13 日宣言同时，中共中央提出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表明中共政治态度：（1）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列强武力干涉中国，收回租界，取消外商在华一切经济特权，实行关税自主等。（2）颁布工厂法，劳动保护法，统一财政，合并中、中、交三银行，收为国有。（3）巩固革命联合，召集国民会议，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4）工人施行 8 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工资，扫除封建式劳资关系，保护童工、女工，工人有组织工会、罢工、武装、纠察权等。（5）农民实行二五减租，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土地，保障佃耕权，严禁高利贷，取消团防局等。（6）对军队实行退伍军人分给土地、改良士兵生活，发清欠饷，优恤残废军人等。（7）对教育确定教育经费，增加小学教师薪金，提倡平民教育等。（8）禁止缠足，童养媳，及买卖妇女，男女在法律、政治、经济与教育上一律平等。

5、国共分离：上述纲领是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前夕留下的重要文献。在政纲公布后两日，即 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不顾一切，仍悍然宣布分共，国共双方正式决裂。7 月 13 日中共中央宣言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党员，苏兆征直陈政见不合辞职，谭平山称病辞职，其他诸

同志均奉中共命辞职，退出国民政府。

武汉国际人士及其撤退

武汉时期是我党与国际组织接触最频繁的时期，极富有国际气氛。世界许多国家的工农代表自2月中旬先后到达武汉，在武汉参加省委所属各工会、农会工作，历时约5个月之久。这些代表分属于第三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与妇女国际等组织。第三国际代表以印(度)共书记为主要负责人罗易(Roy)、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以美共书记柏尔德(Berand)、英共委员汤姆森(Tomson)、法共书记多里阿(Dolio)等为主要成员。农民国际代表团代表为卜里茨(Blitz)、约克(York)等。现对其中一些主要人物介绍如下：

罗易：罗易于1927年2月16日到武汉。罗，印度人，孟买富商子，留英伦政治经济学院，1915年被迫离开印度流亡瑞士，1924年致函英工党政府请求特赦未准，乃进入苏俄。他是印度共产党创建人之一。来中国时年40许，其妻安娜Anna年18岁，苏联人，随来武汉任秘书。罗易高自期许，遇事乐观，平日好大喜功，惟无远虑。但当时颇受重视。平山谓：“远来梵僧会念经，理有固然！”罗易与汪精卫往还稠密，汪见罗易称先生，礼貌甚恭，罗自谓能影响汪，不知汪心怀诡诈，反玩罗易于股掌之上。国际指示武装2万共产党员文电到武汉，罗不加思索认为奇策，谓立刻可以扭转当前局势，因欣然往告汪，汪遂反目，

据以分共。罗大窘，知上汪当，后悔不迭。罗离开中国返莫斯科，无事可做，乃自行返印度。罗回印度两年后于1929年7月公开自组新政党。

柏尔德：美国人，少入加利弗尼亚州大学读书，后赴欧洲游学，参加工人运动，为美国共产党创建人，被选为美共中央书记。柏体貌清癯，朴实诚笃，到中国后对各项现实政治问题详细观察，分析至当，然后始作决定，对中国革命工作协助颇多。柏擅长说理，下笔如行云流水，实美洲工人运动中杰出人才。1928年仍留中国上海工作。柏对中国革命问题认为应循工人运动正轨，中道而行，用最少牺牲获最大成效，如果路线失误，纵暂获成就，亦难免后日灾难，柏对于国共分裂，认为非出于偶然，今后如能认清路线，国共不合作，中国革命亦能成功。1928年柏始返国。

汤姆森：英国利浦尔工人，系工人世家（三代人均作工）。英工会领袖，英气勃勃，年逾50，皓首东来，遇事老成持重，备受群众尊重。汤姆森阅读收回英租界的对外宣言，文中谴责英国资产阶级为国际盗匪 Bandit 一词，大为激赏。但对若干中国革命具体问题常示谦抑，询之则以所知不足对。

多里阿：法国共产党创建人，年富力强，正直不阿，对中国革命十分热爱，热烈赞扬中国工人运动的勇敢与成就。尝出席省委会议讲解法国工人革命运动中诸问题，热情洋溢。某次出席汉阳兵工厂工厂委员会会议，他介绍法国克鲁梭军火工厂工作经验。他说：革命到重要关头的时

候,军火工人就能为工人暴动夺取武器。他又说:真专制要反对,假民主尤应打倒,几世纪来法国工人阶级付出重大代价,争取民主,但仍然没有肃清压迫和剥削,不劳而食的人仍是组成统治阶层的中心人物,反抗统治阶层的人都被强迫劳动。政治上发号施令的人,都是自己贱视劳动,把劳动当作囚犯专业,命令他人劳动的家伙。多里阿被选为法国共产党书记。

苏联顾问:苏联驻留中国工作人员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类。苏联派遣的顾问团主要担任国民政府政治顾问及军事顾问。政治顾问:以鲍罗廷为主要负责人,军事顾问以布留亥尔为主要负责人。外交官有广州、长沙、汉口、上海等地苏俄领事馆及商务人员。此外还有远东银行、进出口商行,附义勇舰队运输用船舶等。除上述经常驻留中国人员外,尚有其他临时考察人员等。

苏联全部军事顾问约 50 余人,其分配如下:“布留亥尔(加伦)任各军总顾问,罗加觉夫任总参谋长,切列多夫任副参谋长,罗兰任参谋部顾问。葛尔培伯特任第一军首席顾问,杰卜罗斯基任第二军首席顾问,马尔赤利克任第三军顾问,帕罗任第四军顾问,雷林任第五军顾问,波列盛科任第六军顾问,兹金任第七军顾问,奥尼依奇任第八军顾问,科密任航空处长,西尔哥耶夫任航空处顾问,西曼洛夫任海军处长,哥列尼任海军顾问,拉德哥维奇任石井兵工厂顾问,贝士查斯特洛夫任炮兵顾问,卡拉卓夫鄂利金任黄埔军校顾问,工程兵顾问为雅阁夫列夫。军委会政治部顾问 4 人,即斯乃德、马麦耶夫、铁罗尼等,政治部

高级顾问为基珊加等。1926年“三月二十日事变”，基珊加、罗加觉夫、察洛班洛夫等被遣送归国。苏联派在冯玉祥国民军方面(1925年至1927年)总顾问团团长为喀尔缅科，参谋长为西尔哥耶夫。各军顾问为马厉洛与西林等。方振武军顾问为安特尔斯，弓富魁军顾问为洛加等。当时各军政治顾问是建立在苏联军火物资基础上的，各军军长初期欲获得武器援助起见，对苏联顾问奉若神明，言听计从，但是后来随军火供应减少，顾问地位亦渐渐下降，最后遂沦为无足轻重的闲散职务。又各军事顾问既居客卿地位，大都无实权，只与上层联络，不问军队内部事务，对于军事毫无影响。

布留陔尔：俄国军事顾问中以布留陔尔为最重要，布留陔尔 Bluchel(本罗马大将名)到中国后改名加伦。布留陔尔 1924 年来中国(1925 年 9 月从广东回北京一次)被聘为国民政府高等军事顾问。布留陔尔地位与鲍罗廷相埒，国民革命军事学校及国民革命军各军军事顾问数十人均受布留陔尔节制。布为南俄农民，出身行伍，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少入陆军大学，好学不倦，在苏联国民革命战争时代屡立战功，任军长职，作战经验极丰富，曾出任远东共和国军区司令。布在各军事顾问中年纪较轻，来中国时不过卅余岁，刚毅木讷，沉默寡言。每出席会议静聆各人意见后，然后发言，发言简明扼要，辩解确切，有当于事理，故聆其片言，可以决断大事。布留陔尔在广东时参与东征、南征、北伐诸役，随军出发，不辞辛劳。每遇重大战役，必殚思竭虑，深谋远计，以定计划。作战时复亲临

战场，屡战屡捷。布在广东时曾亲率第三军南讨邓本殷，将邓本殷全军歼灭。北伐时随军作战。布留陔尔为人谦虚，虽屡著功勋，然不矜不伐，自视歉然，恒若不足。到武汉后出席中央会议，当时局势渐告紧张，布留陔尔尝说省委、中央负责人应懂得军事领导工作，工会、农会会员应轮流参加军事训练，才能应付敌人军事袭击，保卫革命利益。布留陔尔又尝向省委训练班讲演军事问题，他对世界大战史了如指掌，说帝俄军队在谭伦堡之役失败，主要决定因素为兵团运输太缓，反之德国陆军运动十分灵敏。德国在战前建有若干国防性铁路，此诸铁路完全没有商业性收益可言，而国内横断铁路七线亦全部改成双轨，其最重要者则改为三轨或四轨，在毗邻法国边境建有双轨十三线，比国及卢森堡边境有双轨五线，单轨三线，各军事要区之车站更设置有待避线及军用月台等。

反之，帝俄在德国边境仅有双轨二线、单轨三线，所以兵员虽多，反为少数德军所战败。布留陔尔在武汉政府瓦解后，最后离开武汉，于1927年10月6日由上海乘轮经日本返俄国，布归国后在党内斗争中被处分落职。

鲍罗廷：Michel Borodin 为国民政府高级政治顾问，鲍为国际代表中杰出人物，俄国人，少游学英国、德国，英德文均能写作。鲍来中国时年50左右，才气纵横，风怀超迈。鲍夫人40余，亦通晓英、德、法文，同来武汉工作。鲍身体魁硕，貌类蒙古人，好骑马，有辩才，析理明道，杂以诙谐，四座翕然。鲍作风开朗，不植私党，常对翻译工作者告诫说：“政党是革命的武器，应该常把磨刀砺石怀在身

边,才能保持锋锐,对付敌人。但同志间应化除私见,才能勇于革命,怯于私斗。”鲍罗廷于6月1日被解除高等顾问职,随后赴江西庐山休养。7月15日以后,武汉国民党左派核心完全消失,苏联及国际代表于7月27日全部离开武汉归国。仅留长沙、汉口、上海等处领事及商业代表等在中国,农民国际代表最后撤离汉口。鲍回国后担任《莫斯科新闻》英文报编辑,后因间谍罪与斯特朗同人狱。

鲍夫人陷狱:鲍罗廷夫人在武汉时尝以国际妇女代表名义参加湖北省委妇联会工作,又常偕妇联干部谢西怀到武昌、汉口各纱厂向女工作讲演,由谢担任翻译(谢原系上海晏摩氏女英语班学生),1927年3月1日,鲍夫人因事返国,所乘为苏联轮船米亚列宁号。轮船达浦口时为张宗昌军队所扣留,鲍夫人被送北京拘留,在监历时4个多月,直到7月12日,北京高等审判厅推事任隽运用大赦令,始释放回国。

苏联领事馆撤退:1927年8月间,长沙领事馆被封闭,7月16日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封闭俄国远东银行。7月26日,南京国民党宣布取消莫斯科中山大学名义。12月1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对苏联撤销承认其领事,停止苏联国营事业,驱逐俄侨,逮捕俄籍共产党员。23日上海苏联领事下旗回国。29日广州苏领事经香港回国。12月15日,南京蒋介石政府正式宣布与苏联断绝国交(延续至1932年2月止)。苏联援助国民党工作至是宣告结束。上距1923年两党合作前后经历4年。

中共全党组织新部署： 巩固全国革命阵地，加强斗争实力

溯自中共建党以来(1921年至1927年上期),由于政治路线方向正确与决策合宜,同时党内组织采取精诚团结,万众一心,艰苦卓绝,努力向前,摧毁强敌,因此7年之间,结集了强大的革命动势与动量,造成1927年的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期间,中共党组织扩大党员与团员达50万人,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实力超过400万人,革命武装近5万人。与此同时,政治威信提高,革命各条战线,汹涌澎湃,沛然莫之能御!大革命高潮时期显著的成就,便是第一次与第二次北伐完成后,扫荡北洋军阀的专制恶毒。武汉革命政府拥有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和亿万人口(两广、湘、鄂、赣等省区)与资源,当时在中共支持下收回汉浔租界,削弱封建势力,给予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武汉政府时代,革命形势发展迅速,由此更进一步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统一全国指日可期,完成民主社会革命任务,并进而开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康庄大道,前途是充满无限希望的。但是遗憾的是:不幸在关键时期,由于党经验缺乏,人谋不臧,决策失当,致使大革命事业功败垂成,这样酿成历史上的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时代。这种历史转变的关键应以1927年6月为分界线,由此可证湖北省委扩大会议的历史意义是何等重大。在大革命高潮时期直接领导武汉革命者为中共武汉中央局

(中共中央武汉办事处),具体从事武汉实际革命工作的为中共湖北省委。

从1926年北伐军到武汉时起至1927年7月止,前后11个月时间,中共中央局及其所直属湖北省委、江西省委与湖南省委等,在长江流域从事建党、建军、建立工农革命组织,推动革命进展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党同志壮志凌云,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卓著成效。其中最显著的历史伟绩如:奠定武汉政府基础,铲除贪污,建设廉洁政治;收回汉口与九江的英国租界;发展工农群众革命组织,建立革命武装部队;顺利完成中共五大会决议;临危不乱多次击退夏斗寅、杨森、刘佐龙等武装叛乱。凡此诸端都是在武汉中共中央时期完成的。上述革命业绩声光广被,影响深远,均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按:中共四届中央正式自上海迁到武汉是1927年4月中事,同时中共中央书记随中央迁移同来到武汉至7月离开汉口时止,中央书记前后驻武汉时间为3个月。)

武汉革命危机表面化始于郑州会议(1927年5月),自尔以后,中共中央即开始计议有关应变诸项问题,其经过前面已扼要叙述过,此处所说只是属于中共党内组织新部署事务。在7月15日以前几个星期,中共中央及省委鉴于当前环境下既不能另辟空间,别开局面,又不敢背城借一,冒险决战,盱衡局势,乃采取首先是重新调整工会斗争阵营,包括充实各省工作,加强工会、农会斗争实力,另方面决定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全党一切工作转入地下,作长期斗争,用工农组织力量,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

专制政府。7月间中央连次会议讨论关于与国民党决裂后，党、工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对策，决定中央委员之一部分赴各省市调度充实地方党部，亲身参加指导工农群众运动。基于这个原则决定派到湖南工作者有文虎与润之，到江西工作者有陈潭秋、刘俊山，到北方有王荷波与韩麟符；到广东者有邓中夏、阮啸仙、澎湃、苏兆征等。派到上海者有项英、史文彬、林育南、李求实等。此外又派周唯真到四川，柯庆施到安徽，王儒廷到云南，谭寿林到广西等省工作。中央决定上述措施以后，各省工作迅即稳定下来，在新基础上向前发展。又为了使一部分干部有提高理论学习机会，乃又派遣一部分党员到莫斯科学习。当时决定赴莫学习干部有：夏曦、罗章凤、汪奕、李梅羹、曾钟圣、熊受暄、何叔衡等 30 余人。

中共中央本身因武汉反共，乃决定迁往上海继续工作，仲甫令秘书处人员先行赴沪，筹备迁移各事，并亲自决定《向导》停刊（出刊至 201 期），在中央重迁上海途中耽搁的日子，中央对外暂停工作。

以上诸组织部署大都是经过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联席会议作出决定的。其总的精神是要求在敌方强大攻势到来的时候作好准备，坚决作战，这样才能作到败而不溃，再接再厉，屡败屡战，戮力向前。在往后若干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暗无天日的艰难岁月中，全党组织虽然转入地下秘密工作，但是仍然保持革命朝气，在逆流中继续前进。

（星原 雨笙整理）

反“右派”亲历记

李 新

1957年的反“右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若没有吴老（玉章）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在吴老的鼓励下，我也积极地参加了反“右派”的斗争，特别是参加了反对社会学领域中的“右派”。在把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打成“右派”的错误中，我也有一份责任。对此我在1979年当面向他承认了错误。所有这些，在我的脑际刻下了很深的痕迹，它不时会涌现出来，使我的心情无法平静。因此，我必须如实地把它写出来，让后人知道这一段痛史，以便根据真实情况来评判各人的是非功过。林则徐被贬到新疆后，曾哀叹“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我认为：只要能把历史的真实情况保留下来，青史的是非尽可由后人去评定，当事人又何必去管它呢。

1956年“胡风事件”中，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谢韬被捕了。在解放初期，谢韬和胡华是北京宣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名人物。谢韬因为替胡风上中共中央的“万言书”提出意见并参加了修改而被捕。他的被捕引起的震动不小。经过吴玉章的追查，罗瑞卿（公安部

长)很快就说是抓错了。但又不能释放(因必须经过最高领导同意才行),于是决定让他到被关押的战犯中去做工作。在清查“胡风分子”时,何干之也名列其中,就在要逮捕何干之那天晚上,恰好我因公去杭州赶回了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把我找去征求意见,因为我坚决反对,公安部的同志才没有把何干之抓去。

紧接着“胡风事件”之后,机关内部又展开“肃反”运动。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肃反运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当要把一个1946年就已将历史问题交待清楚的教师定为历史反革命时,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也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后来又偷偷地仍把他定了历史反革命。因此我对1956年的这些政治运动是心存不同意见的。

但1956年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引起了我很大的幻想。因为从1956年起,我开始被高教部调去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的教材,觉得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从事历史研究大有可为。同时,全国政协建立了社会主义学院,请吴玉章任校长,杨明轩、千家驹、聂真任副校长,要我去任教务长并讲授革命史。统战部在社会主义学院提出三不方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样就使得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学和讨论都非常活跃,全校充满了欢乐气氛。

1956年中共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认为暴风疾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应该专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而使全国的政治气氛趋向缓和,人们对前途都充满希望。

1957年之初，毛泽东提出中共要整风，希望各民主党派帮助。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开始意见较缓和，大家都高兴。后来意见提得尖锐了，人们的心情也开始紧张。等到有人提出国家的领导要“轮流坐庄”时，毛泽东生气了。便发动全党实行反击，一下把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给他们以严厉的处罚。大多数是劳动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恢复名誉；有不少人从此耽误终身，甚至丢掉了性命。

1957年反“右派”初期，我没有积极参加。因为1956年我被调去编写教材，连党的组织关系（临时的）都转到高教部去了。为了逃避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我星期日都不回家，以免碰见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人（那时我和他们同住在东四六条38号）。我平时在近代史研究所编书组工作，假日则回西郊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与何干之为邻。我们两人对当时的形势都很关注。我最担心的是怕他要挨整，因为“胡风事件”牵连着他。我主张他要对反“右派”表现积极，但又不可多说话，而且说话要特别谨慎，以免被人抓住辫子。我们当时哪能想到，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竟要把“右派”帽子往我的头上戴呢？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搞得热火朝天。因为我事前知道党的策略，我想什么话都不说，等一阵热潮退去也就完了。谁知就在把吴景超、李景汉等人打成“右派”后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人（党组书记）竟然想趁机通过北京市委把一顶“右派”帽子安在我的头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实在可怕极了！

就在我从编书组回到西郊的一个晚上，党委办公室的一个好同志匆匆忙忙地把刚出版的《党内参考资料》（北京市委的内部刊物）送给我，要我立刻打开来看。我打开一看，呀，不好！那上面在显著地方，登着一则中国人民大学反“右派”的报导说：人大党委常委李新居然擅自召集校务委员会，让大“右派”分子吴景超、李景汉参加，引起广大群众不满，连党外教授赵锡禹等人都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个报导让读者看了，一定认为李新是吴景超、李景汉的后台，是隐藏在党内很深的“右派”分子。我看了这个报导，怒不可遏，来不及和何干之打招呼，就立刻赶回家中，连忙写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准备送交《党内参考资料》编辑部，希望他们于下期登出来，以正视听。

在要发信的时候，一想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该先请教吴老才好。我于是拿着信和刊物，忙到吴老家去。吴老住在六条39号，就在我们38号的旁边。我见到吴老的时候，虽然很恭敬地喊了他一声，但余怒未息，心里还是气鼓鼓地，吴老一定看得出来。我把刊物翻到登报导的那一页，和我要求更正的信，都放到吴老的茶案上，希望吴老看一看，并指示我是否可立即发出或需要如何修改。吴老客气地笑了一笑，使用镇纸石把两样东西压住，然后，对我说：“你先到书房休息一下，看看书吧。”吴老的书房，就在他办公室旁边，我平常见他的时候，常到里面去看书。但今天进到书房，什么书也看不下去。稍等一会，我又走出来，走到他坐的沙发旁边。还没等我开口再问，吴老就说：“别急嘛，先看看书，冷静冷静再说。”我这时的心情，

也确实冷静下来了。我想吴老见我这么急，他却一点也不急，这其中必定有道理。我于是从报架上拿下一些外地报纸来看。我估计吴老已经看完了我的东西以后，才慢慢地回到客厅。这时，吴老手中拿着我的东西，见我走到他面前，便又把它们压在镇纸石下面。过了许久，吴老也不说话。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口问道：“吴老，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吴老沉吟了一会，才回答说：“他们就是要你跳嘛！”只说这么一句，就不再说了。坐了一阵，我只得回家。回到家中，我仔细揣摩吴老那句话，“他们就是要你跳嘛！”看来，这封信是发不得的。《党内参考资料》是市委的党刊，你若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说你反对市委。我于是感到去请问吴老，这一步是走得太对了。

当天晚上，吴老又派警卫员叫我去。他亲切地对我说：“反右派是毛主席决定的嘛，你怎能不参加呢？我已经跟胡锡奎校长说了，他会找你谈的。”

第二天，胡锡奎找我谈话，说已经告诉高教部，要我回校参加反“右派”斗争。并且分配给我就近指导城内两个系的运动，这两个系就是新闻系和档案系。档案系运动的情况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但新闻系一次会议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而且始终感到内疚。

那天是由新闻系召开北京新闻界的座谈会。系主任安岗要我主持会议。我于是请大家对党的新闻工作发表意见。大概到会的新闻系统的人员都不知道我党这次“引蛇出洞”的策略，他们的发言非常激烈，对我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在会场热烈情绪的鼓舞下，安岗也

忍不住起而发言了。他说：“毛主席就不断说，他最不爱看《人民日报》，死板板地……”。我连忙暗地里扯了他两次衣服，希望他及时停止发言。但他的兴头很大，一直讲个不停。不得已，我只好宣布休会一刻钟，随后再继续开会。在休会时，我把安岗拉到一旁，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等续会时，我故意问安岗是否继续他的发言，他说他的意见已经讲完了。我于是请别人发言，特别请校外的人发言。这时，彭子岗起来发言了。她说话时激昂慷慨，首先批评《人民日报》，说它拥有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却完全脱离群众。她问道：“现在，谁还喜欢《人民日报》呢？连毛主席也不爱看了。”说到这里，会场上为她鼓起了掌声。她随即又说：《大公报》人手不多，经费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有许多文章，很快就流传全国……。她越说越有劲，还是她的丈夫徐盈劝阻了她，她才结束了发言。

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根据校部要求，很快就整理出来上报了。彭子岗就是因为这次发言被划成了“右派”，因为安岗是新闻系主任，记录对他的发言记得很少，上报时可能又有删节。彭子岗是校外来参加会议的，又是名记者，而且那天她讲得最多、最激烈，所以记录对她的话记得最详细，后来根据记录来划“右派”，她自然就无法逃脱了。彭子岗是彭华的姐姐，而彭华在抗战时期，一直和我在青委系统共事。1946年，我在北平军调执行部工作的时候，彭子岗和徐盈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在4月3日滕公馆事件后招待记者，还是由子岗用电话新闻的方式把消息

刊登在《大公报》上。从此，直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而这次座谈会竟使她被划成了“右派”。这次，我客观上保护了安岗，为什么不能保护她呢？倘若能事前给她打个招呼，不是也可以使她免遭大难吗？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真是太不够朋友了！对此，我一生引以为憾，始终感到内疚。

这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走入高潮，全校大约已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划“右派”要经过党的常委会讨论。李培之和我在常委会上，尽量把各系总支上报来要划“右派”的人减少，故意挑剔某某人的条件还不够，或情况还不够具体，希望拿回去搞清楚了再说。这样推、拖的结果，就少划了些“右派”。但有的系总支，由于领导人的借机整人，就是抓住一些人不放，非把他们打成“右派”不可。例如经济系有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但系领导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几次送到常委会讨论。常委多数同志“爱才”，说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应好好地教育他、教训他。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高潮中斗争得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她羡慕毛主席表扬了李希凡和兰翎两位青年，才改成了这个名字。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吴老认为她是个人才，在颐和园里为她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供她写作。后来中国人民大学还专门开了一次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会议，把李希凡（曾在人大学习过）和他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吴大琨请来参加了会议。吴大琨就是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后才调到人大的。林希翎因研究红楼梦出了名，反“右派”恰好轮到了她头上。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党委从全校找到了一些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斗争会。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群众高呼口号，才能将她压倒。像这种斗争的准备和召开过程，我是从不参加的，但听到情况后也觉得十分滑稽可笑。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斗争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和谭天荣一时成了北京学生界的著名人物。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当然是弄去劳动改造，甚至受到异常痛苦的遭遇。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右派”才得到平反。人大党委把给林希翎平反决定派人送去给她时，派去的人以为她会感谢涕零，谁知她却不甚答理，于是，这人便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之一。80年代，林希翎被允许出国。台湾把她请了去，希望她能骂中共，给台湾说几句好话。但她并不骂中共，也不给台湾说好话。人们以为她一定会到美国去，但她却去了法国，显然，她到美国谋生会比法国容易。但她有头脑，认为这样做要高尚一些。现在不知她怎样了？写到这里，实在令人叹惋。

过了多少年后，我才深深体会到，当年要不是吴老的帮助，“右派”帽子肯定戴到了我的头上。我后来的经历，

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吴老的指点，我不是也会像葛佩琦那样去要求更正吗？而要求更正的结果是迎来全国的大批判！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所以才能得救。但是，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为不在身边（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对此，他虽没有任何表示，但每当他的二外孙女（吴蜀平）来看他的时候，我从旁也能看出他内心的痛苦。吴老啊！您是多么好的人啊！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和日本、法国、俄罗斯等世界各国一切先进文化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人类先进分子，像吴老这样的人是永远值得人们敬爱和学习的。

在吴老指导下，也在李培之等好同志的影响下，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绝没有存心去害过人，而且是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特别是对一些青年，凡力所能及的都为他们说了话。但是，像林希翎那样的“名人”，我就实在是爱莫能助。就是像孟氧那样的人，我虽然说了话，开始也起了点作用，最后还是挽救不了。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高潮是在夏季，但一直延续到秋后，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地区，仍在进行。例如：社会学领域的全国性反“右派”斗争，就是秋后进行的。中国人民大学党组织认为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学问题有“研究”（或了解），就派我去参加了领导这场斗争的党组。其实，我不仅对社会学毫无研究，就是对马克思如何批判社会学也毫无研究。我只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他批判社会学鼻祖孔德的一些观点。至于孔德的书，我一本也

没有读过。据我现在的记忆，批判社会学的那个党组好像是直属中央(或中宣部)的，组长是谁已记不清了，经常召集开会的是副组长赵守攻，他当时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专家局局长。赵和我在中共北方局共过事，他一见我非常高兴。范老(文澜)也参加了这个党组，他是由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派来的。我见范老后，就向他谈了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情况，并表示希望离开人大到近代史研究所去。他听后对我极表欢迎，并说：“我那里是和书打交道的，不像和人打交道那样复杂。”此后，我就想法调动，最后，还是同吴老商量，先把我调到文改会过渡，直到1962年才正式调到近代史研究所。范老和我虽然都参加了社会学反“右派”斗争的党组，但我们两人都不积极，不过，对所有那些人被划成“右派”，我们也都是同意了。例如：对专家局副局长费孝通，赵守攻把他说得很坏，说费是个大野心家，因此，把费孝通划为“右派”，我也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1979年，中美刚建交，社科院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访美，费孝通和我都是其中的成员。这时，我当众向他表示道歉。他忙说：那不能怪你。我说：把你打成“右派”，主要的责任当然不是我，但我当时也确实把你看成“右派”了，所以道歉是应该的，而且也是真诚的。从这以后，他又发达起来了。不过，我们似乎也未再见过面。

关于反“右派”斗争的事情，我知道的还有许多。因为我这篇只是写亲历的，因此，其余的我就不写了。

我和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 中的生活片断

刘 英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闻天在山上惹了大祸，7月21日一篇讲话，换来两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闻天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会后，外事系统进行了对他的批判。当时我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监委书记。作为闻天的妻子，我也成了外事系统批判的对象。

1960年11月，闻天被调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1964年我被安排到近代史研究所。

从评《海瑞罢官》到批“三家村”，“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我们开始感受到这场政治风暴的低气压了。1965年接替尚昆同志主管中央办公厅的那位主任，先是吊销了闻天的“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内部电话机），后来又搬走了煤气罐，取消了小轿车。只保留了警卫员和炊事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的处境要比闻天好些。我没有被捕过，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又没犯过政治路线错误。作为近代史所的工作人员，我还可以参加造反派组织

的群众大会，学习有关语录，还可以看些材料。我曾经看到中央一位领导对社会科学院的一篇讲话，说孙冶方是反动学术权威，后边有个括号，里面写着：关锋插话：他的后台是张闻天。我知道，闻天早晚会被批斗，从此我整天为他担心，可又不敢告诉他，怕他紧张。

1966年8月9日，经济所通知闻天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刚好他和身边工作人员孙式平到王府井买书，回来后得知这一消息，长时间被冷落的闻天挺高兴地说：“好久都不让我参加会，今天终于让我参加会啦！”事先我通过近代史所范老的几个研究生得知，这个会是批判孙冶方的，内心暗暗希望不要连带闻天。可这种会不去又不行，我只好嘱咐小孙和他同去。

这次批斗，闻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到了礼堂门口，他对孙式平说：“你要是不愿意听会就出去转转，快散会了再来接我。”

进了会场，闻天才知道这是“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大会开始不久，造反派一声吼叫：“把反动学术权威孙冶方的后台张闻天揪上来！”于是，闻天被架上台去，挂上大牌子，强行作“喷气式”。

会场外的小孙听到里面喊口号，趴在门上一看，见闻天在台上挨斗。他急忙跑到中南海东门给警卫局打电话，对方慢悠悠地说：“群众运动我们也没有办法，等斗完你把他带回去就得了。”小孙又跑回来通知我，等他赶到三里河经济所，会已经散了，有人告诉他：“张闻天坐13路车回去了。”闻天回到家中（景山后街甲1号），疲弱不堪，

我扶他躺在藤椅上，见他上衣扣子全被揪掉。他告诉我，今天批斗的时候昏倒了。

从这一天开始，无论是风霜雪雨，还是酷暑高温，只要造反派有令，闻天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交代、检讨材料，换两次车，去经济所接受造反派的审问批斗。

闻天被斗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北航。那是1967年7月26日，批斗会是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联合召开的。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中央要公布庐山会议决议，为了配合这一重大事件，造声势，所以要再次批斗彭德怀和张闻天。这次号称万人大会，也是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悲惨的一天。

那天天色沉黑闻天才蹒跚着走进家门。我焦急地迎上去，说：“你怎么这个样子，狼狈不堪的。”他有气无力地说：“你看看我的头，痛得很厉害，头昏。”我看他满头青包紫块，连忙扶他躺下，一面用酒精给他按摩头部，一面询问批斗经过。闻天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只是声音嘶哑、气息微弱地说：“彭德怀打得比我还厉害呀。”我说：“明天叫孙式平到经济所给你请个假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闻天的人身安全丝毫没有保障，红卫兵可以随时从天而降地把他揪走。一天半夜，我和闻天都睡下，孙式平照例拿走我们房门上的钥匙（第二天一早再插到门上）后，也睡下了。半夜，听见院子里“咕咚”一声响，孙式平赶紧跑出去，见一个人跳墙而入，打开了大门。更多的人涌进来，扬言要带走张闻天。孙式平问他要经济所的介绍信，说随便逮人不行。来人蛮横

地说：“我们是外交部的，张闻天是我们的人。”孙式平也不让步：“他现在不是你们的人。”闻天听见吵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打开了灯。这一下造反派就从窗户跳了进来，喝令我们：“起来起来，跟我们走！准备开斗争会！”

闻天和我被带到一辆卡车上，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被逼迫着喊“打倒反党分子张闻天！”“打倒张闻天的老婆！”之类的口号。一路闹哄哄地来到外交部，造反派把我们关在旧办公楼的一间小房子里。屋子里乱七八糟，脏得要命，有两张行军床，没有任何铺盖，我们只好合衣躺在上边，哪里睡得着？

第二天早晨，给我们打来了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吃饭！吃了饭要开斗争会！”

我一肚子气，什么也吃不下。闻天很沉着，他悄悄对我说：“你要吃一点，不然顶不住啊。你看，这霉豆腐里还有点辣椒呢，来，吃一点。”说着，他夹起一块霉豆腐辣椒放到我碗里。在闻天的劝慰下，我勉强喝了半碗粥。

喝过粥，造反派就来了。先拖着闻天和我到处示众，几乎跑遍了外交部的每一个办公室和宿舍，其实好多房间里根本没有人，不过是折磨我们而已。我个子小，腿都跑木了，可一旦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就要挨骂。

接着便召开斗争会，造反派是机要室的，名字起得怪里怪气的，叫“大喊大叫战斗队”。台上挨斗者很多，闻天首当其冲。一会儿叫他作“喷气式”，一会儿问他问题。闻天沉着冷静，不多讲什么，只答“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造反派上窜下跳，他也不动声色。我想看看台上挨斗

的还有谁，有熟人没有，忍不住抬起头来。“不准东张西望！”随着一声大吼，我的头就被掐下去了。等他们不注意了，我又偷偷地看，见台上有乔冠华，姬鹏飞……外交部的副部长都在那里。我看到会场上的大标语“打倒陈姬乔！”心里还直纳闷：对外友协的人我都认识，没听说有个叫陈姬乔的呀。后来才知道陈姬乔是指陈毅、姬鹏飞、乔冠华。

大会结束后，造反派用卡车把我们送回家，把两个“反党分子”的大牌子挂在我们门口。一会儿，孙式平进来说：“门口两个牌子惹得好多人来看。”我说：“拿下来，烧掉它！”小孙就把它扔到锅炉里烧了。闻天有些担心：“你不应该烧哇，他们要是来要就麻烦了。”我说：“要他个屁！管他这一套干嘛？这些家伙你跟他讲什么理呀？你文明他还是野蛮，你就野蛮对野蛮嘛！”

还有一次，天津南开大学的“抓叛徒战斗队”来揪斗，搞了辆大卡车，把闻天和经济所的另一位同志一起拉到南开大学。当晚，闻天住在学生宿舍。半夜里，服务员突然进来，通知他走。

闻天到家时，已是半夜一点钟。见到他我又惊又喜：“你怎么回来了？”他还满潇洒地：“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把我弄到哪儿去，谁知又回来了。”后来才晓得，周总理曾对造反派说：“张闻天就住在那里，你们什么时候去调查不好，非要晚上，这样搞我不赞成。要斗就在当地斗，不能拉到外地去斗。”从那以后，再也没拉到外地去斗过。

在闻天身处逆境的日子里，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荣

辱,而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他曾私下对我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话不妥当。如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那这个党不就变质了吗?变质了的党不都要推翻吗?这个提法不对。”我说:“这话可不敢讲啊。谁知道上边是怎么一回事,摸不清啊。”闻天分析说:“看来要把上边这些人都打掉,另外一批人要上台。你看连部长、副部长都打倒,打击面越来越宽了。”见运动迟迟不结束,他叹息着说:“这样下去国家要不行啊。把上面负责人都打倒了,国民经济、人民生活谁来管?”

就在闻天为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担忧的时候,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1968年5月17日,经济所来电话通知闻天不要出去,近代史所也叫我不要去上班,在家等着。下午四五点钟,几名军人来到景山后街甲1号我们的寓所,首先把守住门口,然后分别进到闻天和我的房间,责令我们坐着不准动,宣布:从今天起,对你们实行“监护”,你们不能出门,不能和亲属来往,不能互相见面。

一阵翻箱倒柜的大抄家之后,闻天和我被分别关进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北房里。搬走了里面原有的家具,把炊事员黄关祥那里的两张不睡人的木板床放进去,外加每人一个三屉桌,一个凳子。门窗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门上挖一个小方洞,警卫日夜监视窥探。进去之前,造反派勒令我们交出身上诸如手表、钱一类的贵重东西。

会客室变成了审讯室。原来墙上优雅的字画被粗暴地拿掉了,代之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对敌斗争的

语录。几张桌子拼成一个长台子，后面坐着来自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审讯者；作为受审者，闻天和我只能坐在屋中间的凳子上。

关于闻天的所谓“里通外国”、“庐山会议”、“61人叛徒案”等“罪行”，造反派已不知审问过多少次了。闻天的回答无懈可击，让他们抓不到把柄。所以，这些专案组的人想从我这儿找到突破口。

审讯者问：“张闻天上庐山和彭德怀同乘一列火车，车上谈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是中央委员，又没去参加会。他们谈的都是些经济问题，我又不懂。我一天到晚忙干部工作忙得要死，哪有时间和他谈这个？他回来又没向我汇报，我哪儿知道他们谈什么？”这些人不满意我的态度，说：“你要端正态度！实事求是地讲。”我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张闻天是反对大跃进的，他说这是得不偿失，老百姓遭殃，报上来的粮食、钢铁产量都是假的。外交部大炼钢铁他是制止的。”我“揭发”的这些他们不需要，这些问题闻天早已讲过多次，他们已掌握得烂熟了。他们想从我这儿挖到张闻天“里通外国”的罪证。

当初闻天和我赴合江工作之前，曾到哈尔滨找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当时一位苏联中将准备支援我们一些物资，需要有人前去交涉。陈云同志不懂俄文，带翻译又不方便，而身分低的人去也不行。闻天是政治局委员，又精通俄文，正好适合担当此任。他把得到的枪支、电台等东西交给陈云同志后，就到合江去了。这就是所谓“里通外国”罪行的由来。

对于这个问题，专案组的人问得很细：张闻天到东北同行的人有谁；和那个中将谈的什么，当时有谁在场；苏联人为什么要给电台，是不是约好日后同张闻天发报；合江也有电台，是不是那时候带去的。……

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真叫人哭笑不得。我尽量耐着性子和他们解释：“发电报是机要员的事，当时的机要员都在，你们去调查吧。同苏联接触的是东北局呀，我们合江只是个地方，苏联人给张闻天发的哪门子报？”

审讯者不甘心，又换了一个角度问：“你跟着张闻天几十年，外交部十年，你不了解他？”目的还是要我揭发闻天“里通外国”。我说：“正因为 I 了解他，所以我相信他绝不会里通外国。张闻天到外交部交涉问题的时候，我作为夫人是不能跟着去的，但是每次都有翻译或参赞陪同，你们不信可以去调查。再说，外交场合苏联一向很严格，都是公事公办，谁会跟你闲聊天？见苏联外交部长都不是很容易的事。”

我这样反反复复给他们解释，他们还是不信，这些调查历史问题的人对历史一点都不懂。他们问：“东北局书记是谁？”我回答：“是高岗。”“错了！你瞎说！”他们冲着我乱吼，“东北局书记是林彪！”我说：“林彪是司令员呐。你们可以去调查，问问林彪同志就知道了。他当时在前方，辽沈战役不是他参加打的吗？”这些人对历史完全无知，我给他纠正，反说我不对。我便闭上嘴不作声。

见我不讲话，他们恼羞成怒，冲我乱喊乱叫拍桌子。我强忍愤怒说：“延安整风运动审干阶段，康生怀疑外边

来的知识分子是特务，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好多冤案。后来毛主席批评他们，规定了九条方针，经过调查研究，冤案都平反了。你们今天不要再搞这一套。”“你反对延安整风！”他们趁机送我一顶帽子。我把他们顶回去：“我不反对延安整风，但是我反对抢救运动。这个毛主席也反对。”这样审来审去，他们拿我也没办法，说我“态度不好”、“顽固”，又口气和缓地对我说：“刘英，你要争取反戈一击有功。门是开着的，只要你揭发张闻天，马上放你出去，立刻分配你工作。”我说：“我没有东西好讲，总不能编哪。我是老干部，不能骗党。没办法，不放就不放吧。但是我相信党会给我落实政策的。”

就这样，专案组对我和闻天的审查不停地进行下去。今天审查我，明天审查他。并强迫我们念墙上的语录。我偏不念，骗他们说：“我眼睛看不见。”“把眼镜拿来！”戴上眼镜，我只念了一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表示抗议：“这个是对敌我矛盾说的，我又不是敌人，不念！”他们还逼我：“念！”我说：“你们要审查问题就审查，但是我不念这个，这种敌我矛盾性质的东西不适合我。”说完我就坐下了。他们拿我没办法，以后也不叫我念了。

每次审讯完了还要写。专案组拿我和闻天写的材料进行对照，希望找到漏洞，可惜从未如愿。这样折腾了好些日子，他们看从我身上也榨不出油来了，就宣布：“刘英，我们要审查你历史。”我说：“太好了，欢迎你们审查。对于过去，我完全问心无愧。”“你真的问心无愧吗？”我说：“当然。革命几十年，我一天也没有脱离过党，没犯过

政治错误,对工作非常服从,从不向党讲价钱。我20岁参加革命,1927年白色恐怖之下没有动摇,有人证明:李维汉,再:周恩来。1929年周恩来送我到苏联去学习,4年后回到中央苏区。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都是我的证人,你们去查吧。我在长征中的表现,许多老同志都可以证明,像蔡大姐、邓大姐……”他们打断我:“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说:“毛主席、周恩来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去查吧。”

专案组的人真去调查了。他们找到财政部的一位大姐朱端绶,她是我长沙师范的同学,当年一起入党,在一个支部并肩战斗过的。从她身上专案组一无所获,反倒碰了一鼻子灰,以后也就不审查我了,又重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闻天。

郭绍棠(又名郭肇唐)是闻天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后来他们又与王稼祥、沈泽民一起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郭后来在苏联东方研究院任顾问、教授,建国后与闻天有过一些来往。专案组妄想从闻天与郭肇唐的交往中找出他“里通外国”的新“罪状”。下面是专案组对闻天的审讯笔录:

审 讯 笔 录

1969年4月21日

自9时30分

问:五八年和郭肇唐谈了些什么?

答:五八年(在)陶然亭遇见郭,他到我家吃顿便

饭，谈了大跃进的情况。我谈到大跃进的缺点也是可能的。

最后一次是送刊物，告别性质的。我到外交部，经过他那里，时间比较短，我去时他在整理行李等东西。

(声明：心脏痛，要含片。给了一片硝酸甘油含片。9:45)

看他(郭)谈他们代表团有人对大跃进表示怀疑，我说了我们也知道有些缺点，正在纠正。郭对热情接待他表示满意。

面对专案组在与郭肇唐关系问题上的反复纠缠，闻天始终镇定自若地讲述事实，不给对方留下钻空子的余地。1969年4月16日的审讯笔录这样写道：

问：五八年布拉格会议(路)过莫斯科时的问题。

答：五八年布拉格会议没见到郭肇唐。(为)解决陈楚问题在使馆住了几天。

(指出态度不端正，要求提高认识，认真彻底交待问题。交待政策，指明方向，令其反省，明天继续交待)

张：你们要的什么东西我知道，这些我没有。我的问题都讲了，可能有忘记的，也都是些不关大局的细节。

问：你对你的问题是怎样认识的？

答：我是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

问：你认为你的问题交待的怎样了呢？

答：你们认为我是“西安”的问题，是反革命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可交待的，没有什么新的可交待的。对我错误的认识给我机会可以从思想上去检讨。我的问题既不是特务又不是反革命。……

在失去自由、心脏病不时发作，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闻天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他在1969年5月26日的审讯中表达了这一愿望：

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成立了，我希望在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继续做些工作。我想得到再教育的机会，继续为党工作，我相信自己是能够改正错误和愿意改正错误的（情绪有些激动，压抑），我想得到再教育的机会，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但是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是学不好的，斗私批修要自我批评，也要得到互相批评才能提高。

从这字里行间，可以看到闻天那一颗愿为党和人民奉献一切的赤子之心！

就这样，对我们的“监护”和非人折磨长达523天，造反派也没从闻天和我这儿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王林育整理）

取消人民公社的前前后后

黄道霞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说：农业“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就是“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①这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关于农业改革思想的起点，也是他农业改革思想的纲。

这也正是邓小平对为什么要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作出的最早探索和宣告。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领导我们首先在农村进行了改革，依靠8亿农民的抉择和创造，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②

但是，邓小平的农业改革思想和废除人民公社制度的决策，经过了长时间（即一二十年）的酝酿，经过了极其慎重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全党和8亿农民的抉择。为此，在改革方法上，采取了渐进式的、分阶段试验式的策略。这是邓小平有特色的、务实的新思想、新方法的实践和胜利。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取消人民公社,是历史的必然。即这正是从我国建立农村人民公社,在农业生产关系上犯“左”的错误,挫伤农民积极性以来客观进程的一种必然结果。

回顾我国 50 年代前期,党领导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总的说是成功的。但是,1957 年后,“左”的错误开始抬头,很快占了上风,便导致了 1958 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 1959 年的反右倾等错误,其中数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错误,给农业造成的问题最严重。

人民公社的缘起大致是:中央于 1958 年 3 月召开成都会议后,农村中出现了把小型农业合作社并为大社的热潮,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并于 8 月被定名为人民公社;同月,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9 月底,公社迅速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它以“一大二公”为特点,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原则,一般为一乡一社。公社内部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贫富拉平,平均分配,无代价上调下属生产队以至个人财产,导致“共产风”严重泛滥^①,给农业造成了大灾难。1961 年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产量都跌落到 1951 年或 1949 年的水平,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破坏,不少农民死于饥饿。

由于这一挫折,全党上下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和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努力纠正其错误。

无疑,毛主席全力领导了纠正实行公社化中的“左”的错误。实际上在 1958 年 9 月底,公开宣布全国已基本实现公社化后不久,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00 页,注释 55。

毛主席就于当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批评了某些人的“产品交换”倾向(即不要货币、商品),批评了某些县“急急忙忙往前闯”和以一个县为单位宣布“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作法(全国先后有94个县这样宣布过);随后,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如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1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3、4月)、第一次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直到第二次庐山会议(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以至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等;制订、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如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4月)、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1960年11月3日)、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简称“六十条”)(1961年3月“草案”,1961年6月“修正草案”);以及毛主席亲自署名给各级领导干部写了多封《党内通讯》(包括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5月2日等信)和大量批转了各省有关农村工作的情况、经验报告;还组织中央、各中央局和省的主要干部下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之,从1958年以后,特别是1961年春以后,中央和毛主席曾经为人民公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界限,陆续纠正了一些错误。

“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①。但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所存在的过分集中与平均主义的问题,农民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仍然受到束缚。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指导思想认真纠正“左”,“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即“‘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

“这一‘左’，直到1976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①。

“左”的指导思想集中表现在对公社所有制问题上，即农业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的问题上。尽管一方面因追求“一大二公”，导致被迫节节后退，从公社化初期实行“一县一社”或“一县联社”（也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或称“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到“一乡一社”，再到“以公社所有为基础”，又到“大队所有为基础”，最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是，另一方面又始终认为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的所有制形式，从概念上讲，它能够把农业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不管它能否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抽象地认定它的深远意义，是它能够成为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和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所以，公社制度，从毛主席1958年8月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到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说已“废除人民公社制度”止，从产生到废除，从肯定到否定，共历时33年多之久（不过，下面要说，实际上是到80年代中期，公社制度就不存在了）。

二

取消人民公社思想的实际酝酿过程。

1、在纠正人民公社错误、三年困难时期

邓小平曾多次坦言，他作为党的总书记，对农村“左”的错误，他“有份”。“中央书记处要负错误的主要责任”。这就是说，在犯错误时，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大体上是一样的，但问题是在认识和纠正错误时各自的态度不尽相同。事实表明，邓小平在这一认错、纠错过程中，虽然总体上也是同毛主席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137、115、254页。

基本保持一致的,但同时他又在若干方面与毛主席等表现出一些不同的思路和新的见解。例如:

——公社化初期,各地普遍实行了实物“供给制”,这种“吃饭不要钱”制度,成为公社分配的一种主要形式,成为公社刮“共产风”的重要内容。1958年11月4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当毛主席批评陈伯达废除货币、商品倾向时,邓小平见机插话指出:“商品和工资是关联的,统统都是供给了,商品也就很难交换了”^①。这样,把毛主席当时注意的废除货币、商品倾向与他不注意的供给制、不按劳分配、刮“共产风”倾向联系起来,提醒公社供给制是当时更现实的废除货币、商品倾向的表现。可是这一插话,当时没有引起重视。到了1959年8月1日毛主席才提出“坚决压缩供给部分”,要按劳分配。到1960年11月3日中央关于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才限制供给制分配部分只应占30%,要“彻底纠正”“共产风”。到1961年6月“六十条”(修正草案)才取消供给制,强调“认真实行按劳分配”。

——1959年7、8月间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当宋任穷等在会后看望因病没参加会的邓小平时,邓直言表示说:彭“历史上是有功的,在平江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斗争中都有很大功劳,不论他有什么错误,这些功劳应当充分肯定。”^②在批彭调子很高时,这样讲公道话表明他对批彭有保留态度。当1962年4月27日,中央发出对“反右倾”等进行甄别平反的文件后,主持这项工作的邓小平当即主张对错被批判者“一风吹”。他说:“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10页。

^② 见1993年3月1日《人民日报》宋任穷文章。

个错误,承认我们过去搞得不对。”“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①。邓小平还总结其教训说:“在这几年的党内斗争中发生了一些偏差”,“伤害了一部分不应当伤害的干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危害”^②。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制订“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时,提出了整顿三类社队和清查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五种人”,但在酝酿、讨论时,毛主席提出清查“六种人”,加“死官僚主义分子”,当敌我矛盾处理,邓小平提了不同意见,认为其标准不好掌握。毛主席说:上不听中央的,下不听群众的,按自己的一套,一意孤行,就是死官僚。邓小平按此标准举某位同志不听话的例子,问这位不听话的同志算不算?毛主席在井冈山就同这位同志熟,一听邓说就犹豫了,说他也要算吗!最后同意文件上不把死官僚与五种人列为一类,“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

——1961年3月10日起,毛主席在广州召开“三南”(中南、华东、西南)地区领导会议,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北京召开“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领导会议,毛主席于13日派陶铸拿着他写给刘、周、邓及会议的一封信到了北京。信上说,现在公社内部,队与队、社员与社员间的平均主义,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并严厉批评说:我看你们对此“至今还不甚了了”,其原因是“不作亲身出马的调查,而是老爷式的调查”。“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信传达后,与会同志不知底细,气氛紧张,不知如何是好?但邓小平当机决断,建议三北会议的同志立即南下,两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9页。

② 同上,第302页。

会合开,这便于毛主席直接领导,利于维护大局。此建议得到赞同,于是从3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统一召开了全国的中央工作会议。

——人民公社生活集体化,办公共食堂,持续的时间长,但中间不少同志向毛主席反映过群众不愿吃食堂的意见,可是都没有被重视、接受。刘少奇对毛主席尖锐地说:吃食堂是“在吃饭问题上,把群众卡起来,那比捆绑还厉害”。1961年5月初,周恩来到邯郸调查,当场宣布解散食堂,并给主席打电话,建议在全国解散食堂。邓小平与彭真在顺义、怀柔调查后于1961年5月13日给毛主席写信建议:“吃食堂,不吃食堂,都自愿,都光荣,都给予便利。”这些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并按其建议,修改了六十条“草案”,把“积极办好食堂”,改为“走群众路线,完全自愿”。特别是邓小平在这次调查中对基层干部说:“你吃食堂叫社会主义,你不吃食堂也叫社会主义。”邓小平当时这样把食堂与社会主义分开,使人耳目一新。这表明邓小平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成熟性。

——公社化初期,全部收回了高级合作社时允许的自留地、户养家畜家禽、屋前屋后林木等所谓私有制的残余,1959年5月7日、6月11日中央不得不连续发出指示,恢复自留地等;随后反右倾又把允许自留地等政策加以批判并取消了。邓小平1961年夏在顺义牛栏山公社调查时,看到张庄农民开的十边地,又深翻,又堆着大粪堆,问陪他的公社书记“社员种十边地有没有好处?”书记不敢表态,邓小平对他说:“有好处。你看翻地这么深,粪堆这么老大,它会不打粮食?打了粮食,就是不卖给国家,人吃了还省国家供应呢。”这充分反映了邓的实事求是精神。

——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对犯错误责任的分析,容易形成个人担责任、或追究个人责任,忽视总结错误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基本上避开了谈论“个人责任”问题,着重讲

了“党的问题”，“党的领导”方面的“严重缺点”。他从“健全我们党的内部生活”、“民主集中制”，从党的领导角度讲了错误的责任，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是党领导负责。这样总结经验教训的视野宽了，认识层次深了。毛主席十分注意倾听邓小平的讲话，他打破常规，在邓小平讲话时，即席当众十次插话^①。

——当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这样一段话之前，陈伯达也在这次大会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上讲过类似的话，邓小平在此前后，已敏锐地感到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在这次大会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上，及时传达了毛主席的有关意见，他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毛主席也并不意味着当圣人。邓小平在此期间曾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的代表人，是我们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②

——1962年5月7日至1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他在讲话中，针对当时克服经济困难“要做的事情很多”，特别提出要把“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作为一项“中心任务”。“有些事情还可以慢一点”，但是“加强生产队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1—317页。

^② 同上，第283—284页。

工作如果抓迟了,就影响农业生产。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拿出来。”^①

——1962年2月13日中央下发确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后,人们原以为核算单位退够了,农业生产关系形式从此将可以稳下来。可是,当年春夏之交,灾荒严重时,各地再次普遍出现了包产到户的风波,全国发现有不小于20%的生产队搞包产到户。7月7日邓小平在一次会上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解答这个问题,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现在百家争鸣。”他提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②邓小平接着说明:究竟采取什么措施,全党在考虑,中央在考虑,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他的意见,可能不算数^③。果然,毛主席于邓小平讲话当天从外地回到北京后,便立即布置陈伯达起草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决定;7月19、20日召开了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起草委员会讨论决定草稿;随后,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接着,8月26日至9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在这些有关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单干风,强调了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最后通过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决定。公社制度就从此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条件下存在下来。

2、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为纲”(包括“十年危难”)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8页。

② 同上,第323页。

③ 同上,第324页。

时期

从1962年秋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开始,到1978年冬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在此期间,邓小平无论是否在工作岗位上,他都始终关注着我国农业的命运,尽管他一直处于政治环境严峻的条件下,难于再直接在农村人民公社制度问题上发言,但这更使他没有停止在对整个国家命运担忧的同时,为农业问题担忧,没有停止农村改革发展思想的酝酿。他始终保持对农村现实的冷静分析和清醒估计,在危难中思索我国农业的振兴之路。例如: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一段时期,邓小平于1963年8月20日,在起草工业决定文件的会议上发言,本来是议工业问题,可是他针对当时人们对农业现实了解不够的情况,在讲“立足现实”、“摸清现实”、“从现实出发”时,特别提出摸清现实基础,“不仅是工业基础,还有个农业基础”问题。同时,这次讲话,还针对当时全国展开“四清”运动,大家重阶级斗争,不重生产建设的情况,他强调要解决人多“要吃、要穿、要用”的现实问题,强调“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还要费劲好多年”。提醒大家,“这里牵涉到人口问题,去年净增1300多万人,今年可能净增2000万人,到1970年将有8亿人口。”因此,强调“现在我们的弱点基本在农业。每年增加一两千万人,要吃、穿、用,压力很大。”农业要改善生产条件,“除开化肥、农药以外,要着重解决水利问题,包括排涝问题”^①。

——1965年6月14日和12月27日,邓小平接待外宾,谈我们党的建设经验时,强调了“真正”了解农民的重要性。强调在农村不做充分的调查研究,“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贫农和一般农民的要求,不了解什么政策才适合于农民阶级的利益。一些形式上很革命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34—336页。

的‘左’的东西，并不适合农民的利益”^①。邓小平这里讲的一些形式上很革命的“左”的东西，不适合农民的利益，指出了当时农村工作的主要毛病。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的一段时期，邓小平从在北京被“监管”，到被“疏散”在江西，很快六七年就过去了，一直到1972年11月12—19日、12月5—15日，1973年2月7—10日，才很难得地被先后安排到井冈山、吉安、赣州、景德镇等地走走看看，名义是考虑农业机械化和参观，但他抓住机会，主要看了一看农业。在此过程中，他说话不多。当他沿途看到老区农民依然还是衣衫褴褛，村庄处处仍是当年的陈旧房屋，群众生活照旧非常贫苦时，他十分难过。在宁冈县临离开时邓小平对当地干部说：“你们在这里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这促使他思考“穷”与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表明他对农业、对国家、对未来充满信心^②。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一度恢复工作的一段时期，邓小平于1975年3月5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尽管开的是解决工业问题的会，但他强调了实现“现代农业”的目标，强调了农业生产现实的严峻情况，说“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609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③

——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加快工业发展文件草稿时讲话，强调“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④。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41—342页。

② 《邓小平在江西》，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16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页。

④ 同上，第28—29页。

——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强调“农业搞不好就要拖工业的后腿”^①。“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基础。”他指出：“现在全国部分的县、地区粮食的产量还赶不上解放初期。”当时江青插话“那是个别地方”。邓小平说：“个别地方也不行”，“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事”。

——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农业要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当他在座谈会谈到“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时，他把“农业的整顿”，放在其它整顿的前面。特别是这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他又一次提出：“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不能听到风就是雨”^②。

三

在农村改革之前，在酝酿改革期间，邓小平就对我们原来农村工作中、与坚持人民公社错误有关的一些陈旧条条框框，进行了不断突破，即突破了原来的一些思维定式。本来，我们党在长期领导农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伟大的创造和丰富的经验；可是，随着成功，就容易自以为是，即逐渐不实事求是，不研究新情况，不解决新问题，不为农民说话、谋利、办实事，在农业问题上，形成了一套教条、“左”的思想方式，导致了农村工作的严重失误。

邓小平在酝酿改革期间突破的思维定式有哪些内容呢？

——“我们的弱点基本在农业。”几亿人口搞饭吃，农业发展落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页。

② 同上，第35—37页。

后,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数量低,有的地方粮食产量还赶不上解放初期,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要立足现实,从现实出发,搞清农业现实基础。这是对较长时间困扰农村的“浮夸”思维定型的突破。

——人口“压力很大”。每年增加一两千万人,要吃、穿、用;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还要费劲好多年。这是对只单单强调人多好办事思维定式的突破。

——“农业要整顿”。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当时“用的名称是整顿”,实际农业要整顿就是农业要改革、要发展。这表明对我国农业现实有清醒的估计,是对中国农业要走自己的路的宣告,是农村改革发展思想认识酝酿的成熟。这是对农村坚持宣传三面红旗思维定式的突破。

——“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政策要适合农民利益,一些形式上很革命的“左”的东西,并不适合农民的利益。要选择好的政策,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主义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思维定式的突破。

——“过去干革命,现在还穷”。本来,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可是现在大多数农民还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如果“富”姓“资”、“穷”姓“社”,那么,贫穷怎算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对误解、错搬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而产生的富是“罪过”思维定式的突破。

——“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是说解决农业的问题,主要还得按经济规律办事、从经济法则上解决;主要不是从开展政治思想斗争上解决,这是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思维定式的突破。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提出以生产、群众愿意、调动农民积极性作为选择最好形式的标准。这实际上也是最早提出了在农村判断社会主义是非的标准。是直接对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思维定式的突破。

——“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使每一生产队能够发挥主动创造精神。生产队工作做不好，农业生产也搞不好。粮食、棉花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生产、拿出来。要建立经常工作，一切工作的成绩都是由一点一滴的细致工作积累起来的。这是对把搞“大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天天运动”思维定式的突破。

四

邓小平实行的农村改革策略：对是否取消人民公社，非常谨慎地让农民充分自愿选择。

当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后，各地农村改革都最先着手搞生产队的责任制建立。这其实也就是对农业本身生产关系究竟是以什么形式为最好的一场大选择，从指导思想上看，一方面是放开手脚，让农民充分自愿地选，什么形式最有生产效益，就选什么形式。但另一方面，从策略步骤上考虑，让群众选择还是有领导的、有序的，是事先有部署的。这种部署就是完全按邓小平早在1962年讲过的精神进行的。那年7月7日，邓小平讲农业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时，曾提出了三种可能的选择，即：一种可能是“尽量保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就得说服群众，加强干部”。二种可能就是“包产到户”，不合法可以使它合法化。三种可能就是“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并存，“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

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①。

改革开始,对这三种可能的选择顺序,有个安排部署,就是考虑“我国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②;不同地区、不同农民究竟真正愿意选择何种形式,尚需观察和实践检验;各级领导和基层干部中传统观念的现实,以及他们解放思想需要有一个探索过程;所以,顺乎自然的最先安排的架势是选择第一种可能形式,即“尽量保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因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非常郑重地原则通过了以保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作为中心内容的、经过再三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即新“六十条”);而且,为了让大家能够尽量集中精力抓好第一种可能形式的选择,还在这次全会的文件中特别明确规定了“不许包产到户”。会议上为了创造这样做的条件,强调了要加强生产队,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让“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使每一个“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③。

遵循全会的上述安排部署,农村改革,开始了农业生产关系最好形式的选择。

在1979年全面开始改革的一段时间内,农民对生产责任制形式选择趋势是多样化。各地起初建立的责任制,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有。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的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主要议题是建立责任制问题),充分反映了这种趋势:既有基本保持生产队核算地位的责任制,主要是实行分组作业、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也有基本突破生产队核算地位的责任制,主要是多种多样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当时,干部的偏好是前者,农民的意愿是后者。前者实际上是高级社、公社化时就一再倡导过的“四定”、“定额管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32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5页。

③ 同上,第146页。

理”、“三包一奖”等责任制形式的新叫法，它基本上不突破生产队的集体经营、集中管理和作为一个核算单位整体的存在。但从社员的意愿看，他们对这种形式没有表现出热情，认为这种形式繁琐、流于形式，没有效益；所以，社员纷纷要求搞联系产量的形式。开始，这种联系产量形式是多种的，如：“包产到组，责任到人”、“专业分工，包产到人”、“联产到劳，全奖全罚”、“口粮田”、“责任田”、“借地”，以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等。因此，农委座谈会上也反映出一些地方的农民搞包产到户责任制有较强的要求。中央于当年4月3日批转这次会议的纪要的通知中，强调了“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必然是多种多样。”这意味着责任制形式的选择，已开始从三中全会部署选择第一种可能形式，逐渐转向选择第三种可能形式，即“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不过，这个文件中，一面仍然重申了“不许包产到户”，一面又对“包产到户”规定“特殊情况经县委批准者”可以，及“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

这次会后，到1979年9月25—2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群众选择责任制形式的趋势有了进一步的表现，在全国一些贫困、受灾、生产队干部弱的地区，农民愿意搞包产、包干到户。早在1978年夏天，安徽、山东等地大旱，山东在菏泽等地搞了“口粮田”救灾，安徽在全省搞了“借地”渡灾，谁种谁收；肥西、来安、凤阳等县就有1200多个生产队把“借地”发展为包产、包干到户，效果较好；到了当年年底，一些队希望坚持下去，怕不让搞，就发生了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签字画押，秘密搞，如队长坐牢，大家养其全家这种著名的典型事例。1979年，安徽、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内蒙、河南、山东、广东、海南等地搞包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都有较大的发展。安徽肥西县搞包产到户的队占90%，固镇县占48%，甘肃武都地区占10%，内蒙五原县占80%，广东惠阳地区占9.1%，海南地区占28.2%。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根据农村一年改革的实践,已经初步看到农民不大愿意尽量保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建立责任制形式,就正确地作出决策,把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拟在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和公布”的新“六十条”,不同寻常地搁置起来,即没有提交全会正式通过和公布。这表明,中央已明显地感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制度可能不得不改变^①。

本来,“六十条”从1961年3月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以“草案”下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公社全体社员讨论;当年5、6月间,经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以“修正草案”公布试行;从70年代初开始,又组织班子,由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领导负责,对它进行新的修改,一直改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一二十年来,它始终作为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宪法”或象征,受到重视。现在,它不按原计划被提交四中全会通过,这意味着邓小平设想的农业生产关系的第一种可能选择形式,尽管优先把它安排、推荐给农民选择,可是农民不选它,那就只好放弃实行它的努力。

十一届四中全会搁置通过新“六十条”后,干部中的两种不同意见(即主张坚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与主张搞包产、包干到户)开始明朗起来,人们不同意见的争论有了发展。特别是从改革开始到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这一段,中央机构的组织调整工作尚未完成,有的领导、有的部门思想尚不解放,这也影响新闻舆论和一些地方领导思想的解放。少数报刊(包括《人民日报》、《农村工作通讯》、《山西日报》、《大众日报》、《湖南日报》)公开批评包产、包干到户^②。同时,安徽、四川、河南、云南等10多省都有大批读者来信,对报刊单位“质疑”、“责问”,要求辩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30—431页,注释80。

^② 《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975页。

论。当时(1979年冬到1980年夏),从全国范围讲,已有1/3的省比较坚定地推行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了。但尚有2/3的省,“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不能“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还没有干起来。邓小平于1980年夏天,针对这种情况,亲自出面发表了两次肯定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形式的谈话:4月2日在全国编制长期规划期间谈话指出,在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穷困、落后地区,要放宽政策,有的就是要实行包产到户;5月31日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指出“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举了安徽肥西、凤阳两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包产到户,一年翻身,改变面貌的例子,要大家不必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影响总的方向,“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当年9月14—22日,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贯彻了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制订了会议纪要(即中央75号文件)。文件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认为这“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它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这样,邓小平谈话和75号文件,使农村改革在原则上解决了包产、包干到户仍然是“姓社”、不“姓资”的问题。这意味着改革对农业生产关系最好形式选择,实际上已转到第二种可能形式上。

邓小平谈话和75号文件,从表面上看,讲的是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包干到户,但从实质上看,我国农村除少数地方外,大多数地方都是贫困落后的。据统计,从1957年到1977年,我国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从40.5元增加到64.98元,20年间每个农民总共只增加24.48元,即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2元;同期,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粮食产量,20年间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市斤。我国农

村改革开始时,1978年“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①所以,根据邓小平谈话和75号文件精神,实际上等于是已从原则上允许全国农村大多数地区可以搞包产、包干到户。因此,谈话和文件传达贯彻后,包产、包干到户呈现出强劲的势头。从1980年冬至1981年底,包产、包干到户已在全国2/3以上的省得到普遍推广。当年10月统计,全国601万个生产队中,包产、包干到户的队已占45.1%,有11个省区已占生产队数的50%以上至95%(贵州、甘肃、安徽、宁夏、广东、内蒙、河南、江西、福建、云南、广西)。

在此期间,当时中央有的领导希望责任制形式的选择,全国能够形成多种多样形式的局面,不要搞成包产、包干到户的“一刀切”。如:1981年3月经中央同意转发了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随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考察山东、河南、湖北后提出建议,在全国:20%左右的困难队搞“包产到户”;25%左右的先进队搞“专业承包”(赵紫阳于1980年6月23日给中央写信推荐过陕西米脂县孟家坪“专业承包”经验);55%左右的中间队搞“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这一建议公布后没有引起农民的反响。这表明,农民越来越选择包产、包干到户的浪潮已经势不可挡。

1981年12月,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并于次年1月1日批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即中央第1个“1号文件”)。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包产、包干到户,同其他各种责任制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文件下达后,全国尚未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大约1/3的省也全部跟上、干起来。这些主要是经济比较发达和地广、机械化比较高的地区,包括京、津、沪郊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松花江流域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1页。

(黑龙江、吉林),以及以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和边疆省、区。到1982年底,全国包产、包干到户的队达到90%,基本上覆盖了全国。

1983年1月2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印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中央第2个“1号文件”)。这个文件把“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正式概称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从理论上对它进行了若干论证。指出它“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它“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端”。这种“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它和过去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混同。”这个文件传达后,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对农村改革的不同意见,完成了农业生产关系最好形式的选择。1983年各地除继续完成建立责任制的扫尾工作外,主要大力进行巩固改革成果的工作,进行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工作。

第2个“1号文件”同时提出了对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要“实行政社分设”。1983年10月12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决定按1982年宪法规定,在农村设立乡政权。这一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于1985年6月全部完成,由原来的5.6万多个公社,建成9.2万多个乡(镇),由原来的54万多个大队建成82万多个村民委员会,至此,实际上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

五

取消人民公社,受到世界舆论的好评。

1、国外报刊杂志的报导与颂扬

日本《经济学人》1983年4月19日刊登了《每日新闻》驻北京分社社长过康吾的文章《农业生产责任制与中国社会主义》。该文说：中国农业生产责任制，把一定数量的耕地和工作包给农民，根据产量给予经济上的赏罚，这个制度，得到众多农民的支持，已经普及全国。它使农民的积极性高涨，农民进行了精耕细作，带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产；它打破了在集体劳动形式下干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它促进了人民公社的解体和乡村企业的诞生，带来农村的富裕化和农业经营的自由。

英国《经济学家》1991年年终述评说：中国自1979年起，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告别了它的艰难岁月，开始大踏步前进。农村的改革，使农业生产迅速增加。6年之内，农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这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居世界之冠。

日本《朝日新闻》1991年12月25日发表文章说：中国，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经济，在继续增长。在80年代前半期，中国实际上以家庭承包的形式，一定程度上允许农田私有，这种农业政策在目前的阶段是相当成功的。所到之处皆见耕作精细的农田，新盖起的农家，还有大型塑料棚。许多农民星期天也劳动。这种生机勃勃的农村景象，全国各地均可以看到。今年由于水灾及旱灾，全国有4000万公顷农田受灾严重，但仍然获得了丰收，这可以说是农民们的种田积极性及其不懈努力的结果。

英国《晨星报》1992年1月15日发表保罗·怀特文章说：中国在解散人民公社之后实行了家庭承包制。人民公社制的问题是，它把农村人口拴在土地上。在10年前，中国有将近2/3的人口在农田里干活；如今，农民实际上只占中国人口的1/3。统计表明，农村经济改革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并且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从农田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村

镇附近建小型企业是有利可图的，运输业和服务业也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德国《星期日世界报》1996年4月7日发表该报驻北京记者哈默尔的文章说：中国农业改革，尽管1979年实行的责任制仍然保留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允许每个农民家庭对最多不超过半公顷的土地有15年的私人使用权。农民必须缴纳规定的粮食数量作为报酬，但是，缴纳的粮食只相当于可能达到的产量的1/3，因此，农民可以获得可观的盈利。这样一来，农业生产比搞合作社经济年代增长一倍。

英国《波士顿环球报》1997年2月23日的文章说：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使得8亿农民受益。自1978年以来，鼓励农民耕作自己的土地，对于一个曾是饥饿的国家来说，人们的实际收入差不多增加了两倍。

2、世界名人、政要的赞许

鲍大可(美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逝世后，10年过去了，这些年来，中国进行了一场改革。农业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增长。农业生产组织的变化不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政府的价格政策也提供了很大刺激。对农业的投资，特别是化肥，增加了。还快速实行了种植的多样化。许多被中国人叫做“专业户”的家庭从农业转向从事乡镇地方工业、副业和同运输、服务及其他非农行业有关的工作。农村工业异常迅速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转变非农就业人员的情况也迅速增加^①。

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著名经济学家)：我和妻子在中国访问了3个星期，感到极其愉快，得到极大的启发。农业方面实行大规模的变革，使农产品和生产率有了显著的增长——这

^① 鲍大可：《毛过世后的十年》，载1986年美《外交》秋季号。

是中国在扩大利用私人市场方面取得最显著的成就。此时此刻，我基本上认为在中国同样的政策取得卓越成就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先生一定正在滔滔不绝地高谈要大大扩展私人田地。他能否成功仍然是个未知数^①。

中曾根(日本前首相):中国的经济改革非常重视农村政策,并已获得重大成果^②。

李光耀(新加坡内阁资政):中国 1979 年很明智地先推行农业改革,放弃过去推行的公社制度。他们成功地大幅度提高产量,为城乡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粮食。1979—1989 年,中国农产品提高了 35%,经济作物翻了一番。在过去 10 年里,中国经济每年取得 7—9% 的增长率,使广大农业地区的 80% 的人民感到满意,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作物改善了,使生活变得更愉快的东西,像新住宅、电视机、冰箱等等,他们都有了。邓小平拯救了中国。没有他,中国可能会像苏联一样^③。

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邓小平发起的改革,使中国将成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当它的人均收入达到韩国水平(相当于我们的 1/3)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将为美国的两倍^④。

施密特(德国前总理):由于邓小平,中国自 1978 年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到 9%——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当人们在 21 世纪回首中国往事时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完成了这个大国的现代化这个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使命。更何况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① 见弗里德曼 1988 年 9 月 13 日在美国的卡托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在上海联合召开的“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与前景”讨论会上的发言《为社会发展而利用市场》。

② 见《世界在变——前首相中曾根同基辛格博士对谈》,载 1990 年 1 月《读卖新闻》。

③ 见 1991 年 10 月 31 日新《联合早报》发表的答美《时代》周刊记者问、1997 年 2 月 20 日就邓小平去世给江泽民主席的慰问信。

④ 基辛格:《我们还不知道的世界》,载 1997 年 1 月 27 日美《新闻周刊》。

及其灾难性结局相比优越性是有目共睹的。邓小平是又一个例子，表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具有英雄创造历史的可能性^①。

3、国外一些著作中的称赞

法国作家佩雷菲特(前政府部长,从1973年至1998年间15次访华,写了4本访华的书:《当中国觉醒时》——1973年,《平静的帝国》——1989年,《中国的悲剧》——1990年,《中国已觉醒》——1996年):1978年12月,一次历史性的中央全会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新道路,出现了一次伟大的转折,否定了人民公社。每个农民家庭都全部投身到自己的那片土地中去了,而国家从理论上保留了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农民在这里出售的不仅仅是自留地里的产品,而且出售他们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国人渴望能够富起来的愿望是不可遏制的。10年来中国发生了真正的变化。邓小平获得了成功。农民的整个生活提高了两至三倍。每个人都被鼓励发家致富,并且许多人已经富裕起来。中国日益摆脱了长期以来的缺粮状况。本来,中国农业为主,农民众多,但从人民公社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农民们恢复了干劲、利润和个人责任。“不平等”的朝气取代了毛时期“平等”的停滞。苏联东欧的变化并未引起中国恐惧。苏联垮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屹立。

日本学者阪本楠彦(宇都宫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研究所”理事长)在1985年2月出版的《中国农民的挑战》一书中说:中国农村实行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应该叫做“民营”社会主义。它不但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且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模式。是一个创举。社会主义应有不同的模式。斯大林型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国家“垄断”社会主义,这种模式带有根本性的弊害。

^① 见施密特:《中国的改革家》,载1997年2月27日德《时代》周报。

美国经济学家 D·H·波金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和 S·尤素福(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于 1985 年合著、出版了《中国农村发展》一书说:中国在推行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率以难于设想的幅度激增。责任制对中国农业的巨大刺激作用将持续 8 年到 12 年。中国目前实行的责任制,不会扩大贫富差别。近年来中国农村小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增加。

4、国际组织、研究单位的评论

世界银行于 1984 年专门撰写的《中国长期发展的报告》说:中国政府近年来执行了卓有成效的措施,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即 1979—1980 年在农村中进行的改革,刺激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粮食生产在 1979—1983 年间平均增长率达 22%。

经合组织(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 24 个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在 1984 年编辑出版的《改革到增长》的经济报告中说:本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 1978 年中国引人注目的改革开放,使“苏联模式”的变革这一过程真正得以起步。中国首先从农业开始改革的成功,提供了实行渐进改革的样板。

美国兰德公司 1985 年 12 月发表文章《中国经济再调整时期的宏观经济变化》说:1978 年以来中国领导人的新经济发展战略,强调稳定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益。加强农业生产自主权。改精神鼓励为物质刺激,抛弃收入平均主义。强调农村多种经营。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和个人经济。这样,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无论是从总净产值还是从人均净产值来看,增长都是非常快的。1978—1982 年,净产值年增长率为 5.8%,人均净产值年增长率为 4.5%。

世界银行在 1986 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过去 10 年里最为广泛的农业改革。始于 1979 年的改革,到 1983 年底,约 95% 的农村家庭都按照与集体组织签订的合同自主经营划分了土地。改革以来的农业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人

均谷物产量,既超过了1957年人均302公斤的政府标准水平,也高于3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最后几年正常年景——达到的人均产量水平。1984年,中国达到35年来最大的农业国际贸易顺差。过去7年中农村地区的实际收入,可能超过过去30年的收入总和。

世界银行在1996年《从计划到市场》专门总结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经验的发展报告中说:中国自从1978年开始实行市场改革以来,是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方针来实现成功的变革的。邓小平有一句总结了这一方面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这基本上是中国改革选定的道路。在农业方面更是如此,中国主要是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开始转轨过程的。改革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5、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的反映

俄《经济和工业生产组织》日刊1991年第9期刊登经济学博士莫洛佐娃文章说:中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承包,近10年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31倍,每年增长6.3%。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在10年内增加了123.9%。中国城市和乡村整个生活方式都有了改变。

俄《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发表普拉托科夫斯基的文章《中国是社会主义竞赛中的胜利者》说:中国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坚决打破了与我们的集体农庄大同小异的农业生产队体制,而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吞食一切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也与它们一道不复存在了。一块块土地根据出租原则分给农户或个人耕种,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收购计划之后将所有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显然,成功的秘密在于准确无误地选择主攻方向——从农业开始。邻邦在10年内使10亿以上人民群众有饭吃、有衣穿,谁能说这不是奇迹呢?

俄《农村生活报》1995年5月29日刊登俄农业党访华团成员贝科夫斯基的文章《中国就那么难学吗?》说:中国目前惊人的变化

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政府积极地调整了农业改革的进程，政府非常清楚，农村富裕了，国家才会繁荣。9亿农民的生活逐步大幅度好转。目前中国的乡镇企业有1.1亿职工。农村的改革使中国得以在稳定和城乡居民物质日益富足的情况下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这表明，归根到底，在我们地球上农民的劳动决定着一切。可是令人难受的是，我们怎么也学不会并不奥秘的“中国经济课本”。

波兰《人与事》周刊1985年6月下旬发表经济学家明兹教授访华后的两篇文章说：中国在农村中进行的经济—社会改革改变了不适合生产水平的劳动组织，取消了生产队，实行了以户为主的联产责任制。这个改革的效益是显著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1997年2月22日的文章说：中国迅速进行经济改革，把集体化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农业摆脱了落后，使广大农民的收入得到普遍提高。

罗马尼亚《自由罗马尼亚报》1990年12月22日文章《中国使我们惊讶的经济改革》说：始于1978年的农业改革，使中国满足了众多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村家庭收入在近10年内提高了2.5倍。在众多的商店里，供应极好。中国的成功在于摆脱了一些有害的教条和过于集中的经济活动，冲出封闭。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1993年12月24日的文章说：中国在80年代进行农业改革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都惊得目瞪口呆。在邓小平指出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社队企业发展的历史考察

王 建 梅

早在 50 年代就出现的社队企业是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乡镇企业的基础。从历史考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社队企业,发展缓慢,其数量和产值都十分有限。三中全会前社队企业来源于什么,其曲折发展历程如何,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社队企业的来源

社队企业是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办起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包括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两种,以工业企业为主。社队企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副业和手工业,它们是社队企业产生的基础和最早来源。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城乡有大量的副业、手工业存在,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独立劳动者约 1 千余万人,其中农村手工业、副业产值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 7% 以上,这些手工业者是满足城乡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必不可少的力量。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党和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多样的生产。1951 年 12 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倡在农村办公营的工场手工业和公营的半机器工业,农业互助合作发展节约出的广大劳动力,“除了有许多人陆续到工厂和矿山做工以外,应由各级人民政府配合国家整个的经济建设的计划,逐步地举办一些可能的和必须的公共事业,例如公营的工场手工业(制造农具、化学肥料、药品等类),公营的半机器工业(某些加

工工业之类)。”^①这就为农业互助合作发展节约出的劳动力指明了出路。

1952年全国进行土地改革,推翻了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结束了延续千年的封建生产关系。农民有了土地,迸发出极大的积极性,生产大大发展。

1953年,我国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互助合作迅速发展。当时的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指出,农业社要办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手工业,要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农业社办副业(包括办工业)得到了国家政策的积极支持,1955年1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指出:“在不妨碍农业生产、不进行商业投机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应根据需要和可能,积极地经营副业生产,逐步地发展农业同手工业、运输业、畜牧饲养业、渔业、林业等生产事业相结合的多种经济,以便发挥合作社的潜力,帮助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②副业规模比较大的合作社,还可以根据需要设专门负责副业的生产队或生产组。农业合作化之前,吉林省5994个高级农业合作社中,有一半建立了副业生产专业队。湖南省农业社办的各种副业小厂有22万多个,乡办的副业小厂有1万多个。

在手工业方面,全国的手工业者经过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生产供销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组织形式,逐步被吸收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到1957年之前,全国手工业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成立了一大批手工业者合作企业,仅河北省由合作社兴办的小工厂就有130多万个,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农民有100多万人。江苏

① 《农业集体化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② 同上,第490页。

省城乡手工业者有 82.9 万人,其中 71.8 万人参加了手工业合作社^①。农村手工业合作社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部划归人民公社领导,成为最早的社办工业,据统计,到 1959 年 6 月,全国转为社办工业的手工业社有 3.53 万个。

社队企业的第二个来源,是各县、镇办的农具制造厂、修配厂和小化肥厂。1958 年,中央提出支援农业“大跃进”,积极发展地方工业,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要实现农业“大跃进”,就必须使用新式农具,多施肥料,为此,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做了关于农具改革运动的指示。3 月 22 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指出农具的改革包括水利灌溉、田间耕作、农村运输、饲料和农副产品初步加工以及防治病虫害等改革,所用机械除大型的和技术要求较高的外,一般应以地方工业制造为主。为适应农业机械的生产和修配,应在县、乡建立农业机械修配站。1959 年 1 月 24 日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会议进一步指出,搞好农具改革,要靠群众运动,也要大搞工厂化,每个公社都要办好一个农具厂。在化肥生产方面,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指出“希望各省、区认真发动专、县、乡、社,组织土化肥的生产,超额完成三千万吨的规划。根瘤菌、固氮菌、磷细菌等细菌肥料和植物生产刺激素的生产,并不那么神秘,有的县、乡、社可以生产,应该积极发展。”^② 根据中央精神,各地县、镇兴建了一批农具制造厂、修配厂和小化肥厂。这是社队企业的第二个来源。

社队企业的第三个来源,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搞起来的社办工业。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

① 《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 页。

② 《农业集体化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2 页。

上系统阐述了发展地方工业的问题,他说:现在中心问题就是地方工业,即是解决机器的问题。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大社可办一些加工厂,最好由乡办,或是几个乡镇合办,县办社助,手工业社办厂矿。国家经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提出地方工业的经营形式可分为县营、乡营,合作社营,县、社或乡、社合营三种,第一次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工业的问题。《意见》于4月5日被政治局会议批准,作为中央意见正式下达各地,要求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号召“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①、县县乡乡社社办工业,在干部中提倡既要学会办社,又要学会办厂。各地农村响应中央号召,掀起办企业的热潮,河南省博爱县在3天内办了300多个厂矿,被形容为“满天星斗,遍地开花”,这种景象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

1958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全党全民办钢铁。这一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而到7月底时,还只有380万吨,差700万吨,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为此,8月25日,在北戴河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时,陈云提议发动群众搞“土炉子”,毛泽东很赞赏这一提议,并指示说,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100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就算是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向它学习。他还向全国发出号召,实行书记挂帅,全民办钢铁,掀起了一场大炼钢铁运动。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发动起来去挖煤找矿,仅仅1个月的时间,全国新建成几十万座年产量10万吨以上的土高炉、小高炉。当时把主要作业采用机械化方法生产的大中型企业的群众运动称为“大、洋、群”,把采用土法生产、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小型企业或生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产点的群众运动称为“小、土、群”。1958年，全国共建成“小土群”工业企业121.5万个，共有工人（大部分是农民）2489万人。围绕大办钢铁，农村还办起了一批小矿山、小煤窑、小农机修造、小水泥、食品加工和交通运输等企业^①。

同时掀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极大地促进了社办工业的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构想，人民公社将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他指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个公社都要有自己的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交通事业，有学校、医院、科研机关等。根据这一构想，各业都要在公社中有所发展，公社的工业将是很重要的一行，必须大力发展，实现“公社工业化”。1959年3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指出，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应该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生产水平的过程，就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中央要求人民公社从农业生产中抽一部分人出来搞工业，工厂企业在农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各地人民公社在建立社办企业时，普遍刮起了一阵“共产风”、“平调风”，把原来属于农业合作社的副业小厂无偿转为公社所有，大肆平调原农业合作社的财物和资金，甚至从群众那里无代价“共产”来资金、设备、厂房、原料

^① 以上材料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05、708页。

组建工厂。这一做法在 1959 年得到纠正，中央将公社统一核算改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平调的集体或个人财物要求如数归还，社办企业本身凡属原高级社的，改回去由生产大队管理，成为队办企业，从此，社办企业的名称也相应改成了社队企业。

社队企业的第四个来源，是下放给公社管理的一些原国家管理的集体工业和国营工商企事业单位。为了推动公社工业的发展，1958 年 4 月，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75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决定》，指出：“国务院各主管工业部门，不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部门，以及部分非工业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除开一些主要的特殊的以及‘试验田’性质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管理外，其余工业原则上一律下放，归地方管理。”^①这些企业一部分下放为县管，一部分下放为乡管、社管。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中又指出，国家在农村的商业、粮食、财政、银行等财贸部门的基层机构，除了为几个公社或者更大范围服务的以外，全部下放在人民公社，业务管理权限也交给人民公社，由公社负责管理经营。随着企业权力的下放，一些工业部门还借助群众性的大办高潮，在人民公社内发展本系统的工业企业，如轻工部党组曾就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给毛泽东主席并中央提交一份报告，认为贯彻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在人民公社中大办工业，是轻工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他们派出干部到山东高唐县试点，45 天内办起 1730 多个公社小轻工厂。同时又组织有关省市的轻工业厅把试点扩展到江苏宿迁、浙江海宁、广东番禺、河南遂平、湖南平江、安徽临泉、湖北麻城、福建莆田、广西玉林、江西鄱阳等 10 个县，要求每个试点县各在 40 天内办起 200 个社办工厂，有些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第 264 页。

试点县还大大超出了指标。轻工部党组向毛泽东主席报告这些做法时,主席批示“轻工业找到了路子。”

据统计,1959年6月底,全国社队企业发展到了70多万个,总产值71亿元,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①。社队企业在短短的时间里急剧增长到如此规模,虽然反映了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提高生活水平的巨大热情,但它不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而是党和政府大力号召的结果。

二、社队企业的曲折发展

“大跃进”不顾客观经济规律,一味大干快干,资源大量浪费,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后,1960年7月,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社队企业随之进入1960年至1965年整顿收缩时期。

整顿社队企业的重要措施就是压缩非农业劳动力。“大跃进”中社队企业发展过快,挤占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很多地方农村的青壮年都在山上挖煤炼铁,村里只剩下妇女、老人和儿童,庄稼无人收,地无人种,农业减产很厉害。为此,1960年8月10日和20日,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示》,要求精简社队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加强农业生产,社队企业的劳动力除一部分必须维持常年生产以外,一般都必须同农业生产季节相结合,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停办,农忙务农,农闲做工。各地根据中央指示下放了社队企业的大多数劳动力,社队企业或者停办,或者缩小了规模。

整顿社队企业的第二个措施,是对前期“一平二调”的财物进行退赔。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一系列指示、规定,一再严肃重申要坚决纠正平调

^① 《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第38页。

错误,全部、彻底地进行退赔。据此,清理旧帐、认真退赔的工作在全国农村普遍展开。平调帐主要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算起,凡是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县和社向生产队平调的,以及县、社和队向社员个人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等各种财物,都要认真清理,有实物的退还实物,并且付给公平合理的租金、折旧费或修理费;实物已经消耗、无法退还的,作价补偿付给现款。原高级社经营的企业平调给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要予以退还,或合理作价偿还价款,或成为合营企业;手工业联社的企业转成公社工业的,仍应按手工业社的办法来办。

整顿社队企业的第三个措施,是划定社队企业的经营范围。社队企业由于摊子铺得过大、过多,出现了和大工业争原料的现象,如上海、浙江有些公社自己造土纸,不肯把造纸原料卖给国家,安徽有一个三界公社积存了几万斤羊毛,不肯卖给国家,自己纺土线,像这样国营工业、县办工业和社办工业三者之间产生矛盾的现象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此,国家规定有些生产项目,城市工业采用先进生产技术,用同样的原料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产品的,要首先满足城市工业的需要。1960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财贸办公室《关于城乡人民公社工业的情况和整顿意见的报告》,对社办工业的经营范围作了正式规定,指出社办工业应主要经营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资料加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传统手工业和出口商品;对于采掘、冶炼、建材等工业产品,应根据具体条件确定是否开展生产经营;而对于纺织、皮革、日用化工等行业的轻工产品,报告认为坚决不能由社办企业生产经营,因为它们大多与国营工业争原料,与农业争劳力。

整顿社队企业的第四条措施,是限制社队办企业。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规定：“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办。需要保留的企业，应该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分别情况，转给手工业合作社经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或者改为个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个别企业，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同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由公社继续经营，或者下放给生产大队经营。”^①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又进一步限制大队办企业，《决定》指出：“公社和生产队一般地不办企业，不设专业的副业生产队。原来公社、大队把生产队的副业集中起来办的企业，都应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一个生产队无力经营的，可以归几个生产队共有，实行联合经营，按股分红；也可以归全大队各生产队共有，由大队统一管理；少数以公社或者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原来经营的副业办得很好的，可以继续归公社或者大队负责经营。”^②

经中央一再指示和多项措施严格实行，社队企业大大收缩，其中社办工业由1959年的70万个压缩到1961年的4.5万个，产值由71亿元减少到19.8亿元，1962年末，又下降到7.9亿元，1963年继续下降到4.2亿元^③。1964年农村副业的水平已经低于1957年，农村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影响了生产建设、市场、出口和人民生活等各方面。因此，1965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指示》，再次提出“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综合经营”^④的方针，要求在继续大抓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生产的同时，大抓副业生产，发展农村集体副业，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

① 《农业集体化文件汇编》(下)，第632页。

② 同上，第661页。

③ 《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第41、42页。

④ 《农业集体化文件汇编》(下)，第846页。

不断高涨；集体副业以生产队经营为主，在不“平调”的前提下，也可以由生产大队直接兴办。这一指示又为兴办大队企业开了一个口子。中央政策的变化，加上“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国民经济有所恢复，社队企业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一些交通便利、历史上有手工业传统的农村，又开始自发地办企业。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60年代末，是社队企业的恢复发展时期。由于城市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农业尽管也受到干扰，但相对要稳定一些。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其中指出：“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农村响应这一指示，又兴办了一些小工厂。这一时期，社队企业或与城市大工业协作配套，或在市场上拾遗补缺，生产一些急需的东西，供应农村，也供应城市，弥补了国营工业生产之不足。由于许多经济管理部门都去闹“革命”，反而使社队企业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客观环境。再加上贯彻《五·七指示》时，把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也到农村插队落户，他们中的一部分被吸引到社队企业中，帮助出谋划策，疏通供销渠道、传播管理经验。一些知识青年的父母所在单位也纷纷组织“厂社”、“厂队”挂钩，社队企业利用这种联系，得到了城市工厂在技术、设备、管理及销售等方面的支持，取得了局部发展。还有一些城市大企业因职工停产闹革命，完不成生产任务，就派人到农村帮助社队办厂，代为承担紧急生产任务。如浙江一些主要的丝绸厂停产，设备在车间生锈，蚕茧要烂在仓库里，主管部门和工厂就派技术人员和干部带着建厂图纸，到农村动员社队办丝绸厂，浙江省的社队丝绸工业就此起家，现在已成为浙江乡镇企业的重要行业。由于上述原因，这5年里社队企业得到了发展，到1970年前，全国仅社办工业就回升到4.5万个，产值26.6

亿元,比1965年增长了4倍^①。

1970—1978年是社队企业进一步发展阶段。1970年8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工作会议,提出搞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次会议推动了社队企业的恢复。1971年,国务院又专门召开农业机械化会议,提出要在1980年使我国农、林、牧、副、渔的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会议提出,社、队办的大大大小小的企业要逐渐增多;建立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造网,做到大修不出县,中修不出社,小修不出队;发展以钢铁等原材料生产为主的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水电、小机械制造)。过去国家计划内的机械设备和原材料是不供应农村的,这时,社队企业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得到部分计划外的车床设备,社队农机厂的生产能力普遍提高。1974年,社队工业产值已经从1971年的77.9亿元上升到129亿元,增长66%,其中社办工业从39.1亿元上升到66.8亿元,增长71.2%,企业规模和经济效益都有所提高^②。

1975年全面整顿,社队企业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这年8月,国务院讨论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出来主持工作的邓小平指出:“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③同年9月15日到10月19日,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和北京两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总结指出:“社队企业的发展,支援了国家建设,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它是促进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物质保证。各地党委应当采取积极态度和有力措施,推动社

① 摘自《中国工业统计资料》(1949—1984);产值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

② 《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第49页。

③ 《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重印版,第28页。

队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10月11日,《人民日报》以《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为题,发表了河南省巩县回郭镇公社发展社队企业的调查,并在编者述评中号召要“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工业”。10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召开的12省负责人会议向党中央提交报告指出:“如果省、地、县办的地方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社队企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全国农业机械化的规划是很难实现的。”“各地的大、中企业,还要订个规划,把所在地周围的农村带起来,主动搞好工农关系。工厂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农村多搞一点农业机械的制造和修配;派人到农村去传授技术,帮助社、队办好‘五小’工业。”^① 国家和政府的重视极大地推动了社队企业的恢复和发展。

10年内乱结束前后,党和政府更重视对社队企业的管理。1976年2月,国务院批准农林部的建议,成立农林部农村人民公社企业管理局,它的基本任务是:对社队企业发展情况及关于社队企业的方针政策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交流社队企业发展的经验;协助有关部委解决社队企业产供销问题等。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市、县一级的人民公社企业管理局也相继成立,形成了社队企业管理的一套专门系统。1977年6月22日,国务院批转农林部与轻工部《关于把农村手工业划归人民公社领导管理的报告》,指出:“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各业都要把帮助公社发展企业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逐步把产、供、销纳入国家各级计划,促进公社企业的健康发展。”^② 这种做法在实行中虽然产生了一些新矛盾,但在当时计划体制下,无疑体现了政府对社队企业的重视。

在社队企业20年的曲折发展中,既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帮

^① 以上材料见《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第55、56页。

^② 《农业集体化文件汇编》(下),第939页。

助,也有后来的限制和约束,而农民通过办工业提高生产力,改善生活水平的愿望却十分强烈,社队企业就在二者形成的张力中艰难迈步,哪怕在最不利的环境下,也没有被完全压制住,但也无法得到蓬勃发展。到1978年底,全国有94.7%的公社和78.7%的大队办起了社队企业,社队企业总数达152.4万个,社队企业总收入431.4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吸收农村劳动力2826.5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9.5%。^①

三、社队企业发展道路曲折的原因

1978年之前的20年,社队企业之所以发展缓慢,举步维艰,主要有以下四点原因:

第一,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只允许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存在。50年代末,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政策明显地超越历史阶段,急于求成,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在短期内急剧提高。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完成,农村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实际上依然很弱,吃饭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就盲目宣布加速实现工业化,赶英超美,社队企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轰而上的。虽然当时农业还没有能力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多的积累和原料,农民低下的购买力也无法发挥刺激社队企业发展的作用,但全国上下都认为这些问题能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努力得到解决。1958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年底算帐派输定了》的社论,社论写道:在“工业方面,也常有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多少原材料生产多少产品’,他们把这些条件看成是死的不可变的,好象原材料的条件是决定一切的。今年上半年原材料的供应比哪一年都紧张,但我们依靠广大群众,遍地创办小

^① 《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第58页。

高炉、小转炉、小煤窑、小水泥厂等生产原材料的工业，使我们的工业得到比任何一年更快的发展。可见，重要的不是条件，而是人，人是条件的主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几千万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去搞工业，留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很少，有的乡只留下几个全劳力。据统计，全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数同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之比，1957年为13.8：1，1958年聚降至3.5：1。1958年本来是个丰收年，由于缺乏劳动力，很多粮食和其他农作物都烂在地里收不回来，一些地方出现了寒冬腊月还在收庄稼的怪事，结果造成了1959年全国范围的饥荒。

令人痛惜的是，这几千万农民响应号召，大炼钢铁搞工业的结果，不但没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反而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当时每吨大高炉的生产成本，鞍钢为85.4元，石（景山）钢为112.6元，而群众运动建起的小高炉每吨成本都在200元以上，多数为250—300元，有的高达460元。为鼓舞群众炼铁的积极性，国家对小高炉给予巨额补贴，据1959年12月10日财政部报告显示，1958年国家共补贴40亿元，而这一年全国财政总收入才386.7亿元。国家用1/10以上财政收入补贴的小高炉成效如何呢？它们炼成的铁含硫量普遍超标，有的超过20—30倍，甚至60倍，这样的铁根本无法炼成钢。1959年第1季度，各钢厂调入的生铁，合格的不到一半。1959年初的几个月，鞍钢平均每天有3千吨铁水不能炼成钢，只能翻成铁块^①。这些数字说明，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单凭人的主观意志只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还有，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了次要地位，过分强调姓“资”姓“社”问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把许多束缚生

^① 以上材料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12页。

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的东西,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摒弃。如搞社队企业,只允许建立集体性质的,其他如个体、私营性质的一律禁止,哪怕是家庭副业和家庭手工业,稍微大一些的也要收归集体经营。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乡镇企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温州,其模式正是成千上万的个体和家庭手工业,这里面蕴藏着非常大的生产力。

第二,在“政社合一”的体制下,社队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动性。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之下,公社是农村的基层单位,行政权与生产权集中统一。作为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单位,社队企业的一切权力都属于公社和大队。1958年诞生的社办企业,经营管理权完全集中在公社,企业的经营项目、人员安排、资金调动等由公社直接决定,生产经营主要靠公社的行政命令来实现,管理无规章、经济无核算、生产无定额、劳动无报酬,企业效益很差,实行1年就被纠正了。1958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多数社办企业退回生产大队,社队企业开始实行公社、大队两级管理。1962年,人民公社体制进一步调整为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将近一半的社队企业下放给生产队经营,这时基本上是社办社有,队办队有,企业本身仍没有自主权。它不能自由选择懂经营的领导人,不但厂长要由社、队委派,副厂长、车间、班组、科室的负责人也都得社、队批准。管理上基本是照搬国营企业的做法,“大锅饭”、“铁饭碗”、“终身制”等弊端很突出。不少地方把社队企业作为老社长、老书记、老队长的安置所,职工也有很多“关系户”和干部子女,社队企业变成了社、队的附属品和“小钱柜”,成了“官办”的“老爷厂”。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口号下,本着

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三就地”原则，生产和销售都局限在公社的小范围之内。这种狭小范围的交换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社队企业的路越走越窄，大多数企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靠优越的自然资源、低价的自产农副产品、廉价的劳动力过日子。在生产过程中浪费又很大，投入产出率很低，产品质量也很差。但这些产品不用拿出去竞争，也没有外来竞争，农村商品又十分匮乏，无论多少好坏都能卖出去，企业不必承担风险、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改进产品质量，因此也彻底没有了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主动性。

第三，在“逐步过渡”的思想下产生逐级管理的体制，社队企业和职工受平均主义的影响，缺乏生产积极性。根据逐步过渡的思想，农村必须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小全民所有制”，再由“小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社队企业发展的趋势是由队办企业发展成乡办企业，再由乡办企业发展成全民所有制企业，而人民公社作为所有制形式较高的基层单位，对公社内任何一级办的企业都有一定形式的管理权。除社办企业要直接向公社上缴利润外，大队和生产队办的企业虽不直接向公社上缴利润，但生产队要向大队、大队要向公社上缴公积金和公益金，方法是按利润抽取一定比例，一般富裕生产队上缴其公积金的六七成，穷队也要上缴三四成。有些地区如苏南等社队企业发展很快，采取按比例分配的办法，上缴比例虽然很高，其自留部分绝对值仍然增长很快，社员收入超过了当地国营企业工人平均水平，当时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必须用新办法降低其收入。1959年12月，浙、皖、苏、沪4省市座谈会纪要指出，“象生产发展到这样水平的队，有必要改变按比例分配的办法，推行固定劳动分值的办法。”实践表明越是经营好的企业上缴利润或公积金越多，这种不合理的政策影响了社队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根据逐步过渡的思想,作为社队企业的职工,由于其劳动是大集体生产的一部分,当然也只能参加集体范围的分配。不合理的分配方式极大地损害了社队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一是大部分的企业劳动无论强度、技术水平还是危险性都远远高于农业劳动,而政策规定职工的工资只能相当于或略高于农业劳动者;二是“厂记工分,回队分配”的劳动报酬付给方式,割裂了企业经营状况与职工收入的联系,企业生产好坏与职工无关。常常还有这样的情况,由于各生产队的生产和收入水平不同,在企业劳动好、技术强、贡献大、评级高、记分多的职工,收入反而比不上劳动差、技术低、贡献小、评级低、记分少的职工,师傅可能还比不上徒弟的收入。原因是前者在穷队,后者在富队。多劳不能多得,不但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也给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以很大打击。

第四,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下,没有商品、没有市场、没有竞争,社队企业缺乏生存的基础环境。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完全清醒,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划等号,认为商品经济是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取消;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把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划等号。还照搬马克思的理论,照搬苏联经验,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城乡经济发展都在严格的控制中进行,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分工非常明确,农村必须“以粮为纲”,在很多干部的思想里,社队企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认为它“只看钱,不看路”,声称“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把办社队企业同农业对立起来。为了加强农业生产,就经常清理、压缩非农业劳动力,限制社队企业的发展,使大批社队企业职工回去从事农业劳动。如在“四清”运动中,社队企业许多正常的经营活动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即使社队企业办得好的地方,也是“围绕农业办工业,为了农业办工业”,把社队企业的生产局限于支援本社的农业生产和满足本

社的社员生活需要,严格限制社队企业参与商业活动,一大批社队企业被当作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受到了打击。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下,国家还对许多产品实行统购政策,一个公社内的农产品在上交国家和分配给农民满足生产生活需要之后,所剩十分有限,立足于就地取材的社队企业并无多少“材”可取。国家虽然鼓励临近的社与社之间进行商品交换,但这种物产相近地区的交换不可能满足社队企业对各类生产资料的需求。对当地没有的原料,国家也从计划中拨一些给社队企业,如1959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规定,公社所属的生产企业和手工业合作社(组)所需要的原料、材料、属于国家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物资及国家统一收购的物资,由国家指定的工商业部门统一供应,其余部分可以在市场上自行采购,但在70年代后半期,经历“文化大革命”后的国内市场萎缩,商品匮乏,社队企业仍不得不花大力气派人四处采购煤炭、钢材、生铁、木材、水泥等生产资料。江苏、浙江、上海等社队企业发展较好的省市、每年都有大批采购员涌到山西采购煤炭,到黑龙江、江西、福建采购木材,到湖南、四川等省采购蚕茧。由于没有市场存在,派出去找原料的人信息不通,往往要费许多周折。原料的经常短缺困扰着社队企业,所以老百姓形象地称社队企业为“草根工业”,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下,社队企业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与新疆三区革命

祁 若 雄

20世纪40年代,在新疆爆发了一场以当地少数民族为主、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因发生在伊犁、塔城、阿山3个地区,故被称为三区革命。

三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全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支持和影响下爆发的,并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汇入到全国人民民主革命洪流之中,为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三区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三区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20世纪40年代初,正值苏德战争爆发,中国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都处在暂时困难时期。新疆军阀盛世才错误估计形势,于1942年抛弃亲苏亲共立场,投靠国民党。他下令逮捕在新疆工作的全体中国共产党员,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人和大批各民族代表人物、进步分子。同时,撕毁与苏联签订的各项协议,迫使苏联撤走所有顾问、专家,并中断了与苏联的贸易,使新疆的生活、生产用品货源枯竭,加上法币流入和滥印省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新疆的社会、阶级、民族等矛盾日益激化。特别是盛世才在伊犁、塔城、阿山3个地区强行收缴牧民枪支和要牧民捐献军马的举措,使本已激化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从而引发了三区革命。

1944年8月初,帕提赫·莫斯里莫夫等在伊犁巩哈县乌拉斯台山区以反献马为号召,组建巩哈游击队。10月7日,攻占巩哈县城,史称“巩哈暴动”,三区革命正式爆发。巩哈暴动告捷后,巩哈游

击队与伊宁各族群众里应外合攻打伊宁,经数日激战,于11月12日占领伊宁市区,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在临时革命政府领导下,到1945年2月不仅肃清了盘踞在伊宁飞机场、空教队、鬼王庙三处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而且统一了除精河县外的伊犁地区全境,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伊犁的数次军事进攻。

为扩大战果,把武装斗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1945年4月,临时革命政府组建了民族军,制定了三线作战计划。6月中旬,以牵制南疆国民党军队为目的的南线作战开始,民族军一部南越天山进入阿克苏地区,攻下拜城、温宿两县,后因攻打阿克苏失利而撤回。另一部取道苏联进入喀什地区,会同蒲犁游击队攻下蒲犁、叶城、泽普等县。7月,旨在解放塔城和阿山地区的北线作战铺开,民族军一部在艾比湖——玛依勒游击队接应下,至8月下旬攻下了除乌苏、沙湾外的塔城地区全境。随后挥师北上,同已占领阿山大部的阿山游击队会合,联手攻占布尔津和承化,胜利完成北线作战任务。8月26日,以攻占乌苏和精河为目标的中线作战开始,民族军用3个团兵力,激战5天,突破3道防线于9月8日占领乌苏县城。同时,民族军另一部也于同日占领了精河县城。

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发展,到1945年9月伊犁、塔城、阿山3个地区得到了统一。临时革命政府辖25个县,拥有28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近80万人口,并把战线推到距省会迪化仅150公里处的玛纳斯河西岸。

就在三区革命胜利发展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饱经战乱之苦的各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迫于国际社会和民意压力,国民党政府在苏联斡旋下,开始同三区谈判。经过半年的艰苦谈判斗争,1946年1月2日,双方签订了《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和附文一。6月6日,双方又签订附文二。6月18日,国民党政

府改组新疆省政府，25 名省联合政府委员中三区有 8 人。三区革命政府随即宣布解散，伊犁、塔城、阿山 3 个地区交新疆省联合政府管理。

省联合政府成立后，三区与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双方斗争首先围绕军队问题展开。国民党借口附文二，要改编民族军和把国民党军队开至三区。而三区不肯交兵权，极力拖延。双方多次商谈仍无实质性结果。接着，斗争又围绕县长和省地县参议员的选举进行。双方都想借选举把自己的势力扩至对方地盘。结果三区在喀什地区占了上风，而国民党则策动阿山专员乌斯满·斯拉木背叛三区成功。于是，双方斗争发展到公开化、白热化，到 1947 年酿成了迪化“二·二五”流血事件。随后，国民党实行“以夷制夷”政策，任命麦斯武德为省主席。这一任命遭到三区激烈反对。7 月，三区提名的吐鲁番县县长阿不都热合满·穆义提以反对麦斯武德为名，在吐鲁番、鄯善、托克逊 3 县发动武装暴动，被国民党军血腥镇压，从而导致省联合政府彻底破裂。

省联合政府破裂后，三区为维护和巩固革命成果，着手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第一，调集兵力攻打乌斯满·斯拉木，收复阿山地区。接着，又平定了沙湾县县长哈力伯克与和丰县莫依勒禾武装叛乱，重新恢复了三区的统一局面。第二，充实和调整了各级政权机构和干部队伍，先后成立了三区经济最高委员会、三区教育委员会、三区农牧业委员会，维护法律和社会治安委员会等机构，统一管理三区各方面工作。同时，对 3 个专署及所属各部门、各县的领导作了调整，一大批进步分子被委以重任，授予要职。第三，成立了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使三区有了统一的政治组织和广泛的统一战线。第四，在内部进行了思想整顿，着重批判了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纠正了在民族政策上的错误，开展了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的宣传教育工作。第

五,为打破国民党政府对三区经济封锁和破坏,禁止国民党货币在三区流通,重新发行三区货币。

总之,三区在省联合政府破裂后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和巩固了自己,为迎接新疆解放,使三区革命汇入全国人民民主革命洪流之中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对三区革命的关怀和支持

对于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为目的的三区革命,中国共产党给予了热情关怀和支持。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三区革命实行武力镇压的行为,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1943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1944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①抗战胜利后,为商讨和平建国问题,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亲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在谈判的百忙中对三区革命给予了极大关心,他敦促国民党政府和平解决有关三区革命问题。1946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力主下,通过了《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和《和平建国纲领》,分别规定“聚居于一定地方之少数民族,应保障其自治权。”“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②。正是在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民主的气氛下,在中共的敦促和呼吁下,国民党政府与三区进行了谈判,成立了新疆省联合政府,迎来了新疆的和平局面。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2—1033页。

②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92—993页。

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后，三区领导人之一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借赴南京开国民大会之机，于1946年12月5日到梅园请求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三区革命，受到了董必武的接见。董必武就此事连夜电告党中央：“新疆国大代表阿不都克里木姓阿巴索夫，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副秘书长，原伊宁起义首领之一，来会我，称在新疆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在新疆解放区^①公开，在迪化及其他地点还是秘密的。现有1.5万人。领导同盟的共11人，曾要求加入联共。联共以苏联外交关系，未允。阿才要求：一、我党承认领导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②，该同盟有一信上报中央（见另电）。二、同盟领导者11人要求入党。三、要求派政治、财经及军事工作人员。四、要求联络。五、要求我党对新疆问题有明确的政策。我答复他三项：（1）要请中央核示。（2）我派不出人来。（3）可约定与延安联络的办法。他等国大会毕即返新，估计当有三星期留京。我想承认与共产主义者同盟有联系关系，这对党无碍。同盟领导人入党问题，应遵照党章办理，俟党将来派人去时再定。现在承认阿不都克里木为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代表与延联系，是否有当，请中央指示。阿是林启荣^③同志的学生，由新返延同志中，有些人知道他”^④。

中共中央接到这封电报后，由周恩来亲自起草，经刘少奇签发的复电于12月6日发往南京董必武处。复电指出：“甲、望向阿同志询明：（1）新疆整个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情况及发展趋势。（2）新共同盟之具体主张。（3）阿同志可否能带工作人员一道回新，

① 指伊犁、塔城、阿山3个地区。

② 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当时只在迪化活动。该组织确曾托阿带去致中共中央的信。阿是三区人民革命党负责人，此处可能是将人民革命党误称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

③ 即林基路。

④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207页。

并建立与延电台联络。乙、如可，望你考虑派一个得力而不红的同志作联络代表及两个机要人员随阿同志去新。并向阿同志声明下列各点：(1)中共愿与新共同盟第一步建立友谊关系；(2)派去之代表，其任务只是联络与观察；(3)新共同盟领导者 11 人入党事，原则上欢迎，但具体解决须联络代表到后经电报决定；(4)新疆工作，应以新共同盟为领导中心；(5)派工作人员须视今后新疆政治情况及交通条件如何再定。丙、如阿同志不能带人去，你可与之约定电台联络办法及密码，先求电讯来往，并将延安中、英文广播时间、波长呼号告他。丁、不管去人与否，望将毛主席著作、党章、少奇报告及其他印发文件交他，并望他带回能译成回(维)、哈两种文字出版。戊、联络代表望从在外未露面的党员中派，如在民盟组织中即有此种人”^①。

12月11日，董必武根据党中央的电示精神约见了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商定派彭长贵^②带一部电台和毛泽东、刘少奇著作以及中共七大文件随阿去新，同时告诉阿：为形成力量，更好地斗争，新疆的进步组织应经过协商合并起来。但在组织名称上，不宜过早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帜。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与彭长贵返新后，因带回电台功率不够而未能和延安取得联系。

1947年2月，国共谈判完全破裂，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日趋扩大。三区同国民党政府矛盾也日益加剧，遂导致新疆省联合政府于8月破裂，再度形成三区与国民党政府武装对峙局面。对此，中共中央公开表态支持三区。9月28日，周恩来在对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战士所作的题为《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报告中指出：蒋介石后方十分空虚，“后方剩二十一个旅，当然空虚。而且其中有八个

^① 《新疆三区革命画册》，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5 页。

^② 即彭国安，化名王南迪。

旅在新疆和甘西，新疆有民族问题，现在又闹起来，八个旅出不来”^①。对三区革命牵制大批国民党军队，有力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10月10日，毛泽东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公开谴责：“对于国内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同时，重申中国共产党完全“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②。1949年1月31日，继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之后，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至此，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已成定局。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更为关心三区革命的归宿问题。7月6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中指出：“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放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③25日，又致电在苏访问的刘少奇，同意派邓力群从苏联直接到新疆三区去建立电台联络^④。

中国共产党除给予三区革命以直接关怀和支持外，还通过新华社及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人民日报》、《东北日报》、《边疆服务》、《月华》等报刊公开报道三区革命的发生及发展。如《解放日报》于1945年7月29日刊登题为《新疆少数民族反抗国民党暴力统治》的报道。《新华日报》于1946年3月30日刊登了题为《政府与伊犁商定的协议，伊宁代表表示赞同，参加省府名单将提出研究，军队整编数自与驻地待商谈》的报道。6月30日，该报又全文刊登了新疆三区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条款》。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8页。

③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302页。

④ 《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1947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新疆谈判破裂,蒋介石拒绝民族自治要求,人民不承认麦斯武德主新》的长篇报道。同年11月22日,新华社自陕北发出《新疆冲突仍在持续中,人民军^①夺回承化》的电讯。26日,新华社又发出《新疆自治运动扩至天山南麓,步骑兵数千,已成立统一组织,活跃吐鲁番盆地打击蒋匪》的电讯。这些报道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三区革命的新闻封锁和歪曲,揭露了国民党血腥镇压三区革命的暴行,使全国人民及时、全面、客观地了解了三区革命的真相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立场,扩大了三区革命的影响,给国民党政府造成极大社会压力,从而在舆论和道义上极大地声援了三区革命。

三、三区革命向人民民主革命方向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三区革命的关怀和支持,大大地鼓舞了三区各族人民,促进了三区革命向人民民主革命方向发展。

首先,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自南京返新后,遵照董必武的意见,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人民革命党合并组成了民主革命党。该组织在一些重要地区建立了区委会,在一些县和重要单位设立了支部,它团结了包括汉族在内的一批各族进步分子,凝聚了团结反蒋的骨干力量,在组织内进行了正确的民族观教育,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开展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在三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三区的报刊发表了大量有关人民解放战争、中国共政策并表明三区立场态度等内容的新闻报道和文章。如塔城专署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于1947年7月23日在头版发表题为《关于中国形势》的长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战绩和全国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情况。该报还就中国共产党领导

^① 即新疆三区。

下的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情况进行了报道。伊犁专署机关报《革命的东土耳其斯坦报》于1948年4月27日发表题为《延安解放》的文章，指出延安的解放有重大意义。1949年6月13日，新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汉文）刊登题为《人民解放战争与民族问题》专论，强调：“新疆各民族的解放，只有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求得，新疆各族人民不要以为距离前线甚远，而认为自己处身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之外，应该积极站在自己岗位上，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削弱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加强革命力量，以使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早日到来。”8月1日，新盟中央机关刊物《同盟》发表社论《庆祝新盟成立一周年》指出：“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和全国民主力量的胜利紧密相连的。国内民主力量的胜利将加速我们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的盟员要很好地理解我们民族解放运动和汉族人民解放运动之间的关系，要广泛地向人民宣传，这是我们盟员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三区报刊还刊登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重要著作。

再次，三区领导人还利用各种机会亲自进行宣传，强调要把三区革命和中国革命紧密联系起来。1948年2月，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亲自向民族军宣讲《八路军政治手册》；9月中旬，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在阿山视察时说：人民解放军不久就会进军新疆，新疆将同全国人民一道获得解放，民族军也会被编入解放军。11月12日，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指出：“人民解放军所坚持的方向和推行的政策，代表了全国4.5亿人民的愿望。因此，我们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会诞生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新中国政府。”^① 1949年1月26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发表演讲说:“国内民主力量如取得胜利,自然会对我省民主力量产生影响。近来中国内部情况表明,反动势力节节败退,民主力量蒸蒸日上”^②。5月11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在新盟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强调:“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仅在其特点及其任务方面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相同,而且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或中国民族问题得到彻底和正确解决的角度上来看,也是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有着密切联系。”“毫无疑问,只有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新疆人民才能得到解放,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够得到彻底和正确的解决,新疆人民的前途才是光明的”^③。

四、三区革命完全汇入全国人民民主革命洪流之中

194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率3名工作人员和1部电台抵达伊宁。17日,三区方面向邓力群表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担负极其复杂而艰苦任务的情况下,还这样关心地处偏僻的新疆各族人民,感到非常兴奋,愿意提供一切材料,安排各方面负责人汇报情况,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当邓力群代表党中央邀请三区派代表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时,三区方面表示:早就听说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很想派人出席,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式邀请,并能借此机会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示一切而感到非常满意和高兴。遂确定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5人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18日,毛泽东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名义给三区发来正式邀请信。三区方面接信后十分高兴,表示服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指

① 《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② 同上,第52页。

③ 同上,第142—144页。

示和决定,并就三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情况通过邓力群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22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5人启程前往北平。27日,在苏联境内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三区闻讯后又立即派出赛福鼎·艾则孜等3人作为第二批代表奔赴北平,从而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三区为稳定新疆局势,迎接新疆和平解放做了许多工作。首先,军事上加强戒备,在玛纳斯河西岸修筑工事,坚守防线,给国民党军队以牵制,使之不能入关支援甘、青等省作战。其次,政治上向党中央提出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具体方案,积极配合了党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部署。再次,大力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鼓舞各族人民斗志。同时,不断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瓦解其军心,争取和团结一切中间力量站到人民一边。此外,三区自新疆刚一和平解放就自发地投入到迎接和慰问进疆人民解放军的活动中。新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号召广大盟员和三区各族人民有钱捐钱,有牲畜捐牲畜,有粮捐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欢迎人民解放军进疆,并向各县派出代表宣传人民解放军进疆的重大意义。10月19日,新盟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维文)发表题为《全民动员起来,积极参加慰问人民解放军活动》社论,指出:“今天,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军我们家乡之时,我们应该高高兴兴地做好欢迎和迎接工作。我们应该以真诚的友谊,对于人民解放军为全国人民的解放而做出的英勇斗争以及为我省人民做出的丰功伟绩表示衷心的感谢。”25日,三区慰问团携带用汽车装载的300吨小麦和大米、牛羊肉、香烟、莫合烟、白糖、肥皂、火柴、水果和其他日用品,与民族军拿出的200吨粮食、200吨汽油、200吨机油赴迪化慰问人民解放军。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行动,三区奉命派出一部分民族军及随军工作团开赴迪化、阿克苏、喀什和田。

对于三区革命为新疆和全中国解放、建立新中国作出的贡献,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早在1949年8月18日,他就指出:“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①。10月21日,毛泽东再次称赞:“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贡献”。22日,他高度评价:“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中国人民的永远纪念”^②。同时专门为这5位烈士书写了纪念碑文。

为了确保三区革命完全、彻底地汇入全国人民民主革命洪流之中,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艰巨细致的工作。

第一,为了实现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对三区的领导,积极着手在三区建立党组织和在各族进步分子中发展党员。1949年10月21日,党中央致电彭德怀:“自治区^③只有同盟^④,尚无党的组织(应该建立党的组织)”^⑤。毛泽东还亲自带头做这项工作。23日,他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批示:“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⑥。同时,电告彭德怀:“据我们了解,此人是好的,此次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现申请入党,我们认为是可以的”^⑦。12月下旬,新疆分局在新疆本地各民族中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其中14人为三区进步分子。随后,又在三区陆续建立各级党组织,从而使党的领导在三区得到了可靠保证。

第二,调整充实三区各级政权,使之成为人民民主政权。除13

①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② 1949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③ 即新疆三区。

④ 即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

⑤ 《新疆和平解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⑥ 《新疆三区革命画册》,第112页。

⑦ 《新疆和平解放》,第98页。

名领导骨干被任命为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外，中国共产党对伊犁、塔城、阿山 3 个专署及所属各县的机构进行了调整充实，重新任命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各民族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同时废除了千百户长等封建制度，建立了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区、乡、村政府，从而使三区各级政权成为人民民主政权。

第三，按人民解放军建制对三区民族军进行了改编。为做好这项工作，早在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就电告彭德怀：“（一）伊宁民族军必须有一个为新省军区副司令，已见前电。（二）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①。23 日，党中央又电示彭德怀：“一万四千人的民族军，应使之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②、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进行民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和建立党的组织”^③。12 月 20 日，三区民族军被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

第四，使三区和新疆其他地区的财政、经济、邮电、交通、商贸逐步统一起来，在三区实施全国统一的政策、法规制度。经多次协商，三区和新疆其他地区恢复了通商、通邮、通航。同时，在新疆发行人民币前，三区纸币与省币按一定比价在全疆流通。并将三区商业银行和农业银行合并，改为新疆省银行分行。在税收上，废除三区税收制度，执行全国税收制度。

这样，三区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各方面都完全服从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至此，三区革命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完全、彻底地汇入到了全国人民民主革命洪流之中。

① 《新疆和平解放》，第 84 页。

② 即柯尔克孜族。

③ 《新疆和平解放》，第 99 页。

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记 冀 朝 鼎

廖 训 振

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在北京从事外事活动的同志间,只要一提“冀老”,就知道指的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当时他并不老,说他“老”是因为他参加革命时间早,学识渊博。而外国朋友则喜欢叫他 Dr. Chi (Dr. ChiChao Ting),即冀博士。

冀朝鼎为人热情豪爽,又富于幽默感,所以人们都愿意同他交朋友。他有许多中外知己,当时在北京的国际友人如斯特朗、艾黎、柯弗兰、爱德乐、马海德、夏比若、爱泼斯坦、西园寺公一等,都是他经常来往的好朋友。在国外的李约瑟博士、波以德奥尔勋爵、鲁宾逊夫人、斯诺、韩素音等知名人士,也同他过从甚密。

冀朝鼎不仅是卓越的国际活动家,而且是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和著名的经济学家。纵观其革命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冀朝鼎 1903 年生于山西汾阳县建昌村。在太原小学毕业后,于 1916 年 13 岁时考入北京清华学堂中等科。这是由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

1921 年,冀朝鼎在校时就提出:人活在世上不可“虚此一生”,要“做真正的人”,要“为国家富强而奋斗”。因受五四运动的熏陶,他先后组织过“暑期修业团”、“唯真学会”。1923 年,他又秘密结社,起名“超桃”,意为超过“桃园三结义”,成员共 8 人。“超桃”主张政治救国,不取当时科学、实业、农业、教育救国之说,崇尚列宁、李大钊、孙中山。

1924年，一批有志青年为了寻找救国应循的途径，在赴美留学前夕分别求教于国内的名人。冀朝鼎去北京大学，向李大钊请教留学方向。李大钊强调要结合中国实际，不要囫囵吞枣。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李大钊的音容笑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5年的五卅运动影响越过重洋，激起留美中华学子的爱国热忱。“超桃”成员决定寻找机会加入共产党投身革命。同年在芝加哥举行的留学生大会上，冀朝鼎同标榜国家主义的“大江社”的代表展开激烈的辩论获胜。会上，冀朝鼎以2/3的多数票，被选为全美中国留学生会的会长。冀朝鼎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组织“中山学会”，出版“奋斗”月刊，响应北伐，声援国内革命运动，并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7年1月，冀朝鼎代表美国的反帝大同盟和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中山学会”去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是廖焕星、刘溥庆和邵力子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印度尼赫鲁、印尼苏加诺也参加了大会。几年来的斗争实践，使冀朝鼎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因而入党的愿望日益强烈。正当蒋介石准备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之际，冀朝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于1927年2月在布鲁塞尔，经中共旅欧支部廖焕星介绍，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冀朝鼎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学习，参加共产国际六大中共代表团和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担任中国代表苏兆征、邓中夏等同志的秘书兼翻译。1928年，美共书记福斯特邀请冀朝鼎回美国去办报，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于1929年回到纽约，在美共《工人日报》任国际版编辑和美共中国局工作，创办《今日中国》和《美亚杂志》。

40年代初，根据党的决定，冀朝鼎由美回国，长期在国民党政府内从事秘密工作。1940年，他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的“世界贸易公

司”襄理，经营出口中国桐油、进口美国战略物资等业务，打破日本的海上封锁。

1941年，美国在中国设立“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向中国政府贷款5000万美元。为保证此款用于抗战正途，特由中美双方各遴选出若干知名人士组成此委员会加以管理。委员会主任是陈光甫，他是上海银行总经理和世界贸易公司经理（冀朝鼎曾任他的襄理），副主任是美国驻华大使馆财务参赞爱德乐。在美国财政部工作的柯弗兰介绍冀朝鼎担任秘书长，再加上陈光甫也推荐，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便任命冀朝鼎为该委员会的秘书长。

孔祥熙原是冀朝鼎父亲冀贡泉的学生，可说是世交，关系密切，冀朝鼎在重庆时，就住在炮台街孔氏公馆。1944年初，孔祥熙调冀朝鼎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3月起，又兼任该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创办了《中央银行月报》和《金融周报》。6月随孔祥熙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美参加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共产党还利用孔祥熙这块招牌，在重庆办了一个“中国国际经济协会”。孔祥熙为会长，冀朝鼎为秘书长。协会会员都是中国银行界巨头。

1946年起，冀朝鼎在上海暨南大学商学院和圣约翰大学任教，主讲“国际贸易与汇兑”、“国际货币金融”和“中国的经济结构”。1947年冬，冀朝鼎以中国代表团的专家身分出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参与起草促进东南亚贸易的方案。

1947年2月中共驻南京、上海和重庆的谈判代表被迫撤退。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以“吉兄”的化名，写了一封信，通过邓颖超转给冀朝鼎，信中说：

吉兄本拟留书给你，以临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数行以寄意。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想兄必具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之感。吾辈既有志，

更宜具远大眼光也。不知吾兄以为如何？

这给冀朝鼎以“很大的鼓励与安慰”，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冀朝鼎终于被中统特务告密了。一天深夜，孔祥熙突然把冀朝鼎叫到住处，严厉地问：“有人告你是共产党，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冀朝鼎镇静而机智地回答说：“老伯，我追随您这么多年，我的一切您都清楚，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孔祥熙沉默了一会，无言以对，只好说：“我看不像，都是谣言。”

1949年1月初，党组织指示冀朝鼎撤离上海。当时前往北方的交通已断绝。恰好这时傅作义电邀冀朝鼎出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于是他同夫人罗静宜搭乘傅作义运钞票的专机到了北平。20天后，北平解放了，冀朝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冀朝鼎生前曾向我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刚解放时，他还穿着国民党军服，坐着美军吉普车。一天被解放军抓住了，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解放军审问他时，他要求找刘仁谈话。当时刘仁是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之一，负责党的地下工作，一听抓的是冀朝鼎，便叫解放军立即放人。冀朝鼎终于从“地下”走了出来，让一些老同事、老同学，甚至美国人士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冀朝鼎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一时冀朝鼎成了党内的三通专家（美国通、国民党通、英文通）而蜚声国内外。

解放初期，冀朝鼎任中国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参加建立外汇管理和统计制度的工作。不久，他随解放军南下，以副军代表资格协助龚饮冰在上海接收中国银行，任副经理兼国外部经理。中国银行迁京后又任副董事长。1949年11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冀朝鼎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外资企业局局长。翌年1月中旬，他又被派为政务院港九中国伪政府机构接管工作团团团长。1951年初，任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

1952年4月，全球有49个国家的471位代表在莫斯科举行

国际经济会议，旨在反对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促进各国间的贸易发展。为响应会议关于在各国成立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倡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于1952年5月4日正式成立，南汉宸为主席，冀朝鼎为秘书长，后升任副主席。

除此之外，冀朝鼎还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

值得一提的是，冀朝鼎还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现称院士）。他于1924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尔街银行分校攻读过政治、历史、法律、经济、贸易、金融等专业。1926年获哲学学士学位，192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35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的论文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枢纽》。他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社会经济区的历史变迁，解释从战国到明清2000多年中国水利事业与封建社会一治一乱产生的原因。此论文于1936年在英国首次发表，后被译成日文，直至1979年我国朱诗鳌才将它译成中文。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曾评论说：“这一著作，可能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方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方向的最卓越的著作。”李约瑟博士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要写成《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水利工程那一部分内容，是不可能的。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就是他亲自请冀朝鼎写的。英国《泰晤士报》曾评价：“在西方念过书并且受到他们的西方同僚高度重视的中国人中，冀博士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造诣，肯定是属于第一流的。”

冀朝鼎曾两次应李约瑟博士的邀请，访问剑桥大学，第一次是1951年，冀朝鼎应邀到那里讲学，听众包括不少经济学知名教授和许多国家的留学生，成为解放后我国在剑桥大学作客的第一人。

第二次是1957年，冀朝鼎率领中国经济技术代表团访问英国。李约瑟博士知道后力邀冀朝鼎访问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举行隆重宴会表示欢迎，应邀作陪的17位朋友中，都是知名教授（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的量子力学家迪拉克教授），其中10人曾经到过中国。1957年，中英两国还处于半建交状态，冀朝鼎已两次应邀去世界著名高等学府——剑桥大学，这不仅显示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也说明冀朝鼎博士在国外学术界享有盛誉。

冀朝鼎因操劳过度，于1963年8月8日突患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经送北京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溘然长逝，享年60岁。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冀朝鼎的治丧事宜非常重视。当陈毅副总理将这噩耗报告在外地的周总理时，总理当即指示：1、冀朝鼎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要加上我和邓颖超的名字；2、何时举行追悼会，我参加；3、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

8月13日上午，1000多名中外人士在首都剧场举行公祭，追悼冀朝鼎。由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陈叔通、傅作义、叶季壮、南汉宸、廖承志、刘宁一、张奚若、楚图南、柯弗兰、爱德乐共15人担任主祭。陪祭的有邓颖超、伍修权、孔原、刘长胜、张彦、方毅、张致祥、陈其瑗、余光生、李绍禹、唐明照、余永焜、李敦白、西园寺公一、柯如思等。

仪式开始后，由陈毅副总理向冀朝鼎遗像献花圈，然后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致悼词。悼词原稿中有一句“在同内外敌人斗争中，立场坚定，机智灵活，英勇顽强”，送审时，周总理亲笔加上：“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

在灵堂中，有一幅挽联对冀朝鼎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饱历风险卅载对内外敌人斗争立场坚定机智灵活

鞠躬尽瘁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赤胆忠心浩气长存。

韩练成小传

韩 兢

韩练成 1908 年 2 月出生于(今)宁夏同心县一个贫农家里。8 岁开始给人帮工作活,12 岁进私塾,一边念书,一边帮工。1925 年以“韩圭璋”之名考入西北陆军第七师教导队(师长马鸿逵),随军北伐。

1926 年,韩圭璋所在部队改编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第四路军(军长马鸿逵)。韩圭璋在担任警卫手枪营排长时,认识了当时在冯部任政治处长的共产党人刘志丹。同年,西北军主力解西安之围,韩圭璋任步兵五十五团连长,是攻入西安的先头部队,当杨虎城见到韩时,惊异地说:“这娃是连长?好!咱兄弟一见如故!”握住手不放。

1927 年春,国民军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从士兵委员会主席中选调 21 人参加整训,韩圭璋是其中之一。其间,刘伯坚、刘志丹找韩个别谈话,提高他的认识,并指定政治部秘书林红和五十六团政治员吴某作他的人党联系人。

这一年冯部出潼关、克张茅镇、观音堂、攻占洛阳。在一次宿营中,韩圭璋的骑兵连驻在距总司令部 5 里之外担任外线警卫,由于轻敌,设哨不足,敌军骑兵入袭,已越过韩圭璋的警戒区,韩圭璋率兵从后侧面向自己兵力 5—6 倍的敌军穿插猛攻,及时与内卫部队会合解围,此役给冯玉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冯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有这样一段话:“韩练成,在北伐时曾与我共过患难的

……”

在进军郑州途中，白沙激战，韩圭璋升任营长。韩曾去五十六团找吴某，但吴因病未随军东进，韩未及办理入党手续。

四一二政变，冯部政治倾向尚不明朗。6月，冯部与武汉国民政府主力会师郑州，开始联蒋反共清党。在冯部把共产党人“礼送出境”之前，韩最后一次见到刘志丹，从此，与党的组织中断了联系。在“清党”中，韩曾几次被指为“共党潜伏分子”，但有冯玉祥担保，得以解脱，任五十八团团副。

冯部主力在豫东、鲁西作战中连克直鲁联军，韩圭璋屡建战功，升任五十九团团团长，后调任第四军独立骑兵团团长，受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指挥。白崇禧将本部一团骑兵与韩部合编为骑兵集团，以韩为司令，后改为骑兵旅，韩为旅长。

1928年夏，冯玉祥向白崇禧要求韩圭璋带骑兵团归还建制，韩所在的第四军缩编为陆军暂十七师（师长马鸿逵），韩改任中校参谋。

1929年夏，冯玉祥通电讨蒋，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不料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率部投蒋倒冯，马鸿逵部改编为讨逆军十五路军，马任总指挥，驻守徐州。韩也随部队到了徐州。1930年初，中原大战爆发。入夏，蒋冯主力鏖战豫东，蒋在归德火车站“总司令列车行营”亲自指挥。韩圭璋当时任马部六十四师团长，守备归德。冯军郑大章骑兵旅夜袭飞机场。关键时刻，韩圭璋留一营守城，分一小部突袭郑旅栖马场，亲率主力驰援救蒋，第二天拂晓攻入车站。为此，蒋介石亲下手谕：“六十四师团长韩圭璋，见危受命，忠勇可嘉，特许军校三期毕业，列入（黄埔）学籍，内部通令知晓。”

1930年秋，张学良通电拥蒋，东北军入关，中原大战结束，马鸿逵部移驻泰安，韩圭璋调七十二师任团长、师参谋长。

1931年夏，韩圭璋与山东省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教员汪萍结婚。当时，冯玉祥下野，在泰山读书。韩圭璋夫妇去看冯，冯玉祥问：“咱爷们是怎么失败的？”韩虽已任高职，但政治上还不成熟，只从军事方面去思考，左思右想找不出答案。

马鸿逵部投蒋之后，官多位少，韩圭璋又曾有“红帽子”之嫌，再次调离实职，改任上校参谋。

1932年秋，蒋介石在汉口召见马部上校以上军官时见到韩圭璋后对马鸿逵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青年将领，应以旅长提升。”但韩随马回到许昌驻地后，马即令韩到南京就读“中央陆军官校政训研究班”，主任刘健群不仅视韩为“共党潜伏分子”，还软禁了他，幸而蒋介石视察军校，韩圭璋在隔离室大喊：“校长！”才得以解脱。蒋介石又手谕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学生韩圭璋，着以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尽先任用。”从此，韩完全脱离了西北军，历任江苏省保安干部训练团主任、省保安处副处长、独立十一旅旅长（少将）、镇江警备司令等职，用回本名“韩练成”。

1935年，韩练成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与冯玉祥等高级将领一起，系统学习了现代战争的理论。其间，教育长杨杰、教授蒋百里的军事思想对韩练成的影响极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韩练成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推荐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高级参谋，并指派为李、白与各方联络的军事代表。

1937年8月，韩练成陪同白崇禧会晤了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及冯玉祥等。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1938年3月，白崇禧请周恩来、叶剑英等商讨津浦路作战方案，也是由韩练成联络、安排的。

1938年初至1939年底，韩练成陆续担任第一一七师副师长兼旅长、一七〇师副师长兼五〇八旅旅长，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

桂南战役(昆仑关战役)等,升任一七〇师师长。

1940年春,蒋介石到柳州召开军事会议,发现韩练成已在桂系担任了师长,非常高兴,给了他一笔数万元的特支费,要他与各方人士联络感情,站稳脚跟。

1940年夏,韩练成由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中将)职上调入国防研究院第一期作研究员。此间,撰写过《动员学》、《论国防教育》等论文。

1941年春,韩练成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和参谋总长办公室参谋、组长,成为佩刀随侍蒋介石左右的亲信。蒋要韩继续保持与白崇禧、冯玉祥、周恩来的联系。

冯玉祥向蒋介石进言35页,韩作了详细提要送蒋阅。事后,韩去看冯,冯再次问韩:“咱爷们是怎么失败的?”韩从政治层面上,以“敌、我、友关系”中冯先生未能处理妥当的方面开头,说到蒋的手段:“只要有人想作官、想要钱,我就有办法。”冯先生大笑:“你小子给我上了一课。”

1942年夏,经过缜密的考虑,韩练成委托无党派人士周士观通过他的女婿、中共地下党员于伶安排了与周恩来的第一次单独会面。韩练成向周简要通报了军事、政治形势之后,明确表示要投身革命,要求加入共产党。周恩来坦诚地把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部、国军上层发展党员的原则告诉韩练成,希望他在蒋身边好好工作,为国家、为抗日统一战线作贡献。谈话就要结束时,周恩来突然向韩练成打听韩圭璋的下落,这才知道韩练成就是韩圭璋。周恩来告诉韩练成,他是从刘景桂(刘志丹)处知道韩圭璋的。说到刘志丹牺牲的情形,两人都落了泪。

从此,韩确定了与党的同志关系,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韩除了与周或周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联系之外,绝不接触党的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

也就是不和其他党组织发生横的关系。

韩的夫人汪萍从这个时期开始,全力支持韩练成,多次从经济、物资、住宿、交通等方面帮助李克农、潘汉年和他们介绍来寻求帮助的同志、朋友,被李克农誉为“后勤部长”。

同年秋,韩练成返回广西,继续担任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在多次军事会议上,与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互通情况。

1942年8月胡志明在广西被捕,同年冬韩练成受周恩来的委托,直接参与了由冯玉祥、李宗仁出面保护胡志明的的工作。

1944年秋,韩练成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参与指挥“桂柳会战”。

1945年初,蒋介石乘“桂柳会战”失利、追究责任之机,取消桂系第三十一军番号、撤消了自夏威以下11名桂系将领的职务,由于与蒋介石的关系,韩练成仍被任命为第四十六军军长。同年夏,第四十六军奉命反攻,连续攻克镇南关、雷州半岛,打下廉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韩练成率部渡过琼州海峡,接受日军投降。韩当时任海南岛防卫司令官、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受降的第二天,韩得知日军海南警备府司令官伍贺启次郎(海军中将)交出的文件中有开发海南的计划与图册达17箱之多,特别关注,派专人立即送南京。

去海南之前,韩练成接到周恩来的亲笔信:“现在只能运用你个人的影响和你手中的权力,在无损大计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注意!从实际出发,能做多少,做多少,由你酌定。……”

当时,正是“三人小组”和平调处时期,在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压力下,蒋介石还不能公然以武力去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但海南是一孤岛,琼崖党组织及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还没有被提到“三人小组”的议程上来,张发奎抓住这个机会,一方面在舆

论界发表言论,不承认岛上有共产党,另一方面密令韩练成第四十六军加紧布置,企图在一个月內消灭琼纵。

韩练成只知道琼纵的负责人叫冯白驹和一个从中央派来的长征干部庄田,但无法联系,只好以“行政院特派海南区接收协调委员会主席”、“海南区受降司令官”的名义,强令广东省政府海口办事处主任蔡劲军把从日军手中劫到的琼纵被俘人员和资料交海口警备司令处理(海口警备司令时为第四十六军师长巢威)。在释放这批人员时,韩从中挑选了一个可能是县一级的干部,亲自和他谈话,并亲手把写给冯白驹的一封公开信交他带去。信的主要内容是说战争已经结束,要求琼纵派人出来,商谈整编游击队的问题。

不久,琼纵派出琼崖抗日公学校长史丹与韩练成谈判。韩练成在公开场合和私下接触中,向史丹交待了需琼纵领导注意的事项,要琼纵暂时停止或减少零星游击行动,隐蔽自卫,等待时机。因琼纵没有电台,无法与中央联系,韩只得单方面采取行动掩护琼纵:

首先是限制蔡劲军指挥的海南岛保安团的扩编。张发奎、罗卓英要韩把当时只有1个团的3个县保安队扩编成3个团,并用缴获的日军武器充实它。韩用种种借口,拖延不办。对于警察部队,也是如此。

其次解决詹松年的伪军部队。郑介民曾告诉韩练成,詹是他的人,陈诚已同意把这支部队改编成一个独立旅,暂时编入第四十六军战斗序列,作为对琼纵进攻的先头部队。韩练成冒了极大风险,借“整编部队”之名,把这支伪军部队全部缴了械,处死詹松年,并在当天遣散了该部1700多人。此举被人报到蒋介石那里,韩练成拿出詹部在日据时期助纣为虐的事实资料,强调杀詹以平民愤的必要,蒋只斥责韩“擅权行事”,命“下不为例”作罢。

1946年初,蒋介石急电召韩练成到南京参加全军整编会议,张发奎令广州行营副主任徐景唐、参谋长甘丽初接手处理接收协

调委员会工作,开始了对琼纵的合围扫荡,这一阶段,是琼纵受到极大损失的一个困难时期。

当韩练成回到海口后,“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剿共不利,应予以申斥”的通报已下发到各有关单位,韩练成被免去除第四十六军军长之外在海南的一切职务。

1946年10月,已改编为整编第四十六师的原第四十六军奉命调离海南,负责警备宁沪线、策应江北、保卫南京。部队由海上向北转运期间,韩练成被蒋介石召去南京,列席了由蒋主持的有白崇禧、陈诚等人参加的最高级军事会议,了解了蒋全面内战的战略计划,西北、山东两战场的战略部署,以及蒋美之间的关系。会议期间,韩练成得知整编第四十六师已改向青岛。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韩练成将这些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指示韩练成:“速去上海找董老谈。”韩练成立即转赴上海,在北四川路白崇禧公馆秘密约见董必武,把全部情报交董必武速转党中央,董必武向韩练成转达了中央关于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指示,约定了韩练成与中央及华东野战军联络的暗号为“洪为济”。

1946年底,整编第四十六师到山东不久,华野派遣刚出狱的新四军干部陈子谷持“洪为济”的信来找韩练成,随之又有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华中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来联络。韩练成与舒同商定了配合山东解放军赢得胜利的办法。1947年2月之前,华东野战军派出与韩联络的一直是敌工干部,韩无法判断华东野战军前敌指挥部的真实意图。莱芜战役打响后,韩练成放弃了对第四十六师的指挥,使这个师陷于混乱,很快被歼灭。是役,国民党损失了7个整编师共5.6万余人。战后,韩练成由华东野战军派出的联络员杨斯德引导,到达前指司令部,当天下午与陈毅匆匆会面。第三天,韩练成带着另一位联络员张保祥,日夜兼程赶往青岛,经上海回到南京时,已是2月底了。

由于莱芜战役之前，南京政府中丧兵败阵的将军不少，因此，韩练成到南京后，蒋介石并没有怀疑他，反而称赞他“一俟跑出，即刻返京，极其忠勇可嘉。”全军覆没的韩练成未受到处分，被任命为第八绥靖区副司令官兼整编第四十六师师长。

1947年4月，韩练成调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5月的孟良崮战役前，对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到底该走还是该守，韩在关键时刻说了一句：“共军喜打运动战，我们在鲁南（莱芜）就是在运动中吃的亏。”蒋下了决心：七十四师死守孟良崮、吸住共军、四面合围、歼灭陈毅主力。结果大败。

1948年3月，韩练成被调出参军处。韩练成逝世后在讣告中写道：“积极配合解放战争，特别是在莱芜等战役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春节前后，韩练成两次去香港休假，与潘汉年取得了联系，结识了绍敦公司总经理、昆仑电影公司的后台老板、地下党员蔡叔厚，也结识了费彝民、何贤等党外朋友，定下了经香港脱离国统区的路线。

1948年3月，何应钦就任国防部长，按照陈诚的建议，调韩练成降任西北行营副参谋长、兰州保安司令兼保安旅长。

10月，何应钦确切掌握了韩练成在莱芜战场“通共”的情报。韩练成听到风声后，只身前往上海，拿着总统参军处参军唐君铂在年初提供的空白护照，填上了昆仑电影公司摄影师“于冰”的名字，由潘汉年接应，乘飞机潜入香港。

1948年11月，韩练成和北上解放区的第二批爱国民主人士一起乘船到大连，经烟台、济南、石家庄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平山。

一到平山，韩练成即被李克农接去中央社会部，与李分住一个农家小院“一明两暗”上房中的两个暗房。

很快，韩先后受到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分别召见。对朱德，

韩的感觉是见到一位仰慕已久的前辈、长者。朱送给韩一本内部印发的毛泽东著作，书中已圈圈点点，扉页上写着“此书不厌千遍读，懂得一句也有用处”，韩十分感慨，视为至宝，天天带在身边。

见到周恩来，韩练成像是失散多年的孩子见到了亲娘！周建议韩留在社会部，韩不理解周的意图，表示：“坚决不再披这张猪皮！”

对毛泽东，韩非常景仰，一起吃饭的时候，毛见韩也爱吃辣，说：“我要是一顿饭不吃辣椒，屎都拉不出来！”韩被毛的直率风度所倾倒！

1949年3月，彭德怀在参加七届二中全会返回西北的途中，在石家庄车站约见了韩练成，韩始知中央已决定要他去西北工作。

8月，韩练成到西北，此时兰州战役已打响，韩练成看到兰州铁桥被打断，追击受阻，立即派人找来了地下党员、著名建筑师任震英协助抢修。

此后，韩先后担任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参与指导国军周嘉彬、蒋云台等部起义。韩还给马鸿逵写信，劝他“放弃军权，保持政权”，但马选择了对抗到底的态度。

1950年1月，韩练成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主席彭德怀）。5月，由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美援朝初期，彭德怀在一次回国期间曾征询韩练成的意见：可否愿去协助指挥？韩说出肺腑之言：志愿军中有原国军第四十六军旧部，自己在莱芜战役放弃指挥，对部下来讲，是统帅失责、失信之举，不便再带有这些官兵在内的部队。彭深表理解。

1954年9月，韩练成作为山东省选出的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并当选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5年5月，韩练成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张达

志、政委冼恒汉)。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当时,正是全面学习苏联时期,苏联顾问曾向韩练成索取实力资料,韩说:“顾问者,客卿也。实力数据是机密中之机密,客卿不必知之。”顾问团不满,告到中央,毛泽东得知,说:“韩练成说的?好!”

1956年9月,刘伯承点名调韩练成进京任训练总监部科学与条令部副部长(部长彭绍辉)。此前,韩曾多次协助刘伯承为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的组建、教学做了大量工作。

1957年底,叶剑英点将组建军事科学院,韩练成负责军科院的选址、建设规划等工作。1958年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韩练成任战史研究部部长。

1958年5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韩练成目睹了以“反教条主义”为名对刘伯承、萧克的批判活动,心情十分压抑。

韩练成从1952年起,潜心于国防现代化、正规化研究,先后撰写了《现代国防的军务与军制》、《军官养成》、《国防指挥系统的构成与职能》、《合成军队的训练与编组》、《瘫痪战略构想》、《合成军队训练基地的建立与运用》等多篇论文。在“批判”中,许多手稿失散,其余大部在韩的怒气中被付之一炬。

1961年夏,韩练成称病离开军科院,调任甘肃省副省长(省长邓宝珊、省委书记汪锋),分管科教文卫体工作。对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的建立、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省图书馆的珍本典藏等,韩练成给予了特别的支持与关照。

1964年10月,甘肃省的五个专区发生牲畜口蹄疫,韩练成负责组成了“甘肃省消灭牲畜口蹄疫战斗指挥部”,请来全国各地的畜牧、兽医专家,在兰州军区的协同下,三个月内消灭了疫情。

12月,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韩练成与周恩来谈到消灭口蹄疫进展时,周说:“由你负责我就放心了。”

1965年冬，中央军委决定，韩练成与其他几位转到地方的将军一起调回军队。但韩没有返回北京担任新的职务，以“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名义离休，迁居宁夏银川。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周恩来先后向陈毅、叶剑英打了招呼，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及兰州军区历任司令员、政委对韩练成实施了切实有效的保护。

1967年3月，韩练成致电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提出对驻军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建议；8月，命儿子韩兢赴京送亲笔信给周恩来，提出稳定军队、稳定生产、稳定干部队伍的具体建议。

1969年秋，“林副主席一号命令”发布，韩练成愤怒地说：“战争不是儿戏！苏联能在这时发动侵华战争，挖我的眼睛！”

1969年12月，韩练成的夫人汪萍病逝。1970年3月，韩练成迁居陕西临潼。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韩和许多老同志的处境才有所好转。

1975年1月，韩练成作为军队代表出席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但竟然只是紧握着手，四目对望没说一句话！事后提起这次最后的握手，韩练成总是忍不住要落泪。

1975年至1976年，董必武、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韩练成的心境格外压抑。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韩练成心情有所好转。在此前后，叶剑英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向韩发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询问，但韩已无意复出，常常以诗词代言寄达叶帅。

1978年2月，作为军队的特邀代表，韩练成出席了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常委。

1980年5月，韩练成迁居西安，开始在儿子韩兢的协助下，有针对性地为党史研究部门提供史料，并开始整理回忆录。

1982年6月,韩练成与国际关系学院教师广玉清结婚。

1983年6月,韩练成参加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委员。

1984年2月,韩练成病逝于解放军总医院。

在病中,韩练成留有一段录音交给儿子韩兢:

“我死后,用最简单、最节约的办法办理丧事。遗体不供解剖,把它洗干净,用白布裹起,送去烧掉。已故妻子汪萍同志的骨灰,这次连同我的遗体一起烧掉。骨灰全由火葬场处理,不再装殓。免去那些丧事仪式,如遗体告别、追悼会、骨灰安放等等。这件事对我来说,只能是个人虚荣,公家浪费,对社会没有其他积极意义。工作忙子女,不要请假奔丧,农村的亲属,也不要通知,不要干扰领导和所有生前友好。

“作为共产党员,几十年来,不论是在党外的時候,还是入党以后,党要我做的事,全都做到了,可以说毫无遗憾地、安详地闭上眼睛。我生前没有个人打算,死后也没有放心不下的事情。唯一愿望: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各族人民团结、幸福。”

1984年3月7日,在简单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摆放着中共中央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全体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送的花圈,送花圈的还有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万里、习仲勋、杨尚昆以及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等。这一大大超过常规的举动,实实让人感到这位职位并不算高、曝光率较低的将军确实非同一般。

韩练成留下财产甚微,存款未及万元,仅有藏书千余册、诗词百余篇。1996年5月,由张爱萍题写书名的《韩练成诗词选》在广东出版,印数不多,却已引起各界人士的注意。

华北财经会议始末

罗 一 恒

1947年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对于解决战争条件下的军需物资供给,发展生产,保证人民军队进行战略反攻,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47年,解放区在进行了一年多的自卫战争后,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中共中央号召全党:目前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反攻。但由于空前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解放区的财经情况已陷入困境。加上各解放区之间的经济割据,区与区之间的关税堡垒严重,许多解放区在与邻区的物资交换中赔了钱,财政收入日趋减少。这种状况,不利于解放区克服财经困难,共同对敌。在此情况下,冀察晋中央局提议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中共中央于1947年1月3日作出《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并确定会议地点设在邯郸,“由邯郸中央局负责筹备和召集”。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交换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项,并可由各区派人成立永久的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参加会议者,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军区的财经供给机关最好都有负责代表。会议日期由邯郸中央局根据筹备情况电商各中央局决定。”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了华北财经会议筹备处,开始会议的准备工作。

华北财经会议从1947年3月10日开始,到5月11日结束,共62天时间。出席代表17人,列席代表38人。大会主席团主席

为薄一波，成员有南汉辰、栗再温（晋察冀）、薛暮桥（华东）、王任重（华中）、杨立三、戎伍胜（晋冀鲁豫）、白如冰、陈希云（晋绥、陕甘宁）、刘子久（中原军区），秘书长为陶希晋，副秘书长范若一。

整个会议分为座谈、报告、讨论与总结三个阶段。

一、座谈阶段（3月10日至3月24日）

华北财经会议原定于3月1日召开，但由于晋绥、陕甘宁边区代表未能通过封锁线到达邯郸，3月9日，会议决定先开座谈会，一边开会，一边等待两区代表。

座谈会从3月10日开始至24日结束，共15天。中心议题是讨论贸易与金融问题，重点解决冀中区争购外来物资，致使在外汇与货币上负担过重的矛盾。

3月10日，薄一波主持会议。南汉辰针对解放区经济上的封建割据情况，提出三条意见：①各区间的统制应取消；②关税堡垒要减少到最小；③要一致对法币作斗争。

薛暮桥就山东地区与友邻区存在的食盐、货币两大问题也作了发言。

3月11日，薛暮桥主持会议。王元波就冀中的情况作了发言。他指出：由于敌人的封锁，加上封锁与倾销相结合、倾销与吸收相结合，破坏了冀中的出入口工作，冀中贸易赔了钱，以粮为主的财政收入大大亏空。这样，冀中就不想与渤海交换法币，用沧盐抗渤海盐。同时，对冀南食盐棉花作了扣留。这是只看到冀中的困难，而对于从战争全面出发认识不足的结果。他提出急需解决的问题是：①冀中外汇如何解决？②外货如何取得合理价格，保证需要，减少中间利润？③外汇困难，实际是出口困难，运输困难，如何解决出口问题？④解决问题时，步调如何取得一致，集中力量统一对敌？⑤各友区交换，以减少对敌依赖十分重要，但如何从上至下地贯彻，搞通下层思想？

3月12日,南汉辰主持会议。刘岱峰作了《一年来的贸易工作情况》的发言。他说,一年来,我们是不知己,不知友,也不知敌。过去我们只怕冀中物价涨,影响冀南物价,从昨天冀中同志发言中,深刻感到冀中对冀南物价起了掩护作用。

接着,林海云也就冀南工作作了发言。他说,冀南为了增加收入,在对外贸易上总是想垄断,特别是对主要产物——棉花的掌握管理上,提出对济南等地的出口由冀南专营,因冀南出口必经各友邻区,就想把友区也管起来,名义上是为了对敌斗争统一,实际上是怕出口税被友区征走,减少自己的收入。

3月13日,杨立三主持会议。吕镜符作了《渤海盐产及运销情况之介绍》的发言;何幼奇作了《冀鲁豫工作》的发言。

3月14日,薛暮桥主持会议。周伯易作《友邻区税务关系的几个问题》的发言;李友三作《太岳区工作》的发言,李一清作《太行区工作》的发言;杨文汉作《冀东情况介绍》。

.....

15天的座谈会,围绕贸易与金融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晋冀鲁豫小组提出:各区对外出入口贸易,只在出入口地点收一道税,内地不再重收,出入口税税率应尽可能一致。

冀中小组认为:冀南棉花可以过境出口,但不同意自由贸易。

冀南小组认为:物资工作中,不应要此拒彼,冀南棉花布匹销售中,冀中就可以大量组织出口,这对冀中也有利,对全解放区都有利。

山东小组认为:管理大盐很成功,对各区的输出,只可以取消差额税,不应停止专卖。

经过讨论,座谈会初步达成以下协议:

①在交换地区开设混合市场,各区货币可依自然价格交易;②边地银行互相依照比值兑换,出入手续费共收千分之十(入五、出

五)；③各区互存汇兑基金。

二、报告阶级(3月25日至4月13日)

3月24日，座谈会结束，陕甘宁和晋绥两区代表还是未能到会，3月25日，大会主席薄一波宣布：会议不能再拖了，“从今天起正式开会”。薄一波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分析了撤离延安后的形势之后指出，中央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兵源接济问题；二是财政困难问题。他说，战争是长期的，单靠任何一个地区不可能供应战争，各地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支持战争。同时，后方工作的同志，特别是搞财经工作的同志，要更加努力，才能达到胜利。

从3月25日到4月13日，共20天的时间，是华北财经会议的报告阶段。这个阶段，以工作报告的形式为主，对各区的财经工作状况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山东、晋察冀、晋冀鲁豫、中原军区的代表先后作了报告。晋绥、陕甘宁代表于4月7日赶到，也作了报告。

3月26—27日，薛暮桥代表山东区作了《山东的财经工作情况》的报告；3月28日，南汉辰作了《晋察冀财经工作情况》的报告；4月8—9日，南汉辰作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的报告；4月10日，刘子久作了《怎样解决我主动出击到蒋管区时的财粮问题》的报告；4月11日，陈希云作了《晋绥财经工作》的报告。

(一)关于山东的财政经济工作。1946年、1947年两年中，山东普遍组织土地合作社，办集体农场，因未办好，生产下降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棉布、棉花缺乏。

山东财经工作实行了①紧缩发行，厉行节约，平衡收支，合并机关商店；②掌握物资，管理对外贸易，奖励土产出口，提倡用土货，改变高价入口、低价出口状况；③扶植生产，发展农业、手工业、群众性经营等做法。取得的主要经验是：①掌握物资、稳定物价。本币发行要由工商局掌握，各地不许乱发货币，不许压低法伪币值。本币与法伪币比值要依自然价格运行。②开展外贸工作以有利交

换、保护生产、保障军需为原则，主要办法是争取出超，争取主动。③对内贸易在于扶助生产，保障供给，调剂供求。调剂区域性差额的办法是组织运输；调剂季节性差额是秋收春吐。生产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贸易要分清敌友，取消限制，进出不封锁，友邻区互相帮助，发展经济。

(二)关于晋冀鲁豫的财政经济工作。当时晋冀鲁豫的财政经济工作主要问题是贸易各区的计划性与全区的盲目性、货币物价全区的计划性与各区的盲目性的矛盾。

为解决这些矛盾，晋冀鲁豫提出发展生产是平稳物价的基础；公营商店要以平稳物价为主；银行发行货币要采取紧缩政策，要把大规模紧缩和小范围的紧缩相结合、大量透支和贸易上的抛售物资相结合等政策。晋冀鲁豫金融工作的主要经验是：①群众彻底翻身，必须发放生产贷款，扶助群众生产。②在合作社普遍发展起来后，生产贷款要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③贷款要集中贷给贫苦农民。贷款期限，根据生产情况自愿确定，分配采取民主评议，手续愈简单愈好，贷款利息一律照顾群众利益。

(三)关于晋察冀的财政经济工作。报告指出，①从1946年开始进入城市以后，晋察冀生产上重工轻农，农贷23万万8千万，只贷下去20万万，工业投资单国营新华实业公司即达50万万。②边钞在反攻前发行不统一，一直到现在仍未完全统一，1946年8月统计，边钞在冀晋占66.6%，冀中占38.5%，冀东占14.4%，察哈尔占27.1%，热河占2.8%。③对伪蒙疆银行券，采取开始承认、逐渐压缴、贬值、收回。政策是打出去，走群众路线，动员合作社村政权、群众团体，到唐山买东西回来。

(四)关于晋绥的财经工作。晋绥的财政经济，主要问题是在1946年取消食盐管理后，乡村现洋复活，农币市场缩小，贸易出超，金融波动。针对以上情况，实行了手工业生产提倡标准币，禁止

现洋黄金法币交易的办法。此外,由于大力发展生产,收入增加,人民负担减轻,部队机关生活得到改善。但也存在铺张浪费现象。

解决办法是实行统筹统支,大小单位家务集中缴公。除粮食外,其他一律不发,由生产自给。组织检查委员会,实行从金库到个人的财产检查,号召私人财产缴公,一次减少个人占用牲口 4000 头。以此来减少开支,发展生产。

(五)关于华中的财经工作。华中财经工作主要问题是,没有把支持战争和发动群众很好地结合起来,发动群众搞财政的很多机会没有开展好,致使出现了财粮困难。解决的办法是,离开根据地,深入到蒋管区,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发展财政。用阶级斗争办法,打土豪分田地。①组织随军政府,保证作战缴获没收资财交公,保证供给;②原则上是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按当年产粮的十分之一征取,低于国民党的征取;③征收运输由地方干部负责,保管由供给干部负责。

三、讨论与总结阶段(4月14日至5月11日)

在各区代表作财经工作报告的基础上,大会进入分组讨论与总结阶段。

讨论的中心问题是:

①支援战争问题。与会者认为,目前战争的规模是空前的,没有雄厚的物质力量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为此,在财力物力人力的使用上必须是“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

②发展生产问题。讨论的焦点是三种经济形式(国营、私营、合作)以哪一种为主。意见都是为了发展生产,提出过“大量的自由发展生产是必要的”和“应提出自由发展,而不是齐头并进”。

③统一与调剂问题。

④独立自主问题。

1947年4月25日,薄一波集中讨论的意见并向中共中央提

出书面报告：

一、财经会议已进入最后阶段，准备产生一个决定，已经起草出来，从保证长期战争供给及土地改革与解放区的生产建设方向出发，基本上要争取独立自主，完全不依靠，而且是与美蒋斗争的经济体系。根据 10 年来的经验，提出财政、经济各种不同政策，如财政、华北人民负担政策、整理村财政、财务行政、开源节流、贸易、税收、金融、货币等均有详细规定，正在讨论中。

二、大家根据逐次长期战争供给的观点，拟建议将银行发行、各区脱离生产人数、人民负担标准及可以调剂贫富的几种统税、专卖收益归中央，以便中央斟酌各区财经情况适时给以指导，又能机动调剂贫富，如补助晋绥、陕北或其他临时开支。

三、各区相互关系亦进入解决阶段，办法：自行提出困难和要求，由大会研讨解决办法，如晋绥、陕北提出 70 万匹布，150 万斤棉花，大家认为这小的很，由太行北岳完全负担起来，用货换或干脆帮助均可。

中共中央 5 月 4 日批准同意由会议通过产生一个正式决定。

在形成《华北财经会议决定》之前，大会起草了一个《华北财政经济综合报告》，这个报告分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财政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经济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三个部分。报告指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放手让私人资本和私营经济自由发展，把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结合起来；在组织领导方面，逐步从分散走向统一。

报告指出财政工作的具体问题有开辟财源、精简节约、人民负担、粮食工作、调整战勤、财务行政等。经济工作的重要问题是改造农村的贸易机构和金融机构；在消灭旧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时，同时设法消灭半殖民地性，即消灭对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统治区经济上的依赖。

5月11日,在《综合报告》基础上,大会通过了《华北财经会议决定》。这是华北财经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共分9个部分:

一、经济建设必须奖励土货,抵制美蒋货,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实行保护政策。

二、目前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保障战争供给。

三、实行精兵简政,首先精简地方机关人员、充实部队。

四、开源取之于民,改进公粮税收工作,增加财政收入。

五、整理村财政。

六、调整战勤。

七、贸易和金融货币工作,应为发展生产服务,贸易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争取有利交换。

八、由于交通运输困难,出击部队的粮食等供给,主要依靠战争缴获和就地筹措,不应单靠后方补给。

九、组织领导,集中统一成立财经机关。

这次会议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以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平衡。

华北财经会议,在中国革命处于大转折时期召开,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及时总结了一年自卫战争以来财经工作的基本经验,调整了各解放区货币贸易关系,便利了人民物资交流,加强了对敌经济斗争的力量,支援了战争,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财经基础。

建国后毛泽东 45 次回湖南纪要

夏 远 生

——第 1 次

1954 年 5 月间,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长沙大托铺机场专用线,换乘自备防弹汽车进入湖南省委大院,由公安部长罗瑞卿陪同。毛泽东一下汽车,径往探望省长程潜先生。后听取省委“三周一谭”(即周小舟、周里、周惠和谭余保)的工作汇报。周小舟腾出自家住的房子接待毛泽东,但毛泽东此次没有在长沙居住。

——第 2 次

1954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视察南方返京途中来到湖南,先停车株洲车站,后到长沙。湖南省委新任书记周小舟、省公安厅李强、唐瑞亭等前往株洲迎候毛泽东并汇报湖南工作、执行保卫工作。

25 日中午,毛泽东乘专列到长沙,在大托铺专线停车休息期间,乘汽车入城到程潜先生家探望,约见了语言学家杨树达,并视察了长沙市容。晚上 7 时以后乘专列返程,刚刚卸任的原省委书记金明陪同毛泽东前往武汉中南局。

——第 3 次

1955 年 6 月 19 日晚 10 时,毛泽东乘专列从杭州抵达长沙大托铺机场,停居两天。

6 月 2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毛泽东在公安部长罗瑞卿、警卫局长汪东兴、省委书记周小舟、副书记谭余保、省长程潜、语言学家杨树达等人陪同下,从城北七码头乘船至猴子石下水,横渡湘江,

在河西牌楼口北面登岸，畅游一个小时。上岸后去岳麓山参观，旧地重游，看了白鹤泉、云麓宫、爱晚亭、望湘亭等处风景名胜。毛泽东回京后曾写诗一首记叙在长沙游江登山之事：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召集了湖南省委负责人会议和 10 位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了解湖南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并同大家合影留念。毛泽东还请省委副书记周里调查落实韶山烈属蒋浩然被误划成份的问题，并给烈属毛仙梅赠送了被子和 100 元钱，帮助解决其生活困难。毛泽东还专程到程潜家中登门拜访。

——第 4 次

1955 年 7 月，毛泽东路过湖南，听取省委胡继宗、谭余保、徐启文的工作汇报，并接见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听他讲湖区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华撰写的《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等三篇农村工作论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他特邀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介绍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同谭余保、华国锋合影留念。

——第 5 次

1955 年 12 月 23 日，毛泽东从武昌南站乘专列来湖南，专列停在长沙老火车站。在到湖南之前，毛泽东于 12 月 21 日为中央起草《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文件，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来到湖南以后，毛泽东同省地市委书记们详细讨论了文件中所列的十七条内容，重点研究了农业合作化的进度、农业增产措施、多种经营、粮产指标、消灭地方病特别是血吸虫病和除四害等问题。而后毛泽东到杭州，召开会议，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扩充

形成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第6次

1956年1月初，毛泽东在南方视察农业合作化工作到湖南。在长沙主要是检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展，征求省、地、市、县负责人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文件的意见。在专列上，毛泽东接见了湖南省委周小舟、周惠、谭余保、胡继宗、李瑞山，湘潭、常德、郴州、长沙等地市委负责人华国锋、孙云英、陈郁发、秦雨屏，益阳、宁乡县委书记张振江、张鹤亭等人，并召集他们专题座谈讨论农业合作化、讲卫生、除四害等农村工作问题，逐条征求意见。毛泽东要求加强领导，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并认为多种经营加精耕细作，可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座谈会之后，毛泽东乘专列去杭州，主持会议讨论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返途中毛泽东在长沙逗留，1月11日在长沙蓉园宴请程潜、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等老友，听取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统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等方面工作的意见。毛泽东叮嘱周小舟：省委书记要抓统战工作，尤在湖南要摆在首要地位。

——第7次

1956年5月30日，毛泽东乘飞机从广州返京途中停机长沙，在蓉园住了一天，听取省委负责人周小舟、胡继宗、谭余保、周惠和长沙市委书记秦雨屏汇报工作。下午毛泽东畅游湘江，从猴子石下水，到牛头洲上岸，走访了菜农和居民。为了方便群众，毛泽东叫周小舟今后在这里修一个好码头。

晚上，毛泽东观看了株洲花鼓戏团演的戏曲《生死牌》。

5月31日清晨6时，毛泽东乘专机从长沙起飞去武汉。

——第8次

1957年9月7日，毛泽东乘空军专机从武汉飞抵长沙，住蓉

园招待所,听取省委、省军区和常德、湘潭地委的汇报,参加了2个座谈汇报会,主要研讨粮食生产与消费问题。周惠、徐启文、谭余保、秦雨屏、孙云英、王治国等人参加了座谈汇报。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引用了在湖南调查了解的材料、数字,说:“粮食问题,大家吵不够吃,我下去问了一下,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同志汇报说大小口平均400斤谷子(种子、饲料在外)就够了。一定要很好地提倡勤俭持家,节省过日子。湖南的同志提出打算从今年起就多搞一点积累,你们看行不行,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毛泽东引述湖南的材料说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国家积累外,合作社积累和家庭积累,均很重要。湖南办法:总产值(30亿元)扣20%为生产费(6亿元),其中以20%为基建费(1.2亿元),按照社章抽5%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在外。管理费必须缩小到1%。积累丰欠不同,以丰补欠。”强调勤俭办事,增加积累,扩大生产,节省消费。

9月7日适逢周末,经叶子龙建议,接待部门在礼堂组织了舞会。毛泽东住长沙两天,工作之余曾两次畅游湘江。毛泽东在长沙还约见了民主人士曹典球,曹把《敬呈毛主席》一诗送给毛泽东阅存,宾主相谈甚欢。

9月9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去江西南昌。

——第9次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乘专机从杭州飞抵长沙。

5日晚,毛泽东在长沙观看木偶戏《追鱼记》和花鼓戏等地方戏曲节目。

6日,毛泽东接见省委、省军区主要负责干部,发表重要讲话,会后特意在省委办公楼前坪同军队和地方科、处以上干部500多人合影留念,省委书记周小舟、省长程潜陪同。

1月6日,毛泽东飞往南宁开会。

——第10次

1958年4月12日,毛泽东从武汉到长沙。下午5时,毛泽东到百年老店火宫殿旧地重游,视察饮食服务行业,并品尝长沙地方小吃。

12日傍晚,毛泽东在省军区第一政委周小舟的陪同下,来到离住处较远的独立营一连视察,看了战士营房和生活设施,检查了武器保养情况。

毛泽东在长沙还观看了湖南木偶戏、皮影戏《鹤与龟》、《两朋友》等民间文艺节目。

4月15日,毛泽东离开长沙飞往广州,同日发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

——第11次

1958年6月中旬,毛泽东到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负责接待并汇报工作。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提出要到前秘书周小舟家里去看一看,周小舟设家宴招待毛泽东,宾主举杯共欢,席间毛泽东还就社员口粮问题征询了周小舟的意见。

毛泽东在长沙还邀省长程潜出席一个宴会。席间,程潜因为任省长多年,又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提出辞职,被毛泽东挽留。

——第12次

1958年12月12日,毛泽东开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以后从武汉到长沙视察工作,13日由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护送继续乘专机飞行到广州小憩。

——第13次

1958年12月28日,毛泽东从广州乘专列返回北京途中,在湖南停车小住,同周小舟谈话,讨论湖南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然后于月底离开长沙去武汉。

——第14次

1959年3月19日，毛泽东于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后乘专列到长沙。3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作《关于湖南报告的意见》，指示湖南省委“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二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事决不能误”。同时也指出：“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

3月19日毛泽东来到长沙时，省委正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贯彻毛泽东在郑州会议的指示精神，讨论研究农村工作，重点解决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确定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大队一级，但要把规模大的大队适当划小。毛泽东虽然认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要求“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他个人倾向于放在生产队一级，但本着继续调查研究的目的，他没有明确作出指示，而是同意湖南按照自己的情况和计划办。毛泽东还找省委书记、常委、地委书记开了几次座谈会，当面听取大家对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意见。参加座谈会的有周小舟、周惠、李瑞山、王治国、谢新颖等人。

毛泽东在长沙还应邀观赏了艺术团体的精彩演出，接见了曲艺团团长金汉珊等人，发表了文艺评论意见。当他看完湘剧《生死牌》，戏尾出现海瑞的形象，极感兴趣，认真地查阅了《明史·海瑞传》，提出要学习宣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3月19日，毛泽东致电匈牙利领导人祝贺匈牙利共和国成立40周年。

——第15次

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乘专列经岳阳到长沙,住蓉园1号楼。陪同的有王任重、柯庆施等。

6月24日下午2时,毛泽东畅游湘江。游程12华里。上岸后接见了桔洲菜农,视察了生产队食堂、小学,询问了社员生产。观看了省湘剧团演出的《生死牌》。

毛泽东为纠“左”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为庐山会议作准备。他多次同湖北省委王任重、上海市委柯庆施、湖南省委周小舟、周惠等人谈历史与现实问题,谈读书问题,要下面的同志多作调查,多读书,看看前人是怎么解决问题的,从历史经验中学习工作方法,纠正错误发扬成绩,以利前进。毛泽东曾同周小舟谈起土家族问题,询问省委注意民族自治工作没有,说要让土家族民族自治。要求省委工作要放开一点,不要抓得太严太死。毛泽东还同正在长沙参加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的代表会见,合影留念。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的工作比较满意,对湖南经济形势也估计乐观,他不仅提议周小舟参加庐山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还增加省委书记周惠出席庐山会议,实际上是对湖南工作的赞许和嘉奖。

6月25日上午,毛泽东乘火车到湘潭,在车站接见地委书记王治国等人。下午改乘汽车到家乡韶山。这是毛泽东1927年离开韶山以后第一次故园行。行前对负责安全工作的罗瑞卿约法三章:一不要派干部去韶山,特别是不要派公安人员去;二在行动上要给予自由;三到了韶山要让我广泛接见群众。

6月27日下午,毛泽东离开韶山返回长沙,途中两次停车,在宁乡县高桥和望城县曹家坳访问农村干部群众,视察农田生产情况。

回长沙后,毛泽东接见了省长程潜。并要华国锋接来杨开慧烈士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吃了一餐饭。

毛泽东同省委常委、副省长华国锋多次谈话,征求他对当前经

济形势的看法,对他的工作作风和实干精神持赞赏肯定态度,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6月28日,毛泽东在周小舟、王任重等人陪同下乘专列去武汉,去庐山。

——第16次

1960年1月26日,毛泽东乘专列去广州途中,停车衡阳火车站,并在周家坳站接见了省地市三级党委书记张平化、宁生、杨兴洲和驻军415部队政委,听取关于衡阳地区和城市工农业生产情况及农民养猪“一家班”经验的汇报。座谈结束后,省地委领导送毛泽东到郴州。

——第17次

1960年3月9日,毛泽东从广州返京途中到湖南,在专列上接见省委张平化、于明涛和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等同志,一路了解湖南的工作情况,接见陈洪新时述评了郴州苏仙岭上“三绝碑”的历史名胜。

3月10日,毛泽东的专列在株洲暂停,会见地方负责干部后驶往长沙。

3月11日晚,毛泽东在省委张平化、周惠、胡继宗和长沙市委孔安民陪同下,视察长沙汽车电器厂的生产自动线和技术革新成果。之后,顺路游览了湖南烈士公园,观看烈士生平展览。

夜晚,观看湘剧团的演出。

3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湖南去江西。

——第18次

1960年5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到长沙,专列停在大托铺专线,接见了省委常委以上干部。他同张平化谈到韶山滴水洞的地理形势,说那里修房子很好。张平化实地勘察后,于下半年动工兴建,定名为“二〇三工程”。

5月20日毛泽东结束在湘的调查研究工作。

——第19次

1960年冬，毛泽东到湖南视察，住蓉园1号楼，接见毛泽民烈士的遗孀王淑兰一家人，勉励侄儿毛华初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注意调查研究。毛泽东并建议张平化加强省委调查研究机构的工作。

——第20次

1961年2月12日，毛泽东从杭州乘专列到湖南，在列车上听取了湖南省委张平化、周里、胡继宗的工作汇报和胡乔木调查组的情况报告，在座的还有陈伯达、田家英。毛泽东进一步提倡省地县各级干部都要搞调查研究工作，并就制订农村人民公社条例问题说，“各同志分头去调查研究，将来在广州搞出一个条例来。三个省（浙江、湖南、广东）共九个人，加我一个，组成十人小组，认真研究，解决一些问题。要搞一个人民公社章程恐怕困难，准备一个工作条例，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能、权利、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规定好。规定好了，就好办事了。”离开湖南后，毛泽东去广州，主持一系列中央会议，并主持3个调查组起草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六十条。

——第21次

1961年3月31日，毛泽东从广州来长沙，就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如何认真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一事，同省委书记张平化专门谈话，指出该文件不定案，一定要反复征求群众的意见再修改施行。

4月1日毛泽东乘专列到武汉。

——第22次

1961年4月初，毛泽东从武汉听取工作汇报后又折回湖南，直接领导中央调查组的农村调查研究工作。当时在湖南分别开展调查工作的有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等领导人。

4月9日晚,毛泽东听取在韶山调查的胡乔木关于食堂问题的汇报。

4月9日,毛泽东到蓉园3号楼刘少奇住地听取刘少奇汇报在长沙农村调查的初步情况和下一步去宁乡花明楼开展调查的打算,并就湖南农村调查发现的一系列问题,对中国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交换意见,研究讨论,谈了几个小时,直到凌晨2时。

4月11日,毛泽东写信调湖北省委王任重、王延春来湖南参加三级干部会,帮助湖南解决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会后,毛泽东决定了下列人事变动:湖北王延春调湖南,任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湖南胡继宗调甘肃省委。

4月13日,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左派革命运动主席安·德·洛萨诺。

4月15日,毛泽东批转胡乔木在韶山调查的4个材料,要求发给湖南三级干部会议讨论。根据大多数农村干部意见和群众心愿,后来农村公共食堂基本上散伙,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

4月18日,毛泽东结束在湖南的调查研究,去南昌、杭州。

——第23次

1961年9月18日,毛泽东在湖南活动3天,白天到蓉园1号楼休息,晚上回到停在大托铺机场的专列上办公。9月21日,毛泽东即乘专列从长沙抵达武昌东湖,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

——第24次

1962年3月上旬,毛泽东从北京到湖南,住蓉园1号楼,3月9日专列离湘,去武汉。在湘期间,毛泽东调查了农业生产情况,并就粮食工作指示说:在粮食分配上“要搞点基本口粮”,规定了具体标准。3月23日毛泽东又乘专列到湖南。

3月23日至24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省委王延春汇报工作,

侧重于了解当前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表现。

——第 25 次

1962 年 5 月，毛泽东在中南局陶铸、王任重陪同下到湖南，听取省委常委王延春等关于湖南农村社教工作的情况汇报，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5 月中旬，毛泽东离开湖南去杭州。

——第 26 次

1962 年 6 月 10 日至 17 日，毛泽东在湖南视察指导工作，分别听取省委、省军区的工作汇报。6 月 17 日在听取省军区关于战备和民兵工作的汇报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三落实”要求。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方针。

——第 27 次

1963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来湘视察工作，听取省委华国锋对农村工作的情况汇报。1 月 6 日，毛泽东会见并宴请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等，1 月 7 日到上海。

1 月中旬，毛泽东又乘专列经江西回到湖南，在株洲接见了湖南省委负责人。1 月 19 日在长沙机场接见空军某部负责干部并合影留念。

——第 28 次

1963 年 10 月 20 日，毛泽东由汪东兴陪同到长沙。听取了华国锋、李瑞山的工作汇报。当时岳阳县毛田区是湖南农业生产中涌现的先进典型，华国锋发表《贵在鼓劲》的文章，介绍岳阳毛田的经验，强调“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鼓干劲，必须是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鼓蛮劲。”毛泽东已是两次听取华国锋关于毛田经验的汇报，对毛田人民的干劲作了充分肯定，称赞岳阳搞得不错。当时正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和省委二届七次全会，10 月 26

日全会闭幕，毛泽东接见代表们并合影，听取了两会主要内容的汇报，肯定了生产救灾、恢复经济的主题。

——第 29 次

1964 年 4 月 10 日，毛泽东在长沙住了一个星期。4 月 10 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的代表团。

4 月 15 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发表长篇谈话。在周恩来陪同下接见刚果客人。

4 月 17 日中央发表由毛泽东在长沙口授拟稿的致赫鲁晓夫 70 寿辰的电报。同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湖南。

——第 30 次

1964 年 7 月 18 日，毛泽东从长沙返京途中，在岳阳车站停车休息，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陪同。

毛泽东在同张平化谈到湖南、岳阳的历史行政区域归属问题时说，湘潭专区规模太大，应适当划小，以便加强领导和管理。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省委经上报国务院批准，于同年设立岳阳专区，管辖从原湘潭专区划分出来的湘北地区的若干县市。毛泽东还建议《新湖南报》改名《湖南日报》。之后，为《湖南日报》题写了报头。

——第 31 次

1964 年 9 月 7 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省委书记张平化、华国锋、李瑞山，就农村工作发表长篇谈话。毛泽东再次给予岳阳县毛田区的生产管理经验以较高评价。他要求：搞社教，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

9 月中旬毛泽东乘专列去杭州、上海。

——第 32 次

1965 年 4 月 29 日晚，毛泽东从武汉乘专列到长沙，住在省委九所 3 号楼。为实现“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的宿愿，他要循 1927 年领导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的路线，从湖南这一边重上井冈

山。

5月2日至5日，毛泽东因为患感冒，身体不适，暂留九所休养，先派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打前站，先行上山趟路。

5月中上旬，毛泽东接见了秘密来华求援的越南胡志明主席。并应胡志明的请求决定派出中国工程兵部队8万人出国援越抗美，参加越北抢修战略公路的战斗工程。在蓉园还宴请胡志明主席，请他观看湖南木偶戏，并和中南局书记陶铸同胡主席合影留念。5月18日，毛泽东又电贺胡志明主席诞辰75周年。

5月12日，毛泽东发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

5月20日，毛泽东电贺印尼共产党成立40周年。

毛泽东在长沙期间，省委召开全省农业生产会议，毛泽东听取了省委的汇报请示，了解湖南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的情况，对省委重视农业基本建设的作法表示赞赏。毛泽东还同张平化谈论红军初创时期的艰苦奋斗，其中提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是他率红军打到桂东县沙田墟时提出来的，成为红军著名的纪律。毛泽东还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艾思奇、关锋5个人谈话，为6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作注写序，说此事并未了结，毛泽东自己准备动手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

5月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从长沙起程开始重上井冈山之行。下午1时乘专列抵达醴陵阳三石车站，换乘吉姆轿车经攸县渡汨水，下午4时40分到达茶陵，在县委办公楼住宿一晚，查阅了《茶陵州志》。

5月22日上午9时半，毛泽东同茶陵县委常委会见并合影留念，然后驱车出发去江西永新，下午6时抵达井冈山茨坪，实现了重上井冈山的壮举。

——第 33 次

1966 年 2 月 20 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长沙。

2 月 21 日至 22 日，毛泽东听取叶剑英关于战备工作的汇报，并作有关指示，提出可以利用城市打反侵略战争的战略观点。

2 月 23 日，毛泽东接见省委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王延春、苏钢等书记处成员，作有关当前工作的长篇谈话。

2 月 26 日上午，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加纳共和国总统恩克鲁玛，并听取周恩来关于中央、国务院有关工作的汇报。

韶山灌渠工程即将竣工，张平化等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问：“当年就受益？要高产才算哩！”6 月份毛泽东再度来长沙时，王延春等向他汇报韶山灌区总干渠、北干渠通水剪彩的情况，并请他为之题词，毛泽东婉辞说：“要高产才算，灵了再写。”

2 月 26 日夜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长沙。

——第 34 次

1966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离开杭州，16 日到达长沙，在省委九所 3 号楼住了一晚，17 日迁居韶山滴水洞休息。

6 月 26 日，毛泽东在滴水洞 1 号楼会议室接见省委书记、常委、湘潭地委和县委的书记王延春、徐启文、华国锋、万达、李瑞山、苏钢、杨树青、刘亚南、樊茂生、郝诚、熊清泉等人，并照相。

接见之前，毛泽东听完王延春汇报“四清”和工作队人数时，当即打断话头说：哪有那么多明白人哟！说明毛泽东对当时搞了几年的社教工作不满意。接见完毕，毛泽东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但是当时人们不能理会毛泽东讲长征的含意。

6 月 28 日上午 10 时左右，毛泽东乘上汽车，离开韶山，回到长沙，在大托铺机场换乘专列去武汉。

7 月 8 日，毛泽东在武汉致信江青，详谈他对形势、斗争的看

法，表达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和决心。这封信酝酿于韶山滴水洞，写成于武汉，反映了毛泽东从“西方的一个山洞”到“白云黄鹤的地方”这一段时间的思想发展。

——第 35 次

1967 年 9 月 17 日，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从江西到湖南长沙，听取湖南等省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随同毛泽东来湖南的有谢富治、汪东兴、张春桥、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张耀祠。

9 月 18 日上午 10 时，毛泽东听取湖南军政负责人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的汇报时不断提问，并针对性地发表许多重要指示：“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今后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根据地方汇报的形势和文革情况，毛泽东总结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现在已经是第二年了，应当是看到成果的时候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号召团结起来，反对派性斗争。毛泽东针对湖南的情况还说：最后归结起来还是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的，向群众作了检讨的，打击面太宽了不好。都要作自我批评，不要光讲对方的缺点，不要把矛头指向对方。我们过去有经验，在处理军队和地方的关系时，提出了军队要拥政爱民，地方提了拥军优属。军队带头作自我批评，结果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对保守的不能压，一压就有反抗，我们就是蒋介石压出来的，一压就压出了三十万红军，三十万共产党员。后来是自己犯了错误，才有二万五千里长征。

9月24日,毛泽东结束在湖南的视察,乘专列从长沙抵达武汉,继续视察。

——第36次

1968年4月,毛泽东回湖南视察,和华国锋谈了党内斗争和党员犯错误的问题,说共产党员不怕犯错误,怕的是犯了错误又拒不接受批评,拒不改正,这样只能在背离党和人民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华国锋汇报工作中谈到湖南造反派“永向东”等按照江青所说“湖南的革命委员会是老保委员会”的讲话,说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是复辟,要批判,大闹长沙的情况。毛泽东十分反感造反派的这种行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是1968年4月毛泽东批准成立的,实行的是“三结合”。毛泽东说,“永向东”打着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必须予以批判斗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9月份省委召开三次全体会议,批判了省革委副主任叶卫东等人鼓吹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使湖南的局势稍趋稳定,但派性斗争依然不止。

毛泽东关心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向华国锋了解湖南工业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情况。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了衡山修建欧阳海灌渠工程的情况,并写了三个字“春陵水”,告诉毛泽东:灌渠修在“春陵水”上面,毛泽东当即纠正他说:你写错了,应该是“舂陵水”,不是“春陵水”。

——第37次

1969年6月,毛泽东从湖北到湖南,检查党的“九大”以后各地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情况。当时的警卫工作因为省公安厅已瘫痪而改由省人保组和军管会负责。毛泽东强调“九大”以后要抓革命,促生产,“湖广熟天下足”,中南各省要抓好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他看见原来认识的公安厅长不见了,很关心,强调要解放干部,让他们出来工作。

——第38次

1969年11月12日，毛泽东由汪东兴陪同到长沙，听取黎原、华国锋关于湖南形势、农业生产、解放干部工作的情况汇报。他对湖南的形势比较满意，指出：各派要联合起来，要团结教育多数，大多数人是好的，要解放干部，干部解放以后可以换一个地方工作。

针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毛泽东说：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要去那么多人到大寨参观，人去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他对湖南省委树立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很满意。

针对机关、干部作风问题，毛泽东指出：机关人太多，不好办事，中央、省、地、县四级机关人多了，要精减人员，转变作风。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提出湖南10年建成工业省的建议，供湖南参考。

华国锋汇报了湖南煤炭工业生产情况，和湖南澧水一带发现大盐矿的消息。毛泽东听后很兴奋，再次强调要“扭转北煤南运”，发展湖南煤炭工业；赞成湖南省委建设湘澧盐矿的决定，以“备战、备荒、为人民”，解决人民生活用盐和工业原料用盐的问题。当华国锋汇报大盐矿已开始出盐时，毛泽东还连声称赞说：好！好！好！

——第39次

1970年3月，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工作，在同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谈话时进一步提出，湖南能不能10年建成工业省？当时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是三线建设和内地建设，把湖南由农业省建成工业省是他思考已久的事情，多次提出来同湖南党政军负责人商量。华国锋等研究了毛泽东的指示，积极组织贯彻落实，开始把建成工业省问题作为湖南的大事来抓。

——第40次

1970年4月11日，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工作。晚，林彪从苏州

让秘书打电话向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问题，“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林彪还说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同时传到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政治局讨论后，多数人同意林彪关于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将会议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林彪明知毛泽东不会再任国家主席职务，仍然反复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实质上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次日，毛泽东说：“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这等于给林彪的野心勃勃以当头一棒。毛泽东还针对叶群打来的电话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么就让董老当吧！”

毛泽东于4月11日接见华国锋、卜占亚，于4月13日接见黎原、华国锋、卜占亚等湖南党政军负责人，谈国际形势和备战备荒问题。4月13日下午离长沙。

——第41次

1970年8月初，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江西参加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途中到南方各省巡视，再到长沙，重点了解“九大”以来全国各地落实中央决议的情况，为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收集有关材料。8月22日毛泽东从湖南抵达江西九江，上庐山。

——第42次

1970年9月10日晚11时，毛泽东的专列从庐山抵达长沙大托铺机场专线，在列车上住了2天。这时，党内刚刚发生九届二中全会的斗争，毛泽东一路上仍在思考发生在庐山的那场斗争。

9月11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汇报工作，毛泽东再次提出：你们湖南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工业省？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正在开工建设的湘黔铁路、枝柳铁路湖南段和风滩水电站、资江氮肥厂、省维尼纶厂等大型项目的情况，表示湖南一定抓紧工业基础建设，落实毛泽东建成工业省的指示。

——第43次

1971年4月，毛泽东到湖南，住省委九所。他看到熟识的服务员，便把自己所读的64开本的《共产党宣言》赠送给她们学习用，勉励说：青年人要学马列主义，要学阶级斗争。他看到身边工作人员都佩戴着各式各样的像章、语录牌，十分反感，当即要求她们取下来，强调说不要搞形式主义。

——第44次

1971年8月27日傍晚，毛泽东南巡到长沙，住省委九所6号楼。他找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区、广州军区和中央的党政军负责人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和汪东兴谈话，详细阐述了党内开展反对假马克思主义路线斗争的原则和方针，指出林彪犯的错误。在长沙的谈话，是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中心内容。

8月31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去南昌，上车时叮嘱华国锋回北京后只能将谈话内容向周恩来一人汇报，注意保密工作。同时，毛泽东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湖南工作，指出“原来的湖南省委是好的”，为湖南省委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壮胆撑了腰。

——第45次

1974年10月13日凌晨，毛泽东乘专列从武昌抵达长沙，住省委九所6号楼，在湘休养了114天。

10月16日晚，毛泽东观看湖南电视节目时，提出湖南也要发展彩电事业。

10月18日上午，王洪文飞到长沙告邓小平的状，毛泽东严肃批评了他。

10月20日，毛泽东接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会见后，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1月6日，毛泽东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

塔斯·威廉斯博士及其随行人员。会见后，毛泽东听取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工作情况的汇报，明确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11月12日，毛泽东会见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及其随行人员。会见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赞同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的抵制和斗争，并交待他担当起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责任。

同日，毛泽东致信江青，要她不要组阁当后台老板，人贵有自知之明。

11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明确指出她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不要再说没有工作。

11月28日，毛泽东电贺阿尔巴尼亚解放30周年。

11月，毛泽东多次收看湖南电视文艺节目，其中有一些专门为他演出的传统剧目。毛泽东还圈定要看正在受批判的《园丁之歌》，评价它是一出好戏。

11月至12月，毛泽东先后5次到省游泳馆游泳，每次半小时以上，并提出要到湘江中去游泳，但被劝阻。

12月17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及其随行人员。邓小平、王海容、齐宗华、罗旭、唐闻生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同日，毛泽东在刘志丹夫人同桂荣要求释放刘景范的信上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使刘景范得到释放。

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先后飞来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当汇报话题转到邓小平时，毛泽东指指脑袋说：“他政治思想强。”又指着王洪文说：“POLITICS(政治)比

他强。”“他没有邓小平强。”又写下一个“强”字。毛泽东接着写下“人材难”三个字。周恩来会意接着讲人才难得。毛泽东把笔放下了，表示他要用笔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对王、张、江、姚再度严肃批评，要他们不要搞四人小宗派，不要搞四人帮，并当面责成王洪文写出检讨。

12月25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第三次谈话，并留周恩来再住3天。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诞辰。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去韶山参观学习。中午，毛泽东请全体警卫和工作人员吃面条，他自己吃了一点面条，喝了一口酒，为长沙酒厂生产的粮白酒命名“白沙液”。

12月26日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长谈，讲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讲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还对中央各负责人的优缺点作了分析评价。他们对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作了最后商定。周恩来回京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持召开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1974年底，毛泽东针对“四人帮”在民兵领导体制上另搞一套，煽动派性斗争，扩建所谓“第二武装”的情况，明确指示周恩来、王洪文：“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当时湖南造反派组织所谓“民兵指挥部”，冲击省委机关。毛泽东责令在全国解散这类“民兵指挥部”。周恩来在接见湖南省委书记时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精神。

197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多米尼克·明托夫及其随行人员。

1月16日，毛泽东会见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一行。

1月17日,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通知》,《通知》中传达了毛泽东最近在长沙有关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和反对派性等方面的指示。

1月23日至27日,江青来长沙,住省委蓉园1号楼,见毛泽东一次,没有收获。

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所作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开整顿工作之先声。

1月26日,叶剑英致信毛泽东,建议新建中央军委常委会,增补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同志为军委常委。毛泽东审阅同意,2月5日中央三号文件通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

2月2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了由邓小平代替重病的周恩来主持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当毛泽东得知周恩来病情恶化、便血的诊断报告后,当即交代秘书打电话到北京,专门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工作。

因为2月11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湖南省委的同志希望毛泽东能在家乡过一个新春佳节,可毛泽东却考虑到让湖南同志团聚过节,于是说:“大家辛苦啦!客走主人安,让大家过好春节,我们走啦!”他决定在春节前离开湖南。

2月3日晨,毛泽东同湖南省委负责人及工作人员话别留影,然后登上专列,向江西驶去,取道杭州、上海回北京。

新时期党的重要文献出版述略

沈学明 李新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观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创造这一成果的最杰出的代表,而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科学成果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形成,并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而继续发展。以这样的观点作指导,在继续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同时,编辑出版党和国家其他主要领导人的著作被提上议事日程,开创了新时期党的文献编辑出版工作的新局面。

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 18 年来,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已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先念、叶剑英、薄一波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选集、文集、专题集 66 种,计 111 册,约 3100 万字;编辑出版了党的历史文献 1 种,20 册,780 万字;当代文献 18 种,27 册,约 1078 万字;编著出版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年谱、传记 9 种,25 册,约 895 万字。这些编辑研究成果,以其权威性、科学性,在党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欢迎,有的已经传播到海外。同时,这些系列出版物,在我国新时期的出版业上独树一帜,占有重要地位。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出版概况

1980 年 5 月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以后,依照党中央赋予的任务,开始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生平、思想,编辑并研究党和国家及军队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截止 1998 年

5月,有关党的重要文献的编辑出版已形成几大系列,出版概况分述如下:

1、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选集、文选

《毛泽东选集》1至4卷,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107.2万字^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58.2万字。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至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1998年1月,502.1万字。

《毛泽东文集》1至5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1996年8月,138.4万字。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建设》(俄文版文集),俄罗斯帕列亚出版社1998年出版。

《周恩来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1984年11月,68.5万字。

《刘少奇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1985年12月,66.1万字。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31万字。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37.8万字。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26.5万字。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24.9万字。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28.8万字。

《邓小平文选》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卷

^① 每部文集字数均按版权页计,以下同。

26.3万字;第2卷30.1万字。

《邓小平文选》(一卷本),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7月,35万字。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俄文版文集),俄罗斯帕列亚出版社1997年出版。

《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21.8万字。

《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25.3万字。

《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27.8万字。

《陈云文选》1至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1卷30.5万字;第2卷25.2万字;第3卷29万字。

《陈云文选》(一卷本),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7月,35万字。

《李先念文选》(一九三五——一九八八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36万字。

《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45.5万字。

《薄一波文选》(一九三七——一九九二年),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42.2万字。

《万里文选》^①,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43.3万字。

《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43.1万字。

江泽民:《改革·发展·稳定》(俄文版文集),俄罗斯帕列亚出

^① 《万里文选》是中共中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辑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了审核、校阅工作。

版社 1996 年出版。

2、专题集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21.2 万字。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31.1 万字。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25 万字。

《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 9 月，10 万字。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3 月，30.8 万字。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 1990 年 7 月，53.9 万字。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14.9 万字。

《毛泽东军事文集》1 至 6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267.6 万字。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42 万字。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六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4 月，18.5 万字。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8 月，10 万字。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9 月，15 万字。

《周恩来教育文选》^①，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14.2 万字。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34.1 万

^① 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核。

字。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1 月，33.9 万字。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 5 月，33 万字。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2 月，43 万字。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4 月，50 万字。

《周恩来军事文选》1 至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155 万字。

《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2 月，54 万字。

《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 10—1924. 6)上、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2 月，97.2 万字。

《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2 月，10 万字。

《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年 8 月，20.6 万字。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8 月，32 万字。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5 月，49.9 万字。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36 万字。

《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 8 月，69.3 万字。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3.9 万字。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3 月，8.5 万字。

邓小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7 月，1.1 万字。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一七月），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9 月，2.5 万字。

《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6 月，1.6 万字。

《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7 月，9.7 万字。

《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8 月，6.7 万字。

《邓小平同志论民主与法制》，法律出版社 1990 年 4 月，4.75 万字。

《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8 月，10.4 万字。

《邓小平论教育》（第 2 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4 月，11.3 万字。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16 万字。

《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7 月，11.7 万字。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20.3 万字。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2 月，32 万字。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中国曲艺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6.1 万字。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97 年 6 月,8.5 万字。

《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5 月,21 万字。

《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 3 月,59.5 万字。

《邓颖超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 月,29 万字。

《邓小平陈云六篇重要讲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9 月,13 万字。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8 月,39.6 万字。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 5 月,30 万字。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格言》,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 月,21.6 万字。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7 月,33.5 万字。

《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 1990 年 2 月,24 万字。

《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和党史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60.2 万字。

3、党的历史文献、当代文献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至 2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 5 月—1998 年 5 月,780 万字。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下,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8 月,180 万字。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下,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8 月,80 万字。

《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5 月,15.2 万字。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27.6万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73.3万字。

《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30.1万字。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1988年5月，88.5万字。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1993年12月，133.3万字。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1998年4月，114.2万字。

《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1月，32.5万字。

《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7月，53万字。

《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27.8万字。

《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46.7万字。

《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0月，51万字。

《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41万字。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16万字。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10月,38.8万字。

《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21.3万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0月,61万字。

4、年谱、传记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下,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139万字。

《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75万字。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60万字。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67万字。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164万字。

《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60万字。

《周恩来传》(1898—1949)上、下,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68万字。

《周恩来传》(1949—1976)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84.8万字。

《周恩来传》全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152万字。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89万字。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41.4万字。

《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60万

字。

《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46 万字。

《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4 月，60.5 万字。

5、手迹、画册

《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文物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

《毛泽东诗词手迹》上、下，线装本，线装书局 1997 年 6 月。

《周恩来手迹选》，文物出版社 1988 年 1 月。

《周恩来南开校中作文》，线装本，线装书局 1998 年 2 月。

《周恩来旅日日记》，线装本，线装书局 1998 年 2 月。

《朱德手迹选》，北京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

《老一代革命家手迹选》，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5 月。

《毛泽东》(画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

《周恩来》(画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2 月。

《周恩来风采》(画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2 月。

《朱德》(画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

《邓小平》(画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1 月。

《陈云》(画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5 月。

《彭真》(画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 9 月。

《李先念》(画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6 月。

《王震》(画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

《董必武》(画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3 月。

《叶剑英》(画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4 月。

6、宣传、研究、回忆文集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7 月，9.6 万字。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7 月，45 万字。

《毛泽东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 8 月，51 万字。

《缅怀毛泽东》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95 万字。

《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153 万字。

《历史的真实》，香港利文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

《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 月，45.3 万字。

《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44.4 万字。

《周恩来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47 万字。

《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 1 月，40 万字。

《周恩来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3 月，47.8 万字。

《周恩来大辞典》，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2 月。

《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8 月，32.6 万字。

《刘少奇研究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8 月，34 万字。

《刘少奇与新中国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 7 月，33 万字。

《刘少奇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6 月，61 万字。

《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 5 月，30 万字。

《纪念朱德诞辰 110 周年：全国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2 月，39 万字。

《任弼时同志八十诞辰纪念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年 8 月，9 万字。

《任弼时研究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 5 月，17 万字。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说词，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回忆邓小平》上、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2 月，120 万字。

《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5 月，40 万字。

《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4 月，93 万字。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内部本。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本，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9 月，43 万字。

《老一代革命家著作注释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60 万字。

《历届中央委员人名词典》，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 5 月，42 万字。

《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名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 9 月，16 万字。

《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35 万字。

《党的十四大以来大事记》，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9 月，2.4 万字。

7、电子出版物

毛泽东(十二集电视片录像带)

巨人之声·毛泽东(录音带和 CD 盘)

巨人之声·周恩来(录音带和 CD 盘)

巨人之声·邓小平(录音带和 CD 盘)

周恩来(十二集电视片录像带和 VCD)

朱 德(六集电视片录像带和 VCD)

邓小平(十二集电视片录像带和 VCD)

多媒体只读光盘《邓小平》

多媒体只读光盘《周恩来》

8、编辑刊物

《文献和研究》月刊 33 期,双月刊 18 期。

《党的文献》63 期,1300 万字。

二、新时期党的重要文献出版物的版本特色

(一)文献内容丰富,首次公布的文献量大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长期革命历程中留下的大量文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党的一笔丰厚的思想理论财富。国内以往编辑出版的文集,通常是作品先发表,后结集,或大部分公开发表,少量待结集时第一次公开。而老一代革命家的选集、文选及党的历史文献,由于多年来一直被封存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鲜为人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披露。因此,文献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献内容十分丰富,首次公布的文献量很大。例如:

《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共收入文献 116 篇,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占 75 篇;《刘少奇选集》上、下卷,共收入文献 76 篇,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占 47 篇;《朱德选集》,收入文献 65 篇,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占 32 篇;《任弼时选集》,收入文献 47 篇,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占 32 篇;《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收入文献 222 篇,首次公开的占 140 篇;《陈云文选》一至三卷,收入文献 157 篇,首次公开的占 110 篇。由此可以看出,过去从未公开发表的文稿,至少占所收文稿的一半。许多大型文献集所编选的文献中,属于第一次公开与读者见面的,总量也在 50%左右。例如系统展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毛泽东

军事文集》，收录了毛泽东 1927 年 8 月至 1972 年 12 月间撰写的军事电报、命令、批示、报告、信函和军事理论著作 1612 篇，267 万字，其中大部分是从未发表过的。供党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研究用的 13 卷本 502 万字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录了自 1949 年 9 月至 1976 年 7 月 27 年间毛泽东的各种手稿、经他本人或中央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以及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表的文稿等，文献量十分丰富，且近半数是第一次披露。仅以该书前 3 册为例，编入毛泽东 1949 年 9 月至 1952 年底的文稿计 1354 篇，其中手稿（文章、指示、批示、批注、书信等）达 1257 篇，未发表过的占 1076 篇。历时 9 年编竣的 20 卷本文献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以 780 万字的巨幅宏篇，反映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夕 17 年间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决策，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其中多数文献也是首次公开发表。

（二）精选精编，坚持文献编辑规范化

编辑党的重要文献，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很强的工作。目前编辑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供干部和群众学习的选集、文选等，一类是供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党史工作者研究和使用的资料性文集。无论面向什么样的读者，从事这项工作的编辑人员始终遵循了精选精编的原则。现已出版的老一代革命家的选集、文选，都是从成百上千件档案中精选出来的，是最有代表性，最能体现作者思想发展脉络，反映作者生平贡献的作品。有这样几个例子，很能够说明精选的程度。《邓小平文选》（1938—1965 年）出版时，编入文稿 39 篇，近 25 万字，篇幅不算大。然而这 39 篇文章，是编辑人员从收集的几千件报告、讲话、电报、手稿以及各种会议记录中选出来的。仅打印的预选稿就有 100 多万字。这本书的篇目几经变动，由 70 多篇筛到 50 多篇，再筛到

40多篇。按照精选精编的原则，一再筛选，最后定下的39篇，集中反映了邓小平28年间的重要思想。《陈云文选》1926—1949年、1949—1956年两卷出版时，所收的97篇文稿，是从500多篇文献档案中挑选出来的。在选稿过程中，陈云强调，文章不要选得很多，特别是早期的东西，思想还不成熟，可以不选。如1925年至1926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当店员，领导工人运动写了多篇文章，开始选了3篇，他只同意保留1篇，即目前第一卷的开卷篇《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专题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共收入毛泽东的书信372封，是从2000多封信中选出的；《周恩来外交文选》，收入周恩来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的代表作80篇，是编辑人员查阅5500多件档案，五易篇目，最后选定成册的。编辑供领导干部或研究人员内部使用的文献汇编和个人文稿集，选稿范围尽管要宽泛一些，但亦无法有文照录，也是坚持精选原则，确保把那些有研究价值和文献价值的文稿介绍给读者。编辑《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2、3册时，收入集子的269篇文献，就是从8000余件文献中筛选的，大体是收集到的文献的1/30。

党的文献编辑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来不得半点随意性。从文献的收集到选稿，从版本考订到文稿整理，从用字规范到标准符号的使用，从题解到注释，都有严格的编辑要求和工作程序。从而形成这些出版物的又一显著特点，即文献编辑的规范化。在这里，精选精编的原则是贯穿于每一编辑环节上的。例如考订，是编辑工作流程中难度很大又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我们党历来很重视档案、文件保管工作，但是党长期所处的战争环境和秘密工作环境，给各级组织保存党的文献带来了很大困难，有的在战争中遗失了，有的迫于形势残酷而销毁了，有的虽然保存下来却没有辅以必要的文字说明。这些都给编辑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为了保证所编文献的真实性、准确性，编辑人员在编辑每一本文选、文集、专题集

时,无不付出异常艰辛的劳动。1983年,《毛泽东书信选集》编辑组为了核实372封书信的人名、地名、年代、事件等,不仅查阅大量档案、书刊,而且对受信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访问。在北京调查访问达300多次,又到上海、长沙、湘潭等十几个县市走访了200多个单位和个人。正是这样把档案资料同调查访问相结合,互为印证,才完成了这批书信的考订工作。

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注释。现已出版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文选、文集、专题集等,在卷末或页下都附有注释,这是根据读者的需要,对文献中涉及的人物、背景、重要概念等作一说明,以助读者全面准确地理解正文。注释是衡量编辑水平的重要方面,有时为了对正文内容作补充介绍,也从注释的角度公布作者的一些相关文献资料。例如《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6、93、94、95、99、100的注释中,分别收入了邓小平3条题词和6条批示,这些重要题词和批示,进一步丰富了书中作者的思想观点,与正文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20余年来,为老一代革命家文集所作的注释约1万余条。1989年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组从当时积累的6000条注释中,选择内容较丰富和具有史料价值的2100条注释汇编成《老一代革命家著作注释选》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本查考用的工具书。

(三)适时修订,注重版本的完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适应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理论的需要,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不仅及时编辑出版了老一代革命家著作集,而且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修订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陈云文选》,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完备、准确的版本。

《毛选》(一至四卷)第一版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在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先后出版。出版后陆续发现有一些需要校正的问

题,从正文来说,主要是某些史实和用字存在一些问题;从题解和注释来说,在史实表述及提法的准确、恰当方面也存在一些缺点以至错讹。从1962年起,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从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等单位抽调专人开始进行第一版注释的修订工作。这项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直到80年代末,《毛选》基本再没有印刷过。人们所能买到的,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作过删改的本子,这个本子自然已不宜于继续发行。199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修订《毛选》第一版,修订工作立即全面展开。

《毛选》第二版保持了第一版原有的篇目,只增加了《反对本本主义》一篇。这篇文章是反映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最早的文献。它在战争年代散失了,直到1960年才找到。毛泽东非常喜爱和重视这篇文章,找到后高兴至极,将它编入了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此次修订只增补这一篇文章,表现了修订者对毛泽东遗愿的尊重和对修订的慎重。

《毛选》第一版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权威版本,在国内外广为传播。作者审定的文章,任何人无权修改,只能校订正文的史实、文字和注释方面的问题。这次修订,对正文,主要改正了一些著作的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校正了少量错讹的史实和错字、漏字,校订情况均列表附在各卷书末,以备读者查对。对某些用字,包括少数地名用字,根据国务院关于文字规范化的要求作了更改。对题解,主要订正了某些史实的错误,删改了少量不合事实的提法和评价,增写了几条简单的题解。修订《毛选》第一版的重点是校订注释。对该书872条注释逐一进行了核对,修正了注释中一些失实的表述、不准确的提法和偏颇的评述,并且增写了一部分注释。《毛选》第二版于1991年7月1日在全国公开发行,为读者提供了一

个更为完善的版本。对《毛选》的修订情况，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书中有全面反映，一是《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一是《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前者介绍了对《毛选》第一版正文、题解、注释的修订原则和修订内容，后者介绍了《毛选》第一版注释中，有实质性改动的 362 条注释的修订情况及主要根据。这两本书是了解此次修订工作的重要参考读物。

《邓选》(一至三卷)的版本，是在不断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

1983 年，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第一本《邓选》，收入邓小平 1975 年至 1982 年的讲话、谈话、报告等 47 篇，反映他领导 1975 年整顿，全面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的主要思想和理论。1989 年编辑出版了第二本《邓选》，收入邓小平 1938 年至 1965 年的文章、指示、报告、讲话等 39 篇，反映他在战争年代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主要思想和理论。1982 年后，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邓小平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新事业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思想观点，有着许多鞭辟入里的论述。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编辑出版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增订本，《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 年 2 月至 7 月)》等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以及报道和文件、通报，对及时传播邓小平理论、统一全党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毕竟不同于一部完整的文选那样系统和全面。1990 年 4 月，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中央文献研究室开始着手编选《邓选》第三卷。1992 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同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提出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党内外干部和群众要求出版《邓选》第三卷的呼声更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编辑委员会调集力量，加紧编辑，终于在 1993 年 10 月底出版了《邓选》第三卷。这部选集反映了邓小平 1982 年至 1992 年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的主要思想和理论,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无可估量的现实指导意义。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由于与前两本《邓选》(1975—1982年)、(1938—1965年)的书名不尽一致,而且编定第三卷再回过头来看前两本,有些思想内容很深刻的文稿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编入。因此,经邓小平同意,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对前两本邓选又作了增补和修订。《邓选》(1938—1965年)增补了4篇文章,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邓选》(1975—1982年)增补了14篇文章,删去了已移入第三卷的十二大开幕词,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一、二卷于1994年11月《邓选》第三卷出版1周年之际与广大读者见面。至此,《邓小平文选》有了一部从内容到形式更为完备的版本。三卷文选在时间上相衔接,内容上相贯通,历史跨度从1938年至1992年,共55年,收入文章、讲话、谈话等222篇,约80万字,邓小平生前最重要的著作都包括在其中了。

《邓选》一至三卷的编辑工作,都是在邓小平指导下进行的。收入《邓选》的文稿,出版前都经过作者审定,尤其是第三卷出版前,已是80高龄的邓小平,不顾年迈和夏日酷暑,亲自审定了每一篇文稿。这就更决定了版本的权威性。

(四)多角度、多侧面、多题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文献编辑领域不断拓宽,有关毛、周、刘、朱、任、邓、陈等人的珍贵文献,被多角度、多侧面、多题材地展现出来,从而使党的文献出版物更加丰富多彩。在推出老一代革命家系列文集、文选的同时,不拘泥于一两本综合性论著,开辟多种专题展示他们的思想与风貌,成为编辑人员努力的方向。近20年来,先后推出的一批精心编辑的专题集,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995年是党的七大召开50周年。为了纪念七大,中央文献研

究室编辑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收入毛泽东 10 篇报告和讲话。这本专题集出版后，深受理论工作者和党史研究工作者的欢迎。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1989 年为配合全党干部学哲学而编辑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汇集了老一代革命家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阐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著。出版后成为各级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重要读物。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历史、哲学著作，并且写下不少批语。专题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编入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建国以后研读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写下的 10 种读书批注，一篇读书摘录，一封读书通信和一本读书日记。《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编入了他阅读 39 部文史古籍所写的 310 多条批语。这些批注，短者数语，长者千余言，蕴含精深的哲理，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诗词、书信是反映老一代革命家思想、品德、情怀、意趣和革命实践活动的珍贵文献，也最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1986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的《毛泽东诗词选》，收入毛泽东的诗词 50 首。这本诗词选的编辑工作，从编辑方针、体例的确定，到诗词的编选和注释，都是在胡乔木具体指导下进行的。特别是对全书诗词的注释，他更是倾注了很多心血，不少条目是他亲自撰写和改定的。由于胡乔木亲自主持编辑，这本诗词选成为很有特色、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权威版本。1996 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又以此为底本编辑了《毛泽东诗词集》，共收毛泽东诗词 67 首，并在附录中收入了毛泽东关于自己诗词的一些书信、批语和谈话，以助读者理解。这部集子集中反映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成就，问世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

迎。

这些年,在专题集的出版中,书信集的编辑和发掘取得了很大成绩。影响较大的有:《毛泽东书信选集》、《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陈云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等。这些专集,从书信的角度,揭示了革命领导者的情感世界和人际交往,是了解他们生平思想的生动资料。

(五)运用高科技反映党的思想理论成果

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改造和发展传统产业,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把高科技成果引入党的文献编辑领域起步较晚,目前仍在尝试阶段,但它已显示出普通印刷版本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多媒体只读光盘《邓小平》,这是第一次运用多媒体形式,集文字、照片、影视、录音为一体,全面反映邓小平伟大理论和光辉业绩的电子出版物。这套光盘共有5张,收录文字200多万字,照片1200多张,影视录音97段。其中包括《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邓小平传略、年表,有关人物事件辞条,邓小平逝世的重要文献和悼念活动资料等。每一部分内容可以交互检索和查询,文字和照片可以打印输出,便于阅读、使用和保存。继《邓小平》光盘之后,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又推出《周恩来》的光盘。这套光盘的信息容量亦十分可观,有文字资料500万字,图片1300幅,历史影片50段,原声录音100分钟,音乐编曲14节,以编年体的形式展现了周恩来的一生。多媒体光盘的特点是信息量大,图文并茂,声像结合,是一种便于收藏和利用的出版载体。目前,多媒体只读光盘《毛泽东》、《刘少奇》等也在制作中,由此将形成党的领袖的电子图书系列。

以上所述,仅仅是撷取党的文献出版物的几个主要特色作一简评,无法一一详述。党的文献编辑领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的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肩负着宣传党的指导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使命。新时期的开创，社会的需求，推动了这一事业的长足发展，促成了今日的出版局面。1998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曾庆红陪同下到中央文献研究室视察工作。他很有兴趣地阅读了毛泽东的一些手稿，参观了党的重要文献出版成果展览。江泽民在会见各部门负责人时讲话指出，“我们党已经有77年的历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形成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记录了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的奋斗历史，记录了我们党在极其复杂的环境和完成伟大艰巨的任务中是怎样思考和作出重大决策的，是党和人民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大批文稿，尤其珍贵。我们党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集中地体现在这些文献中。研究和编辑出版这些文献，研究老一代革命家的生平和思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可以长久地教育、激励今人和后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干得更好。”江泽民的视察及指示，将推动党的文献编辑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新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

彭咏梅

党史资料是党的历史活动的记录,是研究、编写党史的依据。中国共产党自从登上政治舞台以来,走过了70多年的奋斗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本文拟就新时期党史资料征集的基本情况作一简要回顾,以纪念推动并引导这项工作顺利发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

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发展历程

(一)建立各级党史资料征集机构,普遍发动、广泛开展党史资料征集工作(1980—1982年)

建立专门的党史资料征集机构来开展这项工作,是缘于编写党史“正本”的需要。1980年1月,中央发出9号文件,决定成立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组成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和由胡耀邦、彭真、粟裕、胡乔木、陆定一、李维汉、程子华、杨尚昆、王鹤寿、安子文、姚依林、冯文彬组成的党史编审委员会,负责审定党史编辑计划;同时决定成立中央党史研究室,作为研究和编写党史的专门机构,其领导成员是:主任胡乔木,副主任胡绳、华楠、李新、廖盖隆。

研究和编写党史,首先必须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为此,经党中央批准,1980年5月成立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中央编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设14名委员,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央党校、革命军事博物馆、军事科学院、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央宣传部、中央组

组织部、人民大学、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现代史研究室、军委办公厅、政治学院等有关方面的人员组成。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成员冯文彬为主任委员，廖盖隆（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明哲（中央档案馆）、马齐彬（中央党校）为副主任委员。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成立初期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推动各级党史资料征集机构的建立。1981年2月，中央办公厅、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地方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或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的通知》，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在不增加编制的原则下，都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地、县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在省、地委秘书长或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到1982年8月，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当时海南省尚未组建，重庆未列入直辖市）均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绝大多数同时建立了办事机构——征集办公室。人民解放军成立了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野战军和省军区、军分区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中央、国家机关中的一些部门，如中央统战部、农机部、国家物资总局和国务院参事室等也建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或征集小组。至1982年底，全国党史资料征集网络基本形成。

2、召开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一起，于1981年8月10日至20日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出席会议的共305人。谭震林、萧克、李强、曾三等老同志应邀就党史研究和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中的有关问题作了报告。邓力群、廖盖隆、胡华作了学习《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辅导报告和党史研究的学术报告。谢筱迺作了关于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报告。冯文彬集中与会代表的意见，就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问题作了总结发言。

3、协助召开地区性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指导和协助下,从1982年3月至10月,分别在长沙(3月15—21日)、南京(5月12—17日)、太原(7月5—9日)、沈阳(8月20—24日)、成都(10月21—26日)召开了中南、华东、华北、东北、西南5个地区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在东北地区会上,有9位同志献交了珍藏多年的重要党史资料和照片;在华北地区会上,山西、河北、北京等省市的党史资料征集部门献交了他们新近征集的部分珍贵文物,罗贵波献交了他参加“七大”的笔记和长期珍藏的革命文物,黎玉献交了他整理的有关党史资料;在西南地区会上,卢竞如、吴克坚和谢唯进的女儿谢进珍等18位同志献交了珍藏的党史资料和革命文物。老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使与会者深受教育和鼓舞。

4、征集到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以及各地报送的党史资料目录。从1980年5月到1981年8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仅中央档案馆就收到(根据中办发〔1980〕36号文件的规定,征集到的重要原件送交中央档案馆,原单位可留下复制件;普通党史资料将目录送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各二份)毛泽东手稿12件,周恩来文稿290余件,刘少奇文稿54件,朱德文稿48件,董必武文稿443件,陈独秀手稿130多件,以及其他文件资料共2000多件。还收到资料目录658册,目录中登记的资料有150多卷,共21万多件。另外,对30多个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保存的革命历史资料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调查,仅1934—1949年间的历史文件就有2000多卷。

地方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到1982年3月,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广西5省区共征集到各种党史资料近2万件。四川省解放前党组织斗争历史就收集了近千万字。贵州省征集革命文献、文物8000多件。成都军区征集文献、文

物、历史照片 600 多件。其他省、区、市在征集历史文件资料方面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5、向老同志征集了一批回忆录。1980 年底开始，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决定，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作为抢救“活资料”的第一批重点，共向他们发出了 1 万多封征集信，这些征集信得到了热烈的回应，几个月之间，就收到革命回忆录 200 多篇，数百万字。留下的采访录音带约 500 多盘。

6、拟定征集提纲，组织专题座谈。为了给党史研究和编写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供可靠的资料，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 1981 年 12 月向全国各地、各部门以及军队系统的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或征集小组）下发了《目前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参考提纲（一）》，要求“依据实际情况，组织了解情况的有关人员撰写回忆录或提供资料和线索，并请随时转送我委，以供研究党史之用。”这份提纲按照历史时期，提出了从 1921 年至 1976 年之间需要征集资料的 69 个重要历史问题。属于党的创立时期（1921—1923 年）的问题 7 个，要求了解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蔡和森等人建党的情况和各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情况，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建党的关系等。第一次大革命时期（1923—1927 年）的问题 12 个，主要涉及国共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其中有：黄埔军校创办情况，中山舰事件中我党的态度，中央对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态度，马日事变后农军是否包围过长沙以及毛泽东的主张等。还有一部分问题是有关党的会议（四大及四届中央执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党的组织（广东省委、中央军委建立时间及历届领导人等）的情况，共产国际、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以及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中国的活动情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 年）的问题最多，有 13 个。其中属于红军长征以前的问题有：在广州起义问题上的主要分歧、井冈山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的联系、第二次打长沙问题上

红一方面军前委主要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及中央迁入苏区后白区党组织活动、白区反文化“围剿”的情况等。有关长征的问题有3个，包括红军长征的决定、留下的红军及中央办事处的情况、是否召开过通道会议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北方局与南京方面是否也举行过和谈、张国焘的西征计划是否得到中央同意等。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的问题5个，主要是要了解长江局、南方局、“中国革命民主同盟”的工作情况以及对其评价问题，国共两党谈判的过程，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以及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关系。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8个问题，包括：1945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东北战场初期出现的两种工作方针之争，我军进入东北后与苏军代表谈判的情况，上海、北京地下党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城工部是怎样做敌军工作的，我党对台湾工作的情况，重庆谈判的经过及我方执行协议的情况，斯大林对我解放战争采取了怎样的态度等。恢复国民经济时期(1949—1952年)4个问题：决定出兵朝鲜有哪些不同意见，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贡献和失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央是否经过讨论及作过哪些决定和指示，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向京津地区高等院校师生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报告之前，党中央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有过哪些指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1955年)4个问题：高岗、饶漱石是怎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及中央财经会议的经过情况，1955年合作化问题争论的起因及下半年批判邓子恢的经过，对建国后头7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评价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5年)8个问题：1956年批判反冒进的情况，整风运动是怎样转向反右派斗争的，人民公社是怎样搞起来的，怎么提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是怎样把林彪选为副主席的？19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情况及影响，1962年9月八届十

中全会为何重提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一时期对文艺界、学术界的错误批判是怎样搞起来的?“四清”运动的由来和发展,中央从“前十条”、“后十条”到“二十三条”的决定过程怎样?“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的问题9个: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后的斗争情况及“二月提纲”讨论通过的情况,上海“一月风暴”的经过情况及山东、黑龙江、山西、贵州等省夺权经过;1967年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经过及实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以后中央文革小组是怎样取代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为什么197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搞清查“五·一六”,其经过和后果怎样?1972年批极左与反批极左的情况怎样?各地党员群众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的斗争有哪些典型事例?有关1976年3月底的“南京事件”和4月“天安门事件”的各种材料,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怎样酝酿、组织和进行的等等。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成立初期,还曾组织过“中央特科”、“二十八个半”、“东北军”等专题座谈会;开展了对遵义会议、所谓“伍豪启事”等历史情况的调查;出版了《党史资料通讯》、《中共党史资料》两个刊物。

(二)进行重点征集和专题研究(1983—1984年)

1983年1月25日至31日,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天津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和会议之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经过与各地协商,在普遍征集的基础之上,确定了600多个专题。要求每个专题必须附有一份综合报告,概括地介绍该专题的内容及主要资料的原件。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1984年6月和8月,分别在北京和江西召开华北地区、华东地区业务工作座谈会,交流专题工作的进展情况和经验。在这两次座谈会上,印发了《1921年至1927年上海、江苏、浙江党组织发展概况》、《中共南委、粤北省委被破坏

的经过及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应变措施》、《关于作出南昌起义决定的情况的调查报告》、《关于错杀袁文才、王佐问题的调查报告》、《湘鄂西苏区和红军的创建、发展及其斗争情况》等专题资料。经过共同解剖“麻雀”，与会人员进一步明确了征集、整理党史专题资料的具体要求，为保证党史专题资料的质量奠定了基础。到1984年底第三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召开时，各地完成上报专题资料54个和一批自审专题资料。

(三)制订规划，对党史资料开始进行全面的征集、整理和编纂(1985—1989年)

1984年7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制订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方案》；10月24日拟订了《关于〈淮海战役〉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方案》并上报邓小平(10月28日邓小平批示“无意见”)；10月25日又拟订了《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方案》，并经聂荣臻、彭真批示同意。同时，又于1984年12月19日至23日在西安召开第三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加强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的意见》和《中共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十年(1985—1994)规划(草案)》。这两个文件后经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党史工作小组同意，以中办发〔1985〕40号文件转发全国参照执行。《意见》提出：在今后五至十年内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继续全面征集党史资料，着重收集以下各类资料：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的报告、文章、书信、谈话记录和图片等。2、党和党所领导的政权、军队及其他组织的历史文件。3、早期的党报、党刊和其他重要出版物。4、重要的革命文物和革命遗址的资料。5、敌、友方面留存的有关我党活动的重要资料。6、老同志反映党的历史活动的日记、书信、文章和有史料

价值的回忆资料。(二)认真整理党史资料,积极提供利用。对有关资料分三类进行整理:第一类,党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重大活动的历史资料。第二类,党所领导的各条战线和各个方面的重要历史资料。第三类,党在各个地方活动的重要历史资料。(三)编辑出版党史资料丛书。《规划》对《意见》所提出的任务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说明和规定。

这次会议还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提出了拟编书目,共分为两大类:其中,(一)从党的创立时期至“文化大革命”前的重大事件或重要问题 113 个;(二)历次重要会议 115 个;党的组织史资料、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7 个)、农民运动(7 个)、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狱中斗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社会主义时期的军队建设、国际联络、工会、青年、妇女工作。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会议提出 1985 年的工作重点是编辑出版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等反映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资料丛书。会议还要求这套丛书应该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综合性。书的内容包括 8 个方面:1、综述;2、文献资料;3、回忆资料;4、参考资料(敌、友方面的资料);5、大事记;6、考证资料(对说法不一的问题进行考证);7、图表;8、照片。二是权威性。要求由征集部门和档案部门主持和组织编纂,请老同志把关,并听取党史工作者的意见,力求做到论点正确,史实准确、可靠。

(四)工作重点由民主革命时期转向社会主义时期(1990—现在)

1988 年,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地方党史工作机构根据中央办公厅〔1989〕19 号文件的精神,大多数也相继更名为党史研究室。1990 年 3 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召开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

人座谈会。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杨尚昆、薄一波、胡乔木到会讲话。这次会议对地方党史部门的工作提出了“三个结合”、“三个加强”的建议：1、把党史资料征编工作同党史研究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继续做好党史资料征编工作的同时，逐步加强党史研究工作；2、在继续搞好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的资料征编和课题研究工作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资料征编和课题研究工作；3、正确处理党史学科的基本建设与党史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关系，努力发挥党史工作的社会功能。随着民主革命时期党史资料征编任务的逐步完成，1993年4月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会议将“加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征编和专题研究工作”作为主要议题和今后党史部门的主要任务提了出来。同时，还制订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资料征集、编纂的第一批选题》。这个选题规划，包括全国性的选题28个，地方选题73个。此后，各省、区、市党史部门加强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工作的力量，加大了工作力度。各地从编写本地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和征集、整理、编纂专题史料入手，循着先易后难的路子，由建国后的头7年和新时期14年，向中间两个10年逐步推进。

二、党史资料征集、整理、编纂工作的主要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年至1995年的15年间，全国29个省、区、市党史部门（不含新疆），征集资料372.8万件；发表各种文章11万篇；出版书籍2.7万种。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已经出版有43种，共84册，8083万字：

1、《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82万字，上、下册。

2、《衙前农民运动》，中共浙江省党史征委会、中共萧山县征委会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0月，14万字，1册。

3、《南昌起义》，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49.1万字，1册。

4、《八七会议》，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0月，15.5万字，1册。

5、《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本书协作组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20万字，1册。

6、《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本书协作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100万字，上、下册。

7、《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广东省党史资料征委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60.9万字，1册。

8、《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本书编辑组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4月，120万字，2册。

9、《湘赣革命根据地》，本书征集协作小组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3月，130万字，2册。

10、《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本书编写组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2月，46.8万字，1册。

11、《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本书编委会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179万字，4册。

12、《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海丰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陆丰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6月，58.5万字，1册。

13、《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5月，31万字，1册。

14、《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征委会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45万字，1册。

15、《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征委会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6月，120万字，2册。

16、《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本书编辑组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60万字，1册。

17、《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共广西党史征委会本书编辑组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1月，110万字，2册。

18、《一二九运动》，中共北京市委征委会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40.8万字，1册。

19、《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1月，39.8万字，1册。

20、《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0月，120万字，3册。

21、《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本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1月，81.2万字，2册。

22、《淮南抗日根据地》，本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0月，38.2万字，1册。

23、《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49万字，1册。

24、《浙东抗日根据地》，中共浙江省委征委会、浙江省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34万字，1册。

25、《东北抗日联军史料》，本书编写组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72万字，上、下册。

26、《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45.8万字，1册。

27、《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

省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 8 月,52 万字,1 册。

28、《苏中抗日根据地》,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 4 月,45 万字,1 册。

29、《皖江抗日根据地》,本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 2 月,35.4 万字,1 册。

30、《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 7 月,43 万字,1 册。

31、《皖南事变》,本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42 万字,1 册。

32、《南方局党史资料》,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重庆出版社 1986 年 5 月,218.4 万字,6 册。

33、《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本书编委员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57 万字,1 册。

34、《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编研委员会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5 月,75.4 万字,1 册。

35、《一二一运动》,中共云南省委征委会、中共云南师大党委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 8 月,42 万字,1 册。

36、《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 6 月,53 万字,1 册。

37、《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学生运动卷)》,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5 月,130 万字,3 册。

38、《淮海战役》,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102 万字,3 册。

39、《绥远和平解放》，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5 月，48 万字，1 册。

40、《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已出版浙江(杭州)、湖北、重庆、江苏(南京)、江苏(苏南、苏北)、江西、安徽共 7 卷，240 万字。

41、《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 6 月，390 万字，7 卷。

42、《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全国手工业总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第 1 卷 1992 年 4 月，59 万字；第 2 卷 1994 年 4 月，60 万字；第 3 卷 1997 年 12 月，120 万字。

43、《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已经出版湖南、福建、西藏、上海、河北、辽宁 6 卷，共 234 万字。

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组织、编辑的书籍有 13 种，13 册，共 478.6 万字：

1、《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深圳卷)》，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5 月，35 万字，1 册。

2、《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厦门卷)》，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26 万字，1 册。

3、《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珠海卷)》，中共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 9 月，27 万字，1 册。

4、《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汕头卷)》，中共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22 万字，1 册。

5、《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海南卷)》，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6 月，26 万字，1 册。

6、《毛泽东的足迹》，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 9 月，45 万字，1 册。

7、《邓小平纪事》，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8月，38万字，1册。

8、《朱德人生画卷》，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10月，38万字，1册。

9、《周恩来世纪行》，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2月，41万字，1册。

10、《群星耀中华》，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9月，38万字，1册。

11、《日军侵华罪行纪实(1931—1945)》，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9月，42万字，1册。

12、《抗日英烈谱(1931—1945)》，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0月，39.7万字，1册。

13、《楚图南文选》，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4月，60.9万字，1册。

此外，还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遵义会议》以及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与辽沈战役纪念馆、本书编审小组合编的《辽沈决战》共计60余万字；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7集，共计150万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

关于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的 部分俄国档案文献

沈 志 华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与苏联商定,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出访苏联,目的是参加斯大林 70 寿辰的庆祝活动,商谈和签订中苏之间的有关条约和协定,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949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通过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多次商谈,毛泽东终于使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以取代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0 年 1 月 20 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经过反复会谈和协商,中苏两国于 1950 年 2 月 14 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的协定》,并通过了关于废除 1945 年条约和外蒙古独立的《公告》。当时双方确认但未予公布的还有上述两个协定的议定书和条约的《补充协定》。2 月 17 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莫斯科回国,留下中国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方面谈判贸易协定等其他问题。这次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以及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动。

关于这次外交谈判的情况,直到 80 年代后期,中国方面才开始公布一些有关的电报、信函,并出版了几部当事人的回忆录,使人们得以对这次中苏谈判的过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人们仍然无法依据现有的文献和材料,对中苏谈判过程进行具体的和详细的考察。不久前,人们在俄国解密的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这

次中苏条约谈判的历史文献,共有 80 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纪录,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或协定的最初文本和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这里发表的是经过整理的反映中苏条约产生过程的部分档案文件^①。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和考证,人们可以对中苏外交关系中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更加真实和准确的把握,而以前对其中有些情况,人们或者不甚清楚,或者以讹传讹。这里列举一二^②：

毛泽东赴苏访问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签署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且在行前已经通过几种渠道将这一信息传递给苏联领导人,对此,斯大林是完全了解的。斯大林最初希望在形式上保留 1945 年的条约,而不愿意签订新条约。只是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斯大林才被迫同意了中国的意见。

苏联外交部准备的条约第一稿和第二稿草案明确提出:1945 年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这就是说,苏联方面同意在形式上签订一个新条约,但实际内容(相关的协定)不得有任何改动。

基于斯大林曾多次讲过苏联军队可以提前撤出旅顺口和大连港,在苏方以后几稿的草案中,确定苏军将于 1950 年开始撤退,并在对日和约签订后重新审议关于旅顺、大连的议定书。同时,条约的名称定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 1 月 16 日的事,此时中方

^①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九五年度重点科研项目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确定的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重点选题,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期将出版《苏联历史档案选编》首批 300 余万字的档案资料,其中收集了关于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的大部分文献。

^② 对于这些档案文献的研究和分析,可见沈志华、冈察洛夫合著的《1950 年中苏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一文,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2、3 期。

尚未提出自己的草案，周恩来还在赴苏的路上。

苏方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长铁路问题上。1月19日，苏联交通部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协定草案，并做了详细的说明，其核心内容是重申保留1945年协定的有效期，扩大中长铁路的资产组成，对中长铁路及其附属企业免征各种税收。在中苏双方代表谈判的前一天，即1月22日，联共(布)中央批准了这些草案。

对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本身，中方没有提出任何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但是，1月26日中方提出的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除旅顺撤军问题外，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主要是指：否定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原则，而是立即一揽子解决重新审议协定的问题；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

尽管斯大林最初对中方的草案感到意外和愤怒，但显然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苏方于1月28日提交的协定修改稿，除了没提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外，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

针对苏方提出的议定书补充条款，即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中方也提出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经过反复谈判和争论,中方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建议,而苏方同意以远东出现战争威胁为苏军使用中长铁路的条件。这是关于条约谈判中双方最激烈的一次争论。

在讨论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签字和公布问题时,2月10日,苏方又提出一个关于第三国问题的《补充协定》。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的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周恩来还说,他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是,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所有协定都应公开发表。

当然,只有把中苏双方的有关档案文献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人们才能更完整、更全面地了解约半个世纪前这次中苏外交谈判的整个过程和详细内容(以下档案文件由国家税务总局张木生翻译,沈志华编注)。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 合作互助条约(第一稿)

(1950年1月5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为继续发展和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固有的友好关系,

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同时也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

深信彼此的合作有益于两国伟大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

的普遍和平与安全，

决心在反侵略斗争中互相援助，

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扬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出示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 一 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消除侵略者的任何威胁。

为此目的，缔约国双方将以忠诚合作的精神，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 二 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保证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军事进攻时，另一方应给予全面援助，其中包括军事援助。

第 三 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任何反对对方的集团。

第 四 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单独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无论是同现日本政府，还是同在日本建立的、不放弃任何侵略打算的其他一切政府和政权机关，均不缔结和平条约。

第五 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 条

缔约国双方坚信,苏中人民之间的安全和繁荣要求巩固和发展牢固持久的友谊,双方将依据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以及不干涉另一国内政的原则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第七 条

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①。

第八 条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尽快在北京进行。

本条约一经批准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年1月 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① 苏方设想只修改条约本身,而保留1945年签订的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港的协定,所以才特意列出了第七条的内容。以后又陆续把有关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港的问题排除在条约之外,作为单独协定处理。

苏联外交部关于中苏谈判有关文件的定稿

(1950年1月16日)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①

向您呈上与中国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中国长春铁路议定书和宣言草案,以及条约签字时补充说明的草案。

安·维辛斯基^②

1950年1月16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③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友谊是符合苏联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并确信巩固友好关系将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

决心遵循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全力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密切合作以有益于普遍和平与安全,

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

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

①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890—1986),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② 安德烈·扬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1883—1954),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

③ 苏方最初拟定的条约名称是《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直到此时,即第六稿时,将名称改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方对此没有提出异议。

述各条：

第 一 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

缔约国双方均重申，他们打算将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 二 条

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由于日本妄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被迫与其开展军事行动，或与其他一些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勾结的任何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 三 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 四 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 五 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 六 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双方将遵循互相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

第七 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

缔约国双方还同意,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中国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义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予以重新审议^①。

第八 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时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于近日在北京进行。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年1月 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确认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有效的议定书

在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

^① 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刘少奇访问莫斯科以及斯大林与毛泽东第一次会谈时,苏联方面都表示苏军可以立即撤出旅顺海军基地,故条约草案有此改动。联共(布)中央决议通过的条约草案删除了这一条,而将其内容起草了一个专门的协定义定书。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名义签字的双方,同意下列事项:

一、完全根据 1945 年 8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定的期限确认该协定的有效期。

二、本议定书为两份,每份用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并作为上述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于莫斯科,1950 年 月 日

声 明

在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为准确确定中国长春铁路的法律地位,协议双方政府就此声明:完全根据 1945 年 8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定的期限确认该协定的有效期。

本声明由缔约国双方的全权代表签字确认,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并予以发表。

1950 年 月 日于莫斯科签字

条约签字时的补充条款(草案)

鉴于本条约的签订,缔约国双方声明,本条约的缔结不承担苏中双方在以前条约中各自的债务。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 决议和议定书草案

(1950年1月21日)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阿·伊·米高扬同志^①

安·扬·维辛斯基同志

受委托呈上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决议草案和中长铁路两个议定书的草案。

附件:1.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长铁路决议的草案

2. 关于中长铁路议定书的草案

3. 关于中长铁路补充议定书的草案

安·葛罗米柯(签名)^②

Б·贝舍夫^③

伊·柯瓦廖夫(签名)^④

尼·罗申(签名)^⑤

伊·科兹洛夫(签名)^⑥

伊·罗江诺夫(签名)^⑦

1950年1月21日

①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1895—1978),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对外贸易部部长。

②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1909—1989),1949—1952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③ 贝舍夫,时任苏联交通部部长。

④ 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柯瓦廖夫(1901—1995),原苏联交通部副部长,曾带领苏联专家帮助修复长春铁路,时任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

⑤ 尼古拉·罗申(1901—1960),1940年来华,任苏联大使馆陆军副武官、陆军武官,1948年任大使。1949年10月为首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⑥ 科兹洛夫,时任中长铁路中苏合营公司苏方理事、运输处上校经理。

⑦ 此人身分不详。

附件 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1950年1月 日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

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确定将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间谈判的基础(附件 2)。

二、关于从 1950 年 2 月 日开始恢复中国长春铁路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事宜,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

三、就修改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第四、五、六、七条的问题,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确定理事长、监事长、铁路局局长、总稽核及其副职和助手等职务的担任采取轮换制,分别由中苏两国人员担任,每隔三年轮换一次。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在第一个三年中,理事长、副监事长、铁路局副局长、总稽核由中国人员担任;不言而喻,副理事长、监事长、铁路局局长、副总稽核由苏联人员担任。同时规定,在双方没有协商采取其他的职务轮流方式前,上述轮流任职的方式一直保持不变。

四、在确定中国长春铁路的全部资产前,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谈判时,应提出将铁路的固定资产列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所有的建议。

为全面确定转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拥有的资产,根据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第十六条,批准成立苏中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成员有 A·Φ·茹拉弗廖夫(主席),H·A·格鲁尼切夫(副主席)和 A·M·捷列尼诺夫等同志。

五、将原属于中国长春铁路以及处于铁路运营中,但未列入附件名单^①上的资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关于护路的第九条和关于保证铁路木材供应的第十二条做某些必要的修改,具体情形如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负责保护从满洲里车站和绥芬河车站至苏联边境线的属苏联外贝加尔斯克和普里莫尔斯克的铁路地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保该铁路与其他国有铁路在同等条件下得到木材供应。

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协议,为中国长春铁路及其企业所进口的货物应免除海关税、各种特别税以及货运税。

八、关于该协定的第二、三、四、五、六、七条,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专门的议定书,议定书的草案附在本决议后(附件3)。

九、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和交通部(贝舍夫、叶罗戈夫同志),就本决议的第一、第八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谈判。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约·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M·波马兹涅夫

附件 2:

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

签字双方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下列事项:

^① 见附件 4。

一、1945年8月14日于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并促进了两国之间经济合作的发展，重申这个协定的有效期同规定的完全一样，同时，根据签约方的任何一方的建议，都可以将有益于双方铁路商业活动的某些补充条款列入该协定中。

二、本协定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年 月 日于莫斯科

附件 3:

补充议定书(草案)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0年 月 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议定书，两国政府决定签订补充议定书如下：

一、自1950年2月 日起恢复中国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

二、修改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第四、五、六、七条，确定理事长、监事长、铁路局局长、总稽核及其副职和助手等职务的担任采取轮换制，分别由中苏两国人员担任，每隔三年轮换一次。

在第一个三年中，理事长及其助理、副监事长、铁路局副局长、总稽核由中国人员担任；不言而喻，副理事长及其助理、监事长、铁路局局长、副总稽核由苏联人员担任。

在双方没有协商采取其他的职务轮流方式前，上述轮流任职的方式一直保持不变。

三、将中国长春铁路的固定资产列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所有(附件 1)^①。

为了充分确定转交给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所有的资产,以及根据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第十六条规定属于共同经营的资产,应不晚于 1950 年 3 月 1 日成立由缔约国双方各三位代表共同组成的委员会。

委员会的工作地点:哈尔滨市。

委员会应于 1950 年 5 月 1 日前结束工作并提交自己的方案由缔约国双方政府确认。

四、将原属于中国长春铁路并处于铁路运营中,但未列入附件名单上的资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附件 2)^②。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承担下列义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负责保护从满洲里车站和绥芬河车站至苏联边境线的属苏联外贝加尔斯克和普里莫尔斯克的铁路地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保中国长春铁路与其他国有铁路在同等条件下得到木材供应。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为中国长春铁路及其企业所进口的货物应免除海关税、各种特别税以及货运税。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① 这里所说的附件 1,即本文的附件 4。

② 在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个附件。

附件 4:

**中国长春铁路的固定资产和转交给苏中两国
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的资产的清单**

一、共同使用的铁路干线、支线和专用线

1. 干线:

- (1) 满洲里——哈尔滨
- (2) 哈尔滨——绥芬河
- (3) 哈尔滨——大连——旅顺口

2. 共同使用的铁路支线:

- (1) 锦州——陈家屯
- (2) 南关——林——甘井村
- (3) 大石桥——营口
- (4) 大方山——柳树屯
- (5) 苏家屯——抚顺

3. 铁路专用线:

露天采掘场的支线

二、中国长春铁路与其他中国铁路枢纽的分界线

1. 考虑到中国铁路线上火车的通行能力,昂昂溪、哈尔滨和沈阳枢纽站不在中国长春铁路的范围内。

2. 中国长春铁路枢纽站的准确分界线由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协定第十六条规定的苏中联合委员会确定。

三、机车车辆修理厂

- 1. 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
- 2. 附带扳道设备车间和铁路技术实验室的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

四、机务段

- 1. 位于下列车站的机务段:

- (1)满洲里
- (2)海拉尔
- (3)博克图
- (4)昂昂溪
- (5)安达
- (6)哈尔滨
-^①

联共(布)中央决议通过的关于中长铁路及 旅顺口和大连协定义定书

(1950年1月22日)

联共(布)中央决议

批准委员会提交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草案如下^②：

1.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附件1)；
2. 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附件2)；
3. 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附件3)；
4. 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以供给中国设备和其他货物的方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草案(附件4)；
5.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决议草案(附件5)；
6.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的决议草案(附件6)；
7.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苏新

① 所收集的档案文件以下缺页。

② 我们收集的档案中只有前三个附件。

石油公司的决议草案(附件 7);

8. 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草案(附件 8);

9.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决议草案(附件 9);

10. 关于在中国机关、团体和企业工作的苏联专家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草案(附件 10);

11.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合营股份公司管理的满洲和辽东半岛地区不动产的决议草案(附件 11);

12.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草案(附件 12)。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略^①。

附件 2:

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义定书

签字双方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近期内可以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并代表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下列事项:

1. 根据中国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以及苏联政府表示的意愿,将在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重新审议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

2. 目前处于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将自本条约生效之日的 2—3 年期间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从 1950 年开始。

^① 此文本除删去了第七条外,与苏联外交部的最后定稿没有多大区别。

3. 本议定书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年 月 日于莫斯科

附件 3:

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义定书

签字双方分别代表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下列事项:

1. 重申 1945 年 8 月 14 日于莫斯科签订的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所规定的有效期,同时,根据签约双方任何一方的建议,都可以将有益于双方铁路商业活动的某些补充条款列入该协定中。

2. 本议定书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年 月 日于莫斯科

苏方提出的关于大连港问题的协定草案

(1950年1月26日)

致阿·伊·米高扬同志、安·扬·维辛斯基同志

呈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关于大连港问题的协定草案。

安·葛罗米柯

1950年1月26日

关于大连港

为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缔约国双方同意以下事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根据单独的协定,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

二、从境外运进大连港和沿中国长春铁路直接运往苏联境内的货物，从苏联沿指定铁路经过大连港出口的货物，或从苏联运来的为港口设施所需的材料和设备，免征关税。上述货物应采用封闭车箱运输。

三、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以后未经双方协商确定采用其他任职方式，则港口主任和副主任的职务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每隔两年轮换一次。同时，在第一个两年中，港口主任由苏联人员担任，副主任由中国人员担任。

四、在同日本缔结和平条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

五、本大连港协定直到与日本的和平条约生效之前一直有效，此后将重新审议。

苏方对中方的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 修改稿及增加的议定书草案

(1950年1月28日)

致卡尔斯基同志

给您送上一份由苏联修改的中苏关于旅顺口、大连和长春铁路的协定^①。

请转交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

敬礼

1950年1月28日

^① 这里收入的一份文件是苏方修改后提交给中方的定稿。在档案中还有三份苏方对中方这一协定的修改稿，上面删改的地方非常多，而且是出于不同人的手笔。可以看出苏方对中方提出的这一协定草案最初是有很大大不同意见的，并且经过了反复讨论和修改，最后的定稿比较接近中方的草案，但与此同时，苏方又另外提出了一个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 1945 年以来远东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粉碎了；中国已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并在中国成立了新的、对苏联友好的人民政府；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重新处理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

根据这些新的情况，苏联和中国决定缔结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本协定如下：

第 一 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 1952 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惟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长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 二 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但不迟于 1952 年末，苏联军队将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

在苏军撤退前的一段时期，中苏两国政府将派出同等人数的

军事代表组成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按现存界线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而被卷入战争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 三 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隶属中国管辖。

目前由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的在大连的一切财产,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的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三人组成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财产移交的具体办法,并经双方政府批准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后,于1950年内完成之。

第 四 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1950年 月 日于莫斯科签订,协定文本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①。

^① 在双方谈判中,中方原则上接受了苏方这一协定文本,只是个别措辞上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议 定 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达成协议如下：

一、对于沿中国长春铁路或沿水路经过大连由苏联运往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用于苏联驻军的物资和原料，以及苏联军事指挥部从旅顺口向苏联国内调拨的物资和原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免征海关税和其他任何税收。

二、上述第一点中指明的物资和原料在中国领土内不属海关检查之列。沿中国长春铁路以及在中国境内运送的物资和原料应采用封闭的车箱。

三、苏联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到绥芬河车站以及沿中国长春铁路往返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①。

^① 1950年1月31日，中方提出对该议定书的修改稿增加了一条，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在谈判中，苏方坚决反对加入这一条。争论的结果，中方同意维持苏方的议定书条款，但在苏联军队使用中长铁路一条中必须增加“在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时”一句，以此作为前提条件。

苏文资料，1951年4月

新 书 选 介

《刘少奇风云岁月》：本书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为纪念刘少奇一百周年诞辰而组织编写的纪念文集。所选文章记录了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开展白区工作、参与共和国创建、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惨死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沧桑一生，展示了刘少奇的光辉业绩、伟大思想、崇高风范和卓越贡献。全书40余万字，1998年9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牛棚杂忆》：季羨林著。该书是作者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的回忆录。作者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主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冲击。该书从作者参加南口社教写起，再现了他从“逍遥派”到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从反对聂元梓到被关进牛棚，从“看门老头”到获得新生的全过程。全书39.3万字，1998年4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沈宝祥著。20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和社会主义命运的大讨论。当时讨论的主战场是胡耀邦领导的中央党校。作者作为参与者和见证人，历经十年收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讲述了中央党校组织、推动这场讨论的全过程。全书39万字，1997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著。“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共产党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本书根据采访和积累的资料，真实地记录了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的历史功绩。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详叙了1977年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为平反冤假错案而呕心沥血的动人事迹；第二部分描

述了几宗曾轰动全国而内情却鲜为人知的大案的平反过程。全书共 33.3 万字,1998 年 5 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出版。

《出使苏联八年》:刘晓著。该书是作者 1955—1962 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期间的回忆录。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及所掌握的丰富史料,叙述了此间中苏关系从友好到严重分歧的转折过程,并介绍了中苏之间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如 1957 年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祝活动,中苏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冲突,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情况等。全书 10.8 万字,1998 年 6 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彭德怀年谱》:王焰主编。本书以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谱列了彭德怀的生平事迹,勾勒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展示了他的丰功伟绩,并通过其个人的实践活动凸现了中国革命的主动脉。本书资料主要源于彭德怀的自述、日记等档案,史料详尽,价值颇高。全书 40 万字,1998 年 6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家世》:李海文主编。本书是第一部全面展示周恩来家族历史的专著。它根据大量的原始材料和口碑材料,在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记述了周恩来家族 33 代近千年的历史,为研究周恩来提供了家庭背景、人文环境的资料。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并首次发表了多幅珍贵照片,既有很强的可读性,又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全书 34.2 万字,1998 年 2 月由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十七辑

作者 =

页数 = 2 2 2

S 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